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政治评传



中文版前言

在中国出版本人撰写的《邓小平政治评传》既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又是多少有点胆怯的事。这本书一是写给那些母语是英语的读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详细历史还不大了解，再就是写给那些随着传统文化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读者。中国与西方除了其它方面的不同外，在传记的撰写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的读者和诸如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读者比起来，期待的事物是不同的。

我对邓小平的兴趣不是就他个人而言，而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产生的。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书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邓小平的传记，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传记，邓小平的个人习惯、爱好和心理状态——比如，他对足球的爱好、打桥牌和勤奋地工作是广为人知的——这些东西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显示了邓对中国改革的某个侧面。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象邓小平这样重要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邓小平就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名早期成员了。邓小平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密切。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这些人中的两位。他们两人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起了主要作用。

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后期开始，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重重困难直到 1949 年夺得全国最后胜利的许多功绩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如果把中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也归功于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邓小平。

1994 年 8 月 22 日是邓小平诞生 90 周年纪念日，他的女儿邓榕说：不能让这个日子平平常常的过去，因为这个日子不仅仅是对他父亲生日的庆贺，而且也是对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代人的承认。

在 1990 年，我写了一本短篇的邓小平传记，已经正式出版了。然而，在这本书上市不久，该书的出版商们却由于一些与本书完全无关的原因而陷入了困境，廉价出售存书后，停止了再版。邓小平 90 岁的生日为我提供了再版扩编和经过认真斟酌的修订版的好机会。中国朋友的鼓励的支持，比四年前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有机会利用更长的版本对一些史料进行全面的修订，所有这一切都太诱人了。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邓小平离休以来，在中国可以得到大量的有关他生活和著作的资料。文献性资料从 1989 年以来都可以搞到，这一点在这本传记中有所体现。此外，从我上次写的那本邓小平传记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学术界和官员们比以前更愿意接受采访了。在该书的许多地方，他们的谈话已被加注在正文的参考书目中。然而，也有些时候他们提供的是一些笼统而不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仅给人以某种启示，不适于直接引用。我非常感谢那些我曾经访问过并与之谈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但同时声明，

他们对该书的出版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这本书是写给母语是英语的西方读者。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这本书的英文版正在英国伦敦出版，将在澳大利亚、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发行。本来我可能会改变这本传记的写作方法和某些内容以便使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我傲慢或者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缺乏了解，我很清楚把这本书展现给中国读者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然而我希望除了中国读者能从该书中了解一些情况外，这本书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中国人知道西方学术界有关人士关于中国的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总之，中文版的邓小平传还没被重写或者说没有被明显地修正，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勾通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我希望中国读者将会欣赏这个观点，原谅我的缺点，喜欢这个真实的原文。

在该书中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我对邓小平的学术兴趣与对华北地区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太行山区社会变迁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在过去的几年我一直潜心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我最初在中国境外被这个课题吸引时，有关邓小平在太行山区活动的范围和性质大都鲜为人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甚至就是邓小平的孩子们也认为他们自己，用邓榕的话来说，是“太行山的子弟”。然而我被太行山区一方面惊人的贫困和贫瘠的土地与另一方面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高昂的革命激情所形成的显明对比所吸引。当时邓小平不仅在那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充满了显明对比的故事中扮演着重大角色。

一本书的问世离不开众多热心人的帮助，这本书也不例外。在中国有两个人——太原市政府的翟凤伦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西如——在指导我对太行根据史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其他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十分慷慨而且又积极主动地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给了鼓励和帮助，为丰富该书的内容和为使该书得以顺利出版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他们是：约翰·克拉克、陈叔平、陈云发、詹姆士·科顿、马克·爱尔兰文、冯崇义、李锐、瑞雪·墨菲、凯·普恩、格里·塞格尔、费雷德·特韦斯、田西如、魏宏运、吴安家和尤基。特别是陈顺妍一直是我的支持者和鼓舞者。

大卫·S·G·古德曼
悉尼科技大学

古德曼简介

大卫·S·G·古德曼教授，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1948年生，曾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和发表过许多有关中国政治与社会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其中有《邓小平传》、《变化中的华南》、《中国静悄悄的革命》、《亚洲的新富人》等，是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和从事研究工作。他是《中国季刊》、《共产主义研究》、《太平洋评论》等刊物的编委。目前正从事抗日战争期间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研究。

第一章 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

在中国，通常把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认作是改革时代或邓小平的时代。然而，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担任过书记处的总书记，并两次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职务，但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他就不再担任这些职务了。1989 年 11 月，邓小平的退休要求被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之后，他就不再担任任何的正式职务了。人们认为 1980 年华国锋辞掉共产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就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始了领导。然而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国内外，邓小平要比那些曾经正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那些人影响要更大。人们几乎都认为整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到 90 年代，邓小平是中国唯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齐名。邓小平完全有理由被认作是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之一。邓小平取得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领导了对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和经济上所犯的的错误进行的拨乱反正；领导了把中国带入 21 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在西方，邓小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形象是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产主义的维新派。这种形象，首次出现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之前的那些年中，邓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种政治枷锁，制定了现代化的蓝图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国急需在国外和对外关系中改变它的形象。邓小平在这种努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以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美国、日本、西欧和东南亚各国，在休斯敦，邓小平戴着宽边高顶的牛仔帽在电视上露面，使人们觉得他的中国不再具有危险了。邓小平，一个圆脸的矮个子，就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对苏联的战略中，邓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同盟，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打中国牌，1979 年邓甚至被提名为美国《时代》杂志本年底的世界风云人物，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首次获得此项殊荣。邓的第二个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欢，就是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门事件所留给西方人的复杂印象。

这本传记对邓小平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与实际情况相比，这两种形象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任何矛盾的表面现象大都超越了其真实性。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不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发展而不愿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这种理想的追求可能同样也是他的一种组织活动和他的社会责任。他 16 岁在法国时与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团体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没多久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时起，党不仅支配了邓的生活，而且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中国共产党派他去莫斯科，把他培养成为一名政治组织者，然后又返回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 1949 年取得政权之前，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的足迹遍布了全中国。尽管共产党可能在形式上没有决定他应该与谁结婚，但是肯定对他婚姻的选择和离婚有关，在他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邓的所有三次婚姻都是由共产党的同事作媒，就是明显的证明。

在 1949 年后，邓不仅有荣升为高级官员的资格——特别是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 50 年代中期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而且也有受迫害和诽谤的资格。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被撤了职，作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刘少奇之后）受到了严厉批判，在 1976 年毛的最后的那些日子里，邓又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又一次遭到批判并被撤了职务。由于叶剑英和广州军区的暗地保护和支持，邓的这次离职没有遭到太大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可没有这么幸运。然而，就像在 1933 年邓受到纪律处分时所表现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两次，邓也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尽管这种批评绝对不会有结果的——接受了党的纪律处分，他是以近乎禁欲者的方式接受处分的，等待有机会对他的案子重新申诉。

邓小平也是一位热心的现代化的制定者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决心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国。他对马列主义绝不盲从，显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成功的道路，并不总是在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中。甚至到了 90 年代，邓始终还是号召中国人民紧跟毛泽东·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他并不是毛式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翻版。邓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是精神实质和毛所期望的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那些书面上的文字。

在毛逝世后和粉碎“四人帮”之后，准确他讲，如果不是邓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解释，那么毛泽东思想将是邓复职的主要障碍。因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一段时期曾以“两个凡是”为口号发动了一场攻势。这“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在其政治流放中，就强调指出这种论调太僵化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错误的解释。1977 年 7 月，邓复职后不久，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上所做的讲话，以他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释。

事实上，邓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也反复强调具体时间、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邓有句蜚声中外的比喻：“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尽管这句话直截了当，简明易懂，但是人们对它更深层的含义并不太清楚，某些人还认为这种话是邓的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甚至在中国有人把这句话还作为课题研究。然而当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薄一波问邓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1962年）的情况说的。

后来一些评论家说邓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则和政治见解，照此推论，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遵章守纪勤奋的职员”，他把自己的责任只看作是为党和党的领导服务并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邓对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共产党应起什么作用，肯定有一种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使他党内的对手有了罢免他职务的机会和借口。邓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起源于30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些日子里。后来就是在延安制定和执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战争期间，邓结合具体情况成功地把延安经验应用于他所领导的太行区时，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体体现。

30年代在江西，毛从中国的最低层展开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那时的毛对革命事业既不是教条的墨守成规，也不是急于求成，他知道改造中国需要时间，这场革命的每一阶段所需要的是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同样也需要一个合理而又坚固的经济基础，比如在上改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剥夺了，土改的目标仅仅是剥夺那些大富翁的土地，然而在当时甚至这些大富翁也允许从上改中获得某种好处。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那些相对来说相当富有的中农，绝对不会感到共产党运动的威胁。以这种方式毛和后来的邓都希望既可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又可极大地提高经济的增长。这些能够导致缓慢而又稳定发展的原则正是毛后来在四十年代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接管全国政权政策雏形。实际上这些原则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也还行得通，直到毛的个人权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才结束。

总之，邓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确保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在不懈地奋斗。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是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最明智的办法。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强有力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邓认为，所有这一切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获得，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对，然而这正是邓小平的观点。

中国写人物传记的传统方式不同于在西方已经通用的那种方式，其目的不是进行有分寸的客观评估而是在进行大量说教，由此写成的人物传记往往是偶像化的传记，并且缺乏属于西方传记肩华的那种科学分析方法。趣闻轶事、甚至还有马路新闻传统上讲一直是中国传记的主题。西方的传记是靠个人的回忆录，靠采访亲戚、朋友和有关人士；靠个人或公开的文件写成的。一般通用的办法是等到被写的人物死后再写。

正如本书的文献书目显示的那样，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在中国为版的资料和文件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出版了大量有关邓小平个人的回忆录（尽管这些回忆录并不完全可信），甚至还能对有关的人进行采访，尽管不可能采访邓小平本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1993年8月也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上卷。实际上在邓小平1989年退休之后，出版有关邓小平书籍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熟悉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人往往把这种情况联想为一场夺取政治权力的运动，而不是邓的退休。然而正如派伊等人所说的那样，这种解释是对文化差异的一种误解：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真正的权力往往处于幕后，而位置显赫的权力往往有名无实。

从实际的和学术的高度来看，这是一部政治传记。尽管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开展了对邓的研究，然而目前能够获得有关邓个人情况的材料还很少。特别是缺乏有关主人翁政治经历和历史背景的资料，这是撰写政治评传的一大障碍。比如：很难搞清楚邓在参与某项政治活动或某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他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改革时代成了更突出的问题，因为这时中国国内有一种一切功劳都应归功于邓小平的倾向。据认为，人们曾试图弄清邓到底亲自参与了哪些事情并在这些事情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如果缺乏充足的资料就无法作出合理的推论。关于邓个性方面的资料，由文件和新闻报导提供的极其有限，所提供的都是邓的政治活动和邓的讲话，关于他的情感和态度方面几乎没有。因此，邓个性的大部分资料只能从公开报导的他的那些活动中推断。甚至邓的女儿在她的书中也说邓本人曾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写他的传记……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因此他女儿的这本书无疑成了目前获得关于邓小平个人轶事的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本书也是一本政治传记，因为人们对邓的生活感兴趣，是由于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尽管邓到了40年代才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一名主要人物，但他却参加了共产党初建时期的活动。1949年以后他的生活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此外，邓小平在政治命运上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不仅需要解释，而且显而易见对中国的政治进程具有更普遍的启示。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制度——尤其是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会允许在三个不同时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仅能够幸存下来，而且还能够连续地重新掌权，最终竟会成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

本书之所以是一本政治传记，就是因为这本书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记叙了邓在1937年之后，也就是当他成为中共和中国政界的一名重要有影响人物的那段时期的生活。本书几乎没有涉及邓在十六岁之前的早期生活，在十六岁之前他在四川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但是本书却记载了1920年邓到了法国和1937年之间的那段时期，这段时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在这些年里他是党的一名官员和政治组织者，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兴衰一样，邓在这些年中也有沉有浮，他的失宠包括在1933年被降职，正是在这些

年月邓与决定他后来命运的两个关键人物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保证了他今后的政治命运：首先邓在法国结识了周恩来，然后是 19 刀年结识了毛泽东。

还有一个重要关系，也许更确切他说是一个关系网，这种关系是在 1937 年邓担任了太行根据地军政主要领导人之后形成的。在大行根据地他和另一个四川人刘伯承合作领导八路军的一二九师，该师是抗日战争中共共产党的三个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刘领导的一二九师一开始在太行山区开辟了根据地，随后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最后建立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即、晋、冀、鲁、豫）边区，这个边区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成了共产党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同时，邓和刘还在一起创建了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作为政委的邓小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需要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因为这是一个贫困地区，新兵的体质都很虚弱，当时军队装备也很落后。

1937 年到 1952 年间，邓与中共军队发展的关系很密切，在他后来的生涯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后，这种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0 年代后期的国共两党内战中邓在两个大的战役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两大战役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 1949 年获得了全国政权。第一个战役是刘邓大军突破了蒋介石的黄河封锁线，挺进中原，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第二个战役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共产党部队最终打败了退守长江和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刘邓大军继续挺进占领了西南地区。然而，邓在太行根据地和后来在军队中的经历，不仅仅使他成为军队中的德高望重的人物，而且这些年的经历也给他获得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第一手的丰富经验，这些问题包括动员群众、向政府一些重要的人事岗位推荐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在 90 年代之后成为中共政府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干部。

本章剩下的部分，是这本邓小平政治传记的基本背景，它概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共产党在 1949 年夺取政权之前所走的道路；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生活；第三部分讨论了共产党内斗争的主要特点和这些斗争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后果；最后一部分的重点主要探讨了这些斗争的特点是如何帮助邓确定了他在中共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与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0 年当邓离开中国去欧洲时中国正在酝酿着建立共产党。中国封建帝制的解体，迅速导致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垮台，由此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地方军阀的手里。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了协约国，但是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该条约规定把德国以前在山东的殖民地不是归还给中国，而是转让给日本，于是在 1919 年 5 月 4 日爆发了由北京学生举行的一次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运动，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之为“五四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一些中国人不可避免地向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寻求救国之路。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立刻就开始鼓动“东方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俄国人许诺归还中国从前被沙皇割让的全部土地，与中国共同享有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使用权，该铁路其中有一条干线经过蒙古直达北京。他们还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国人民提供组织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帮助。（共产国际是列宁为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而创建的。）

在中国也相继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其中北京大学的小组是最重要的小组。北京大学曾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各种救国会、自救会、研究学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组织者的帮助下，1921 年 7 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强大的国民党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两个党实际上都是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新发生的事件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党派，两党的目的都要恢复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此，两党优先考虑的首要任务都是重新统一全国和结束军阀割据。此外，共产国际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在 20 年代初期也担负起把国民党重新组建成为一个革命政党的重任。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一度有点紧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国共两党之间冲突的起因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当孙中山在世时，他设法使两党保持联盟，但 1925 年他去世后，他的接班人蒋介石越来越认为共产党是个威胁，同时，他还寻求和大军阀和解。原来国共两党并没有组成两党的联盟，而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种安排不仅使中共能在国民党的保护伞下扩大它自己的影响和组织，而且能有效地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邓小平 1927 年的回国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他去了西安为北方的军阀冯玉祥做事。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了，1927 年，蒋和国民党中的右派人物对共产党开始了公开宣战。

中共和共产国际冲突的起因是由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把它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都看作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延伸，这是引起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因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他想向托洛茨基表明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与国民党的

联盟，当中共在上海的党员遭围捕时，他们应该把武器藏起来逃跑而不是抵抗。命令共产党搞土地革命的农民组织不要侵犯国民党党员和他们的家庭。在西安，以邓希贤的名字在冯玉祥的部队（国民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离开西安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到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是很必要的。1927年，开始是国民党中的右派，然后是国民党左派都把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由此证明了斯大林政策的失败。

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党急需在中国获得成功，指示当时已与国民党决裂的共产党在中国城市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起义的目的是攻取城市推翻国民党政权。然而当时中共的军队大部分是在农民协会基础上组建的又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农民。这些起义中最成功的是在八月初攻占了江西省会南昌的那次起义，但起义军在南昌仅仅占领了4天时间，其他地方的起义都遭到了失败。而共产国际仍坚持他的观点，迫使中共在广州举行了一次起义，结果又遭到失败，这次起义使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了威胁。当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邓也在那里，他们都处于地下。到1927年底，中共的力量或者说是它的剩余力量，逐渐地聚集到了农村的游击地区，也就是被称之为“苏维埃”的地区。

中共一时很难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从1927年到1935年，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争权的斗争，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三番五次的围剿，毛吸取了已往的教训，认为依靠农民革命，游击战和运动战，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手段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共产党当时所采用的发动农民起义政策的一部分，邓被派往广西，支持那些农村的苏维埃，但工作并不一帆风顺，党内的其它人继续坚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1930年又进行了一次城市起义的尝试，另外，邓也受命离开了他在广西的农村根据地，去了包括广州的许多城市搞武装斗争，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一着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于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着棋。其他一些地方也试着搞夺取城市的斗争，结果都遭到了和1927年同样惨重的失败。

中共的领导权现在转到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留俄学生集团”手中。这些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受教育后，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被送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们承认中共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到农村，然而他们不准备把中共领导权让给在江西建立并发展了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的毛和毛的支持者们。1931年他们把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苏维埃的首府——瑞金，邓也去了瑞金。整个这些年，反对毛的那些人三番五次地批评毛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但由于毛的成就和他的威望，他们不可能彻底清除毛的影响，但他们试着通过攻击毛的支持者和与毛持同样观点的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33年在一场主要针对毛但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又不能直接攻击毛的运动中，邓小平成了受害者之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同时，蒋介石也对中共造成极大威胁。他把顽固的军阀和日益严重的日

本对华侵略问题搁在一边，欲集中力量对中共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发起一系列军事“围剿”。在 1934 年之前，中共能依靠游击战术粉碎蒋的“围剿”；另外，也由于蒋的一些其它问题，使中共能坚守住江西苏维埃根据地。但在 1935 年国民党军队采取了一种新的更有成效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封锁战术，同时，中共在共产国际顾问的指挥下，放弃了游击战而采取了阵地战，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由于面临着又一个惨重的失败，所以中共选择了战略撤退，最后终于开始长征。

长征以其无可非议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举世闻名。用埃德加·斯诺的话来说，它是“人类战胜差异人类战胜自然”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中央红军开始出发大约 9 万人，他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避难所，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行进了 1 万多公里，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穿过了山脉、沙漠、沼泽等世界上最荒凉的地带，最后剩下大约 5000 人，终于到达成为他们终点的陕北。

对于共产党来说，长征取得了三个重要的政治结果，首先是基本上结束了共产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毛和他的支持者的政策指引下，党比以前更团结了。长征的转折点，实际上是 1935 年 1 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不再信任共产国际的顾问了，许多以前反对毛的人现在都改变了观点，那些和邓一起支持毛的人都得到提升。长征的第二个结果是它的终点陕北为中共提供了一个较安全的根据地，一开始在保安，后来又迁到更著名的延安，从这里向全国辐射。到 1935 年，蒋介石又一次忙于应付军阀和处理因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第三个结果是长征后幸存下来的红军，不仅创造了惊人的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 1937 年日本对华的侵略。1936 年，面临日本人侵略的威胁，蒋介石手下的将领们强迫他又一次和共产党合作。当日军最后打进来时，他退到西部的重庆，留下共产党在华北抵抗日军。这样一来，不仅巩固了共产党的地位，而且还扩大了共产党在日军后方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并被广大民众认为是一支有效的民族抗日力量，随着动员农民群众的政策之后，中共尽其所能地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比如，邓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延安，而是在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河南和河北省交界的边区度过的。截止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已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曾试图避免发生对抗。但这些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在随后的内战中，中共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和广大民众的信赖，而且还由于国民党的许多弱点：军队士气的日益低落，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1948 年底，中共军队夺取了两次决定性的胜利：一次是在东北，这次胜利对华北的国民党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导致了北京国民党守军

的投降。另一次胜利——即淮海战役，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次战役使共产党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到 1949 年 4 月，中共的胜利已成定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俯视着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邓小平作为中共领导集团中的一员，当时就站在毛的身边。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终于夺取了国家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最紧迫的是恢复全国统一，控制通货膨胀，确保中共的政治统治，特别是在那些还没有完全解放的地区。当共产党军队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时，中共为了解决当时的一些紧迫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组建了军政委员会——这个机构不仅在所辖地区实施临时性的军事管理，而且其组成人员大部分和邓一样都是在军队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中共干部。解放军的六大军区分别控制着中国的一个地区，同时，建立了六个军政委员会，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地区在1949年以前共产党力量较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中共更关心的是巩固它的地位而不是进行各种彻底的变革，虽然中共一直不懈地追求着它的革命目标，但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大小来看，中共的观点仍属于一种渐进主义。在农村虽然实行了土地改革，但在城市仍极力主张资本主义企业可以继续生产经营。在爱国主义的呼吁下，鼓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合作，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恢复经济的稳定和扩大党的队伍。总的来说这些目标都成功地实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和苏联结成了联盟，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1949年前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不融洽的历史关系。为了像东欧各国那样创造出一个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模式，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和建议，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及所采取的政策，都是依苏联设计的，到了1954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巩固了它的统治，新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基本到了位。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它的基础结构，都由五年计划来决定；制定出了一套新宪法和新的政府制度。

然而，苏联的发展模式，由于思想意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领导人。苏联的发展模式是高度集中的、高度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强调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的需要。中共的领导人不是那种城市的持有专家治国论的精英人物；到了50年代中期，这种计划经济开始导致全国范围的各种物资的短缺和生产的停滞不前。此外，苏联的模式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扩大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斯大林死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苏联的经验和领导方式的优越性。所以到了1955年，使苏联顾问感到极为不满的是中共开始寻求另一条可供选择的“中国式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当时要补救已为时太晚了。

在50年代中期党内在讨论应用什么样的模式来代替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些在党内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去世。一种观点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越来越

多地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依靠发动群众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各条战线上尽快地进行。另一种比较渐进的观点是由陈云提的——陈云从 1949 年一直到 80 年代一直从事计划经济的工作，也是 1978 年改革规划的一个主要设计师——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慢一点，应建立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原则基础上，以发展农业为先导。同时，毛用来论证他的观点并最终按他自己的观点来行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大约 1955 年中开始，毛的个性逐渐地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11)

在决策过程中毛的权力和中心地位的影响在 1955 年集体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起初，包括毛的中央领导层，都特别小心谨慎，步子迈得很慢。到了 4 月下旬，毛不仅改变了主意，实行比原来快得多的集体化方案，而且开始滥用权势。只有一个人，邓子恢，敢于对他的观点表示异议，毛盛怒之下对邓子恢进行了批评，并鼓励省一级的领导人在 1955 年结束之前完成集体化方案的第一阶段，这样一来要比原来党中央计划的政策提前了好长时间。不久，毛又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够在四年内完成，提前了一年时间，共产党应该在制定未来的计划中胆子再大一点。然而，在 1956 年的 1 至 3 月份，毛过热的经济结果清楚地表明所采用的他的经济战略被放弃了。(12)当几年之后评论这些往事时，毛对那些当年作出此项决定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在 1952 年已从西南调回来任副总理，到那时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在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选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邓被选为总书记，而不是他在八大之前所担任过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那个职务。这次大会，很可能经过了毛的同意，重新确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作为中共明确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被正式从党章中取消了，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成为 1958 年开始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这次党代表大会同意开展一次党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主要是针对那些变革派人士。毛设法通过提前整风的日程，通过论证这次运动应该根据他的发动群众的思想而不是以比较正统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他想实现他所说的“扩大的民主”，那就是谁都可以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直言不讳的和公开的批评，不论他们的职位有多高，用毛的话说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毛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将会对共产党有好处，将会把共产党和那些潜在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毛认为当时共产党已经打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共产党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到批评，党的统治是不会受到威胁的。在党内尽管遭到许多反对，但在 1957 年 5 月还是发起了一场被称之为“双百运动”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是一次灾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对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这次运动很快就结束了，紧接着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更为正统的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是从严惩处那些直言不讳大胆提意见的人。

1949 年到 1956 年期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谜，

为什么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允许毛为所欲为，对他们的经验和意见横加指责。正是他们这种对毛的纵容导致了他们自己的毁灭。尽管毛对于普通人来讲似乎就像上帝一样，但对于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来说，他仅仅是一个同事，而且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同事，在 1949 年之前的斗争岁月中，他们曾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在一起并肩战斗的集体领导班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 20 年代末期和 30 年代早期，毛所提出的战略战术的观点屡次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大多数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战略战术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就导致了他总是高人一等，他过去一贯正确的声望和坚持领导班子的团结使他赢得了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们的信任，这些人在当时和后来成了他忠实的支持者。

1957 年底，毛又一次试图把他的发展设计付诸于实践。在几个省一级领导人的帮助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有四分之一多的农民参加了这场运动。至少在统计的数字上来看，成果是很大的，水利方面的大跃进很快演变成成为全面的经济大跃进。毛认为中国应该依靠劳动力代替资本投资，在 15 年之内实现工业化。新的大规模的农村生产单位——人民公社——两个月之内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了，到处都在开展大炼钢铁，甚至有人声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社会——马上就要实现了。在所有这些左道邪说中，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这当然是最使苏共感到恼火的，因为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认为必须应该在苏联首先建立共产主义。

到了 1959 年，党内一些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然而，当以彭德怀（当时的国防部长）为首的人对毛的一些作法和设想提出反对意见时，毛把他们都批成了反党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跃进又延续了一年。但到了 1960 年底，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大跃进”，毛从政府日常工作中退了出来，把政府的日常工作留给了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邓处理。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然而，在 60 年代的前十段时期中，在陈云的渐进主义战略和一个比较团结的中央领导班子的指引下，中国开始了卓有成效地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各种问题。

然而，毛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设想，而且整个 60 年代初期，他对“修正主义”的危险变得越来越担心了。中国的情况正处于放弃对革命事业追求的危险境地中，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甚至有可能如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多地感到他已经被挤出政权之外。依照毛的观点，决定中国发展的应该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实际上就是概括了毛在 1966 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的斗争目标是共产党本身，通过一系列逐步的升级最后把斗争矛头一直指向诸如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都被打倒了。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初求得党内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后来又求得了政治化了的学生组

织红卫兵的支持和当时国防部长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的支持，尤其是红卫兵，受到鼓励去推倒所有的各级政权，攻击他们的老师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那时的知识分子被作为反动的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十分狂热，大获全胜。几乎所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都被“揪出来”受到批斗，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关了门，比较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囚禁、没有被杀害、或没有被逼迫自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生产第一线去，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中对他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省检讨。邓也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他 1966 年被撤职，1969 年被下放。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的一片混乱，正常的秩序不得不由解放军来维护，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中，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 70 年代初，由于解放军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逐步加剧了党内的冲突，这个冲突最终是由于林彪和其他几位军官在蒙古上空的飞机失事遇难后才得以解决。据说他们曾策划了一次反对毛的军事政变，这个阴谋败露后他们本来是要逃往苏联的，林彪的死却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进行反思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明显的问题是缺乏管理国家的高级行政人才。1966—1968 年期间党委和政府已被改组；解放军也正逐渐地返回兵营。比较稳健的领导人周恩来，不顾中共激进派的反对，设法使“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 年，这些重新复出的领导干部中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毛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激烈的党内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激进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保持住那些被他们认作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东西，这是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些人，主要是周恩来和邓，他们强调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共政治目标的先决条件。1976 年 1 月，周恩来去世后，对邓的批判达到了一个高潮，4 月，为纪念周恩来和反对激进派所举行的群众性的示威活动，为激进派又一次打倒邓提供了一个借口，华国锋接替周成为总理，毛去世后，华国锋又接替毛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共领导层中极端激进分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行动。这次行动为邓重新复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的平反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展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政治关系

邓小平能够几次被打倒又几次复出，往往使外国的评论家们感到困惑。面对这样一个明显不可思议的人，一些人提出的解释是邓只是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能够而且也愿意和几乎任何人一起工作。比如，比德斯基说“他不是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他是一个调停者，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改革者。”(13)无疑邓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他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已经显示的和后来清楚表明的那样，虽然他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但他对未来确实有一种相当明确的政治远见。对邓的这种大起大落的政治经历，可以从中共政治领导的特点中而不是那些有关邓的文件档案材料中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释。

中共领导层内的斗争及解决的方式具有其自己的特点（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中国的清洗在涵义上与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沿用的那种血腥的清洗截然不同）。(14)实际上，尤其是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领导层的斗争经常导致暴力和致人于死地，但在 50 年代前，中国的传统并不是这样。尽管在毛的统治下这种传统多少有点改变，但是，领导干部能够被逼迫接受再教育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始终是中国式清洗的出发点。

无论是否完全由于这种原因，显而易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原先共产党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和解放军的领导人，周期性的失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明显，邓小平的情况是最引人注意的，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因为各级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在位，但在 1966—1968 年间被打倒了，到 1978 年又都重新回到了至少与以前同样高的职位。

“大跃进”开始时打倒了一些干部，原因是由于他们公开反对或被怀疑反对毛泽东思想。到 60 年代初期又恢复了这些干部的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干部又被撤职，在 70 年代初期或末期这些干部再次恢复职位。(15)

从 1949 年到 70 年代末期极不稳定的中国政治生活，总是相应地配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这里的领导不是指某些具体的个人，而是指一个领导集体。在那些年里，每四五年就换一次，随着每一次变化而产生的不仅有新的政策，而且有新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但是，在一起扛过枪，打过仗，在 1949 年夺取天下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只有当生理和政治因素都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时，在 1985 年才开始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在此之前，领导班子的调整几乎没有吸收年轻的或有着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正是那种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吸收新鲜血液给领导班子注入新的活力的模式。(16)

对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是由于 1949 年时中共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当中共夺取政权时，它的领导人在中国或世界上来说都是相当年轻的，比如，毛是最年长的之一，才仅有 56 岁，邓是 45 岁。因此当时他们不需要培养接班人，也没有一个领导层的新旧梯队建设的全面规划。到了大约 17

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正如毛明确说过的那样，虽然培养接班人是非常必需的，但这个问题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淹没了。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另一种解释认为接班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共内部的派性和地方主义。(17)中共的领导层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某一派系组成的。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们在一起进行互相保护和互相帮助。派别组织是由于忠诚关系、生活背景、友谊、思想观点，对某些具体政策性问题或个性的看法等因素形成的。然而，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是极易变化的，不像日本自由民主党内的派别活动那样制度化和有高度的组织性。由于传统的和当代的原因，高度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中共领导的一贯作风。中共继承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的是在西方不可想象的那种以和为贵。同时，中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儿得到的遗产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真理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者。

由于派系活动的纵横交错、复杂多变，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因此使得一件事的决定变得很难，即使是在中央政治局这样小的范围之内也是如此。(18)与个人之间有必要建立某种联盟，但由于没有人想自找倒霉，所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对站在“错误”一边的惩罚往往是相当严厉的。在领导层内部有一种维持现状的内在倾向。通常情况下变革是以试验性的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并且还要在察觉不到权力平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给领导层巧妙地施加压力，然而，随着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可察觉到的外来的威胁，或者领导层自己内部由于有人去世或得了重病而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会迫使领导层做出某种决定，于是很快地会激发起派系组织的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显著的、突然的、更广泛的变革。

邓在 1966 年和 1976 年被解职都表明了对他政治远见的否定，至少也是暂时否定。然而，从邓的思想中无法找到有关他经历的详细解释。事实上，很明显思想体系从来都不是党内派别活动的唯一决定因素。有些领导人根本不清楚思想体系、政策或派系和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领导班子的变化可能引起政策的变化，但派别活动几乎并不是只以政策为基础的。事实上，同属一个派别的成员甚至可能并不持有同样的思想观点或政策选择。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显明的命运对比。在这两个人中，邓和毛的关系更密切，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俩的关系大约已有 30 年的历史了。陈云和毛的关系尽管也好，但根本算不上密切。在 50 年代的辩论中，陈是反对毛的发展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有时是唯一的代言人。邓往往也有不同意毛的观点的时候，但决策一经作出，尽管他也有保留意见，但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有时还热情地发言。而且，他对毛个人的忠诚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人都受到了批判，但邓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

似乎忠诚关系比政治见解更能决定某些领导人未来的前途。在个别人的经历中形成的忠诚关系把他们和某个特定的领导人或同事结合在一起。正如本章中下一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所提出的，邓成功的一个主要秘密是他的忠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年龄对他的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 16 岁受到政治的影响，开始和中共初创时的一些领导人交往。在那之后，由于参与各地各方面的党务工作，他建立了各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他日后直到他退休提供了广泛支持。所以，邓和其他领导人不同，如果一些人不支持他，他总是能够找到另一些支持他的人，尤其是当他被卷入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斗争中时。建国时他的年龄是领导班子中较年轻的一个，由于他年轻，因此与其他大部分战争年代的幸存者相比，他能够在共产党内度过的时间更长、经历更丰富、工作更有活力。邓似乎并不像毛和周那样有明显过分的雄心。然而，他除了是一名极好的政治组织者之外，还是一个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他用双手抓住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

争论与人际关系

说邓有一段争议的生活经历，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不合理，也不是这本传记的目的。然而，他在党内外的斗争有亲身的体验。他曾多次受到过纪律处分，众所周知他在 1933 年、1966 和 1976 年被正式免职，无论是他自己受批判，或者是受他人牵连而被批判，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总有许多插曲，这些插曲总是有点模糊不清。这一节的要点是指出邓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并解释他个人的政治关系和他过去新交往的人是怎样帮助他克服困难的。当然关于这些事情，还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的判断——最终的或其他的判断：很明显，当这些事情是一些当代政治生活中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时，解决是很困难的。这一节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整个传记的许多部分都不得以推测或人所共知的设想为根据，更确切他说，其目的是要突出邓的生涯中容易能引起争论的一些事情。这样，既可说明在传记后面出现的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又可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了解这些事情。

假定在 1931 年早期对邓的支持是来自上海中共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周恩来的活，那么这似乎是合理的。周曾在 1924 年吸收邓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俩不仅工作关系很融洽，而且个人关系也很密切。按照邓的话来说，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个兄长”。(19)当邓在 1927 年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南下时，周又让他到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在那儿他在另一位也曾留学巴黎的党的积极分子李维汉的手下工作。当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上海时，邓和李还有周也都去了上海。邓榕对周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与邓和他的新婚妻子张锡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亲密关系作了生动的描写。(20)

1933 年发生的事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1931 年，邓随着中共中央委员会也到了中央苏维埃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发现自己成为苏维埃边区所辖三个县的党委书记，当时那儿共产党的统治还不稳固，其中寻乌县曾是毛泽东在形成他的动员农民思想的过程中调查过的一个地方。不管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由于党内的争论，使邓从毛的思想中体会到了更多的道理，所以邓和毛站到了一起。由于在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丧失了寻乌及周围地区，邓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另外的三个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纪律处分。(21)肯定是历史混淆了邓应负的责任。

给予邓明显支持的那些人有：毛泽东。事实上，毛对邓小平的信任可以追溯到 1933 年这个时候，因为毛泽东才是那次运动的真正目标，而不是那些被打倒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毛的追随者们。除了和毛之外，邓还能依靠其他一些人，这些人是他在党的活动的早期结交下的朋友。尤其是王稼祥，邓和他初次结识是在莫斯科，那时他们都是学生。当邓被下放到中央苏维埃地区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时，正是王帮助了邓，给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找了个工作，并很快成了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他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开始了长征，

在周恩来的推荐和毛的支持下，他参加了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22)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邓和毛泽东的关系既复杂又难于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的修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无法知道。“文化大革命”前，邓被看作是“毛的人”——是忠于毛的、最受毛信赖的和最能干的毛的追随者。当邓在 1966 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时，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自 1978 年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央在 1981 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的历史问题做出了一个标准的解释后，有人曾试图把邓和毛区别开来，尤其应该区别开来的是自 1957 年以来毛的一些政策的糟糕的过火行为。

邓在“文化大革命”前走过的路表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个人关系的重要性，毛对邓的态度明显是很重要的。毛曾多次表露，他没有用对刘少奇和其他反对过他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邓。1972 年，毛尽管没有原谅邓的“严重错误”，但也指出他“没有历史问题”。(23)可能是他们 1966 年之前如此长期的亲密关系促进了邓的复职。邓与周恩来早先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邓 1973 年复职后，两人在工作上一直亲密合作。此外，在 70 年代初期，中共领导层内的人员组成中，来自抗战期间太行区的邓的同事和部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73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 16 名成员中就有 6 名是来自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老干部。(24)

邓在 1976 年被解职和在后来的 1977 年复职似乎是 70 年代中期中共高层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当时的毛泽东是在别人的控制下，不能正常地行使职责，还是他本人犯了明显的错误，这一点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然而到了 1975 年，邓提出今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结果时，很明显并不是他一个人在作那种努力。1976 年 1 月他被解除了所有职务，天安门事件为他的正式免职提供了借口。这时邓受到了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的保护，被送到广州军区，当时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在毛去世和逮捕了“四人帮”之后，邓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是一个胜利的标志，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活动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层中，从 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邓小平退休这段时间内仅仅有 87 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 1966 年之前，战争年代同甘苦、共命运的经历减缓了政治斗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使人普遍感到有一种“大家庭”的温暖。在邓小平的经历中，这种“大家庭”的感觉和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结合更为突出。在中共和它的领导班子内部也有些人和邓的关系很不好——林彪和江青就是明显的例子。

注释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辞职在时间和实际的执行中还有点模糊

不清。在 1980 年提出了让邓担任中共主席的职务，但是邓拒绝了。胡耀邦在回忆中说，在那以后中央所有的人都认为邓是政策的“总设计师”。在 1989 年 5 月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据报导赵紫阳指出：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的辞职更准确地说是从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开始的，赵还说：“总设计师”这个称呼不是为了好听，而是在政策的最后决定过程，邓确实发挥实际的作用。

在 1986 年，邓还被提名为同样的荣誉的称号，正如派伊报所指出的那样，有两次介绍性的文章没有把他们所赞誉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邓小平本人联系起来。见：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载在《中国季刊》1993 年 9 月第 135 期第 416 页。

邓在莫斯科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张锡瑗，1928 年在上海，他们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结了婚。张锡瑗在 1930 年生孩子时死了。当时邓小平正在广西工作，正好在张锡瑗死的时候他回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广西的情况。1931 年，中共中央撤到瑞金时，邓和金维映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们结了婚。邓在 1933 年受到李维汉的批判后，阿金和他离了婚，嫁给了李维汉。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邓和李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以妻子作为交换的代价，邓也许受到较轻的处罚。（江直锋：《王牌处境的中南海桥局》旧金山，民主中国书林，1990 年第 43 页）虽然这完全是有可能，但一个更有理的解释应该是阿金要离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邓的失宠给她带来的牵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邓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经历表明，当时完全可能是邓为了保护他的妻子，主动提出了离婚。显然，邓是通过同事的介绍和他的第三个妻子相识的，他们俩结婚后，共同生活了 50 多年。（根据一条消息来源见杨中美：《胡耀邦传》纽约，M·E 夏普出版公司，1988 年第 113 页。）

可能是胡耀邦把卓琳介绍给了邓小平。邓的女儿说：邓和卓琳相识邓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接着又说：在促使邓和卓琳结婚的过程中，中央的其他领导也起了作用。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在婚姻中作媒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217、277、288、117、431 和 432 页。

例如，1991 年 6 月邓为第二版《毛泽东选集》1—4 卷题写书名。尽管在邓的女儿写的书中毛不是主人翁，但书中许多地方引用和参考了毛泽东思想。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 年 5 月 24 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51 页；《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 年 7 月 21 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55 页。

钱听涛：《邓小平关于黄猫、黑猫比喻的出处》载自《中共党史通讯》第 12 期，1990 年第 6 页。

这个观点主要见于 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载在《中

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特别是见随后的第428页。这也是中国许多人热讽冷嘲所持的观点。

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415页。

叙述了邓的地下工作，虽然很平凡，但是随时都有危险。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89页。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二版）伦敦，戈朗兹出版公司1968年第190页。

英语描述优点流畅，但需花费很长时间阅读的书是：Harri-son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纽约，哈普尔·罗出版公司，1985年。

(11)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辩论的重要性，往往受到忽视，主要是由于中共自己的判断——见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在1959年偏离中共中央循规蹈矩的纪律约束。见F·C·泰维斯和瓦伦森：《毛、邓子恢与农业合作化政治》载在《中国的法律与政府》1993年第3—4期第26卷。

(12)罗德瑞克·麦克法克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6页。

(13)R·彼德斯基：《邓小平的政治观点》载自《亚洲的思想与社会》1988年1月第37期第13卷第3页。

(14)论述中国清洗的权威著作是F·C·泰维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二版）纽约，M·E夏普出版公司，1994年。

(15)省一级干部这种上下交替的有关细节可见于大卫·S·G·古德曼：《1949—1985年中国的省级领导》卡迪夫大学出版社，1986年。

(16)关于省一级干部的这一点或有关特点的研究可见于大卫·S·G·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传略，1949—1978年》载自《英国政治学杂志》1980年1月第1期第10卷第39页。

(17)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派系活动或关系的论著特别的多，最重要的那些论著可能是：卢西恩·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剑桥出版社，1981年；安德鲁·内森：《中共政治中宗派主义的一种模式》载自《中国季刊》第53期第34页；W·维持森：《中共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载自《中国季刊》第37期第1页。

(18)K·里伯赛尔和M·奥克斯伯哥：《中国政策的制定：领导、组织与程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大卫·S·G·古德曼：《中国政治的变化：权力、政策与程序》载自《英国政治学杂志》1989年7月第19卷第425页；T·周：《研究中共政治中的非正式组织序言》载自《中国季刊》第65期第98页。

(19)《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

(20)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 193 页。

(21)罗福：（音）《罗明路线在江西》1993 年 4 月 15 日；罗迈：《为党的路线而斗争》1933 年 5 月 6 日均见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编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51—355 页和第 362—367 页。

(22)本杰明·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员》科罗拉多，威斯特约出版社，1990 年第 107 页。

(23)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 318 页。

(24)陈锡联、纪登奎、李德生、刘伯承、苏振华和许世友。

第二章 童年时代、青年时代（1904—1937）

邓小平与其他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同，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漂泊中度过的。1920 年他离开四川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去了莫斯科。1927 年回国后即投入到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主流中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些年对于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动荡不定的，事实证明，他在这些年中，通过与两个人的交往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来他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极其重要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在法国，后来回国后，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早期他数次和周恩来一起工作；三十年代早期在江西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初次和毛泽东密切交往。

家庭背景与早期生活

邓小平于 1904 年 8 月 22 日生于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取名邓先圣，然而当他五岁时在一家私塾上学时，他的新教师认为这个名字（意思是圣人的先辈）不合适，是对孔子的侮辱，马上把它改成了希贤。

与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邓小平这个名字当时采用的是化名，这在 1927 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初次爆发时，在那种情况下他这样做已是司空见惯。1929 年，他作为一名政治组织者去了广西。又一次改了名字改为邓斌——尽管是暂时的。邓小平的童年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未受民主政治影响，而是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闭塞的社会。虽然现代教育正在引入，但邓小平所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在一所传统的古典式的私塾——一种通常为地主的儿子们所开办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普通教育学校。旧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甚至当邓小平到达法国在马赛进行侨民注册时，宁愿根据中国的农历来把他的生日定于 7 月 12 日（即农历七月份的第 12 天），而不愿根据西方的阳历来计算。

邓小平的家在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在重庆以北约一百公里处。重庆是长江沿岸从上海逆流而上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距上海约 2500 公里，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都市。但是，与四川省成都西面毗邻的一些地方相比，它并不怎么富裕。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出租土地的小地主，他后来在地方政府做一名小官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邓家是在明朝第一代皇帝时期从江西迁到广安的。据邓格所述，邓家的家境一直很贫困，直到邓小平的祖父成为手艺高明的手工业者才积存了一点财产。一些评论者曾经提出邓小平的祖籍是广东省的客家人，借此充分显示客家人的勇猛、顽强、好斗的名声。但据可考证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个家庭曾经是客家人的话，他们好像早已丧失了这种特性。当然也没有任何特别的证据能把邓小平和客家人的背景联系起来。例如，他似乎不说客家话，而说的是明显带有四川口音的汉语。事实上，我们通常用四川人的而不是客家人的特点来描写邓小平，比如对于四川人我们往往用他们以吃辛辣食物闻名的特点来描述他们。四川人的性格比较暴躁——导火线很短，很快就着火，但平静下来后，不记恨人也不害人。

邓文明另外形式的一种财富在他的家庭规模上可以反映出来：他共有 4 个妻子、7 个孩子——4 个儿子、3 个女儿。他的第一个妻子姓张没有孩子；第二个妻子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第三个妻子姓萧，在他的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第四个妻子名叫夏伯根，带过来一个女儿，又生了两个女儿。邓小平是由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所生的长了，但不是最大的孩子，有一个姐姐叫邓先烈，邓小平的亲生母亲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便早早地去世了，似乎邓小平同他父亲的第四个妻子夏伯根的关系比较好。几年之后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时，夏伯根随着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去了江西，邓小

平和孩子们都把夏当作他们的奶奶，尽管实际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邓小平离家后，尽管他很想同家里联系，但都始终没有联系上。有趣的是直至 1993 年，他的许多兄弟姐妹——包括他的姐姐——都还健在。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继母夏伯根在一起。邓小平的一个弟弟邓垦，生于 1910 年，起初在广安县任小学教师，后来成了一名报刊编辑，他于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去了延安，在新生的新华社工作，1949 年在重庆市任副市长，后来调任武汉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走资派”受到了批判，——无疑是受到家庭牵连的一个典型事例——后来得到平反，1982 年退休时任湖北省副省长。

邓小平的另一个弟弟邓蜀平却没有这么幸运。邓蜀平生于 1912 年，在他父亲死后，成了一家之主，在国民党政府中任一地方官员。1949 年后在大学里攻读法律，先后在贵州省（在四川省南面）、重庆市任职，“文化大革命”中因接受不了红卫兵的批判——可能由于他早期在国民党内的经历和与邓小平的关系双重缘故——在 1967 年自杀了。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于 1936 年去世。

1909 年，邓小平 5 岁，就进了私塾，开始走上了传统的封建之路，接受孔子经典著作的教育。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解体，随着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那种科举教育已对他毫无意义，于是邓进入一家教授现代课程的小学上学，后来毕业于广安县中学。不久，他去重庆求学，然后又去了法国。留法学习的动力来自他的父亲，那时他父亲在重庆，鼓励邓小平和他的弟弟（邓小平的叔叔）还有另一个亲戚来到重庆，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进一步学习。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二十世纪早期的几十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挑战，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尽管许多问题都是由十九世纪殖民者入侵中国而引起的，但由于当时形成的一种与西方互补的依赖关系，有些中国改良主义者提倡把西方的观念和教育体系作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重新富强起来的一种方法。李佑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经留学巴黎南部的蒙达尼，1912 年在蒙达尼市的市长和其他几位法国知名人士还有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李佑英创立了“留法俭学会”。

到 1919 年，已经有许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尽管像李佑英等这样的留学生起先很可能是靠他们的父母支付其学费，但很快就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代之而起的是半工半读运动的发起——用中国话来说即“勤工俭学”，字面上的意思是“勤奋地工作，节俭地学习”——实际意义是在国外的中国学生的学习是靠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随着“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诞生，许多中国青年被这既能出国旅行又能显示爱国热情的好机会——出国勤工俭学——所吸引。

如果中国学生要在法国居住生活，他们就必须学习法语，1919 年，吴玉章，中国革命党的成员之一，在重庆为四川学生开办了一所留法预备学校，

邓小平和他的亲戚进入了这所学校。 1920 年，邓小平的班里大约有 90 名学生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后被选送去法国。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都被选中了。1920 年 9 月 11 日，这群学生离开上海，登上了开往马赛的法国海上邮政船盎特莱蓬号，直到 1920 年 12 月 13 口才到达马赛。戴维·鲍那维在他的传记中推测邓小平离开故土到法国，暗示了邓与他的家庭之间可能有一些磨擦，因为邓小平是长子，家中至少希望他能呆在家里，准备将来在邓文明死后继承父业，支撑起整个家庭而不是去法国。然而本杰明·扬提出的观点正好相反——邓小平的父亲希望儿子追求更崇高史伟大的事业，追求他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

法国生活与中国政治

尽管邓小平在法国度过了五年，从 1920 年 10 月到 1926 年 1 月——从 16 岁到 21 岁——却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在那些年里变成了亲法者，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另一方面，他确实某些领域里获得了一些西方生活情趣，他喜欢足球和法国菜就始于那个时候，特别是羊角面包，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上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流亡在北京时，常常喜欢做法国菜，而且常送一些给邓小平品尝。邓小平曾向杨尚昆说他在法同的生活时：“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有趣的是在巴黎获得这些乐趣，好象是胡志明教会年轻的邓小平的。1974 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中，邓小平去了纽约就一心想买一些羊角面包，后来有人建议既然回国要经巴黎，在巴黎买更好。这次他在巴黎买回一百个带回国，送给周总理和其它那些早年在巴黎就喜欢吃羊角面包的老同志们。(11)

从邓小平和杨尚昆的谈话中似乎表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年代早期的法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中间阶段，工作非常难找，中国人当时很快就发现他们持有的中国的学历证明资料在进入法网高等院校时不能被接受，他们的法语口语还不能应付学习的需要。大部分人想漂泊到巴黎到那些雇用大批外国工人的大型工厂去打工，如巴黎南郊的比顿占尔市的雷诺汽车厂，邓在法国的最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儿打工度过的。在那里他们这些人同甘共苦，非常亲密地住在一起，许多人由于政治的原因或社会的原因加入到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

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可靠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警方记录。然而邓小平直到 1925 年才受到警方严密的注视。(12)因此，邓小平在法国的前一段时间用来周游法国各地，在这段时间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机上当司炉和在厨房帮工——能找到什么工作他就干什么工作。他从马赛到了巴那，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三个月，钱用完后，他漂泊到位于巴黎西南郊的拉加雷纳科隆市的华侨社区，进入一家工厂工作，正是在这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和其他三四个活跃的中国青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尽管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邓当时被马上吸收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后来到 1921 年他在克鲁梭钢铁厂工作，直到 1922 年初终于到达蒙达尼，此地肯定是他离开重庆时计划要去的地方之一。

二十年代初的蒙达尼是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偏僻的城镇，那儿的居民们如果知道当时他们正在接待的这批激进的中国工读学生是后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物，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学生不仅来自四川，而且来自其它各省，包括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湖南长沙。到达蒙达尼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形成的核心。新民学会是由蔡和森和毛泽东于 1918 年在长沙创立的，1919 年该学会积极组织了青年学

生去法国留学。毛泽东留在国内。但蔡和森和其他成员到了国外，这些人包括李维汉，邓小平就是在这时认识他的。这些人加入了蒙达尼学会，许多人都像邓小平那样在哈金森的橡胶厂做工。

这个时候是邓小平呆在蒙达尼最好的七个月，然而快到 1922 年底时，他又要走。这次是去塞河畔的夏狄戎。在那儿他进入中学学习。1923 年初，他又回到了蒙达尼，回到了哈金森工厂，在那儿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记录卡不仅记着他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工作，而且还表明 1923 年 3 月后他就不再被重新雇用了。(13)尽管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再雇用邓了，但很可能是因为邓小平频繁地参加政治活动导致了与中国社区内部的紧张关系造成的。邓小平在蒙达尼呆到 1923 年 6 月，后来回到巴黎西南部，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做钳工，他一直呆在那儿直到 1926 年 1 月才离开法国。

有理由认为邓小平在法国的活动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1936 年邓小平告诉埃德加·斯诺：他是由法同共产党转到中国共产党中的。(14)虽然这不一定是事实，但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很早就得到了清楚的显示，1922 年他很快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工作中，当年和他一同赴法的一位同事回忆起他们到达马赛时，邓小平负责安排四川学生登陆，帮助他们提行李的情形，而其他新来的学生却留在船上不知道该干什么。(15)他的组织能力很快应用到政治活动中。1922 年邓小平加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这个支部是由当时在法国的激进的中国人包括周恩来和蔡和森创立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前身）。就邓小平本人而言，据他女儿说好像是 1924 年 7 月 15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领导组的五个成员之一，根据党章这就使他承担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员的责任。(16)

周恩来开始作为青年团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双月刊的编辑。邓小平和他一起工作，负责出版。实际上文件和刊物大都通过手刻的蜡板和用手滚动的油印机印刷出来的。邓小平负责大量的具体工作，从那时起一直是油印大部分团的后来是党支部的材料，直到离开法国。当巴黎警方在 1926 年 1 月 8 日搜查他的房间时，他已经离开法国到了苏联，警方发现两台油印机的全部零件、滚筒和几包印刷纸。(17)由于这段经历，他的同事倒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油印博士”。

当周恩来 1924 年离开法国回国时，邓小平接替了他的中央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于是他很快成为法国中国共产党的比较老资格的成员之一，尽管他当时年仅 21 岁。1925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些示威者向中国政府驻法公使馆发动了袭击，此举象征着和上海的共产党及工人们团结一致，大大惊动了法国舆论界，导致了大约 50 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驱逐出境，又有大约 50 多人自愿返华。邓小平被选为新的党支部领导人之一时他发现他已处在警方的密切监视之下。

1925 年后半年，邓小平分别在巴黎举行的几个会议上就如何促进中国共

产党事业的发展 and 当前的中国形势发了言。会议中，由于中国留法学生内部意见的对立，分化成亲共和反共两大派。有一次会议几乎是在互相对打中结束的。据报导，当椅子在空中横飞时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另一件事是他离开法国的前五天，在激烈的辩论中，邓小平认为中国北方军阀将领冯玉祥将军应该和苏联结盟，奇怪的是，在刚一年多一点之后，邓小平就被派往西安和冯玉祥一起工作。法国警方在 1926 年 月 8 日搜查了邓小平在比扬古尔市的住房，然而邓小平和他的伙伴们在前一天已经离开了法国去了莫斯科。

从学生到政治工作者

在莫斯科，邓小平终于有机会能够深造了，尽管这里的学习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学术上的。他循着早年的中共党员踩出的路从欧洲来到了莫斯科，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许多中国人就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山大学就读，后者创建于 1925 年底，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最好的时期，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资金主要是富裕的国民党党员捐赠来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岁月，不仅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互相密切合作，而且中国学生自己也卷入到苏共党派内部的冲突之中，并受到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拉拢。

邓小平在莫斯科结识的人中可能有陈绍禹，当时陈的这个名字比他以后所用的王明这个名字更有名气。王明就是自 1930 年底至 1935 年初一直统治中国共产党的 28 名布尔什维克中的最高领袖，还有张闻天，也是这 28 个人中的其中一员。邓小平在中山大学的这些同学中还有三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当时他并不认识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后来国民党退守台湾，其父蒋介石死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另一个是王稼祥，也是作为 28 名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回国的，他后来较少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后来证明：在 1935 年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王稼祥给予了毛宝贵的支持，并且是长征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毛泽东、张闻天一起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1933 年当邓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时是王稼祥立即伸出援助之手；第三个同学是冯玉祥的大女儿冯辅能，1926 年冯玉祥去苏联寻求援助，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军阀将领，而是一个接近共产党具有高度严明纪律的基督教将军。尽管他基本上是反共产主义的，但准备暂时接受苏联的援助，然而共产国际的援助是建立在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并参与蒋介石重新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北伐——的基础上的。这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冯玉祥回国时随行的大约有一百多位共产国际的顾问，包括好几个中国人，这其中就有邓小平。(18)冯玉祥的国民军是以中国西北部的西安为基地的，在军队的总司令部下有几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军官们，当时他们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都是国民党员，建立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邓小平在该校担任政治指导员，帮助培养未来的军官。但是到了 1927 年 4 月，这个计划不得不放弃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直到公开化。冯玉祥在这场冲突中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

邓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小平，南下到了长江沿岸的武汉，又一次和周恩来到了一起。不知是由于他和周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的资格比较深，邓被分配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当时中央委员会总部设在武汉，国民党已经分成两派，左派总部设在武汉，远离蒋介石的影响。中共把它的中央秘书处也设在此地，似是很自然的。因为它能提供一些政治保护。不幸的是，到了 1927 年七八月间，这个想法也不能如愿，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扰，国民

党左派也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迫使其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作为秘书氏也参加了会议。这次紧急会议认为总书记陈独秀个人应该对党的灾难负责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重新制定了一套新的军事起义方针，中共中央委员会（包括邓）秘密到了上海，在上海，年仅 23 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一个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行政职务，负责中共重要文件的保密工作、交通和财政事务。这段时间，对中共是一个考验，上海和其它城市地区的中共活动差不多全部转入了地下。1927 年到 1928 年。中共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 1927 年 8 月的南昌起义。

邓在 1927 年到 1928 年期间的活动鲜为人知，即使在他女儿写的传记中也只是泛泛而谈，大概因为中共秘书处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邓在日常工作中随时都会碰到危险，因此他的行踪始终都是秘而不宣的。后来邓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当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但他和他的妻子与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共住的一幢房子仅被搜查过一次。(19)由于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共产国际想继续控制中共的双重原因，1928 年 6 月第六届中共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共新集体领导班子大部分成员包括周恩来和领导抨击陈独秀的瞿秋白都去了莫斯科。然而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李维汉，——邓在蒙达尼认识他的——在大会期间留下来负责中共的日常事务，邓成了他的助手。

1928 年春天，通过一张私人纸条的联系，邓第一次结婚了，他的妻子是张锡瑗，一个通晓欧洲语言的专家，也在中共秘书处工作，他们相识于莫斯科，在上海结的婚，不幸的是，这仅是一个短暂的婚姻，她在 1930 年 1 月死于难产后的一种疾病。尽管 1929 年 9 月中共中央派邓去广西组织政治活动，他在 12 月下旬的某个时候曾回到上海汇报工作，他妻子死时他正在上海。

(20)

广西与农民起义

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共要执行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路线，要在中共领导下发动农民，要建立农民苏维埃，要把农民起义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在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29年4月，邓小平被派往中国西南部的广西省帮助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小军阀李明瑞，和在二十年代早期举行过一次农民起义的韦拔群，就这一点与历史记录极不一样，据胡华的回忆，邓通过越共胡志明的帮助到了广西。邓和胡是在巴黎认识的，当时胡正往在上海，赶来帮助邓。他建议邓把自己装扮成商人，并告诉他如何对付途中的检查和盘问。在邓斌这个化名的掩护下，邓小平先乘船到香港，然后在印度支那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下又乘船到了现在越南的海防，然后由陆路通过西南重折进入中国。虽绕了远路，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可能是最安全的路，也是最快的路。但据邓榕所述，邓小平乘船到了香港，然后由陆路通过广州到了广西。(21)

广西的形势也很复杂，好几年来中共一直设法在此地开展活动。(22)邓这时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被派往广西组织政治运动的中共干部，在两年前还派过于绍杰和张云逸去广西。中共的支持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农民运动；另一个是地方军官。广西的汉人占广西总人口的一半，其余的一半是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壮族，事实上他们是整个中国除了汉族以外的最大的民族，占到广西人口的大约35%，广西的壮族人除了那些居住在西北部左、右江流域的贫困边远山区的人们外，大部分经过上千年的熏陶都已经被汉人彻底同化了。那些剩余的壮族人和广西的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都是属于地方性的。二十年代初，政府的垮台导致了以韦拔群领导下的以右江北的东兰县为基地的壮族农民运动的爆发。起先被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打败，韦到广州的中共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后回到广西再次发动农民运动，这一次运动开展得比较成功，1926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韦拔群对东兰县的控制。主要和韦打交道的那位国民党人也是中共的一个成员，他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了韦和其他农民领导人，稳固地建立了壮族农民运动组织。就是到了1927年，当国民党矛头对准中共时，该组织仍然能够幸存下来。

二十年代中期，桂系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是桂系军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广西境内。桂系领导人李宗仁不仅反对共产党，而且也不买蒋介石的帐，不过他的许多军官都带有“左”倾思想或者是中共党员，俞作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中共的支持下策动军官们背叛李宗仁投降蒋介石那边，结果不仅使蒋打败了桂系，而且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李明瑞也在广西掌了权。这就是邓小平于1929年到达广西省会南宁市时所遇到的形势。在南宁，邓和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的中共老战士张云逸开始着手组建由原先的共产党士兵组成的两个派，继续贯彻俞作豫的向右江

流域的壮族起义提供援助的政策。1929年9月，在南宁举行了中共代表大会，同意建立一个红军部队并将农民武装起来。这个月底，李明瑞和俞作豫被迫进行了反对桂系新军的战斗，但是由于没有邓和张云逸所率的两个旅的支持，当时这两个旅已沿右江往上到了离东兰县的韦拔群不远的百色，因此，李和俞很快被打败了，李撤退到了百色。

百色位于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的中心，就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仍十分落后，因此它是全国六个接受特殊救济的最贫困县之一。(23)在百色，中共采用了一个组织动员农民运动的计划，很快收到了效果。要使地方人民和红军新战士接受政治教育，军队不仅要在数量上有所扩大，而且要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武装起来，要没收地主的财产，开展土地革命。到12月，邓、张云逸和韦拔群一起组织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很快在有一百多万人口的二十多个县相继建立起来，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24)尽管百色起义那天(1929年12月11日)邓好像没在百色，而是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去了。

在成功的鼓舞下，起义迅速波及到左江的龙州。1930年2月，建立了第二个苏维埃和红八军。国民党政府在两个月内镇压了龙州起义，红八军的残余部队向百色转移，但百色的形势也不如起义开始时好办了。右江苏维埃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它没有解除它的敌人和地方民团的武装；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它不注意自己的形象，没有严明的纪律，它在老百姓心目中仍被看作是像军阀那样胡作非为的军队。——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地方观点——因为当地的壮族不可能是像反共的汉人那样反对汉人的共产主义者。当右江苏维埃努力发展壮大时，它发现一旦红军离开这里继续向前推进，地主们能够毫不费力地重新获得他们的统治地位，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邓2月份从上海返回广西，他似乎主要致力于右江苏维埃所属部分——东兰的农村土地革命上。到了8月，军事形势越来越恶化，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采用了一个新的城市暴动的方针，命令红七军离开它的根据地，向桂林、柳州（都在广西）和广州进发，以致韦拔群领导下的当地壮族人和邓小平的部队发生了冲突，这并不奇怪，因为韦想违背中央命令留下来，而邓尽管已发现这些命令极不切合实际，但仍觉得应该服从，结果邓和张云逸率红七军的大部分（大约7000人）在9月向柳州进发，让韦拔群带领一小部分兵力继续留下，苏维埃几乎马上就遭到了袭击，彻底被打垮了。10月，邓和张云逸去柳州的途中在河池召开了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一致认为遭受损失后要重新组织军队，重新确定其目标。最后会议决定不去柳州而向江西的南部毛泽东建立的农村苏维埃进发，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行军；红七军先进入广东北部，又返回到广西，在通过广东、湖南去江西的路上，邓和张云逸失散了，并一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1930年2月，红七军重新组建后攻占了江西的崇义县城。红七军到达江西时已经不到4000人了。

江西、毛泽东与长征

离开李明瑞和红七军后邓小平去了上海，又遇见了周恩来和去广西以前曾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不论以什么方式，邓关于广西起义的报告被接受了，没有遭到太大的批评，因为不久，在五六月间邓小平被派往安徽代表中央巡视检查安徽党的工作。(25)这时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已被 28 名布尔什维克所取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王稼祥，邓在苏就认识。尽管新的领导很勉强地接受了毛泽东正在江西所寻求的一条虽然缓慢却更合实际的革命路线，他们一致认为江西应该是中共活动的中心，因此在 1931 年的前半年决定把党中央迁到那儿。和毛泽东关系密切在李立三时期幸免于难的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 年中期，邓小平调往江西，在这甲他被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接着又被任命为管辖着会昌、安源和寻乌三县的会昌边区区委书记，这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和毛泽东进行密切交往。寻乌县在毛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通过一系列到农村的调查发展了这个战略，其中有一次就是以寻乌为调查基地的。(26)虽然没有当时邓对毛的农民政策观点的任何记录，但邓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通过江西南部 and 右江苏维埃内发生的事件对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后来当邓在抗日战争中和四十年代中期担任太行山区的领导时，他反复强调政治教育与生产斗争和游击战的重要性。当邓刚到瑞金时就发现许多党员都在等待处死。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可疑分子进行政治审查，斗争的扩大化，使许多无辜的人遭到残酷的迫害。邓迅速制止了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并强调所有的案子均应该根据党章来进行处理。立即释放那些被非法拘禁的人，当周恩来年底到达瑞金时，他完全支持邓的行动。(27)

邓在瑞金任职时间不长，当更多的人员被调到江西苏维埃时，邓又被提升了，调到了会昌边区，负责会昌、寻乌和安源的工作，尽管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只有会昌县。(28)1932 年时，邓小平已经明显地成为毛的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友谊逐步加深，这一年他成为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但此次任职也不长，不过这次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如曾经指出过的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两派，他们之间产生了相当紧张的关系，一派是毛和他的追随者们，另一派是 28 名布尔什维克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当后者迁到江西时，他们试图撤销毛及其追随者的职务，并把他们的政治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们反对毛的游击战的观点，强调放弃地方武装，应创造单一的强有力的正规化的红军，并教条地认为，土地革命不仅应该剥夺地主的土地，而且应剥夺包括富农、中农的土地。

大概因为他在广西及后来在江西的经验，邓小平发觉自己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中央的意见相左，他特别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进行，保证群众对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支持，必须要有一个稳妥的经济环境来维持粮食的供应，因

此很有必要对比较富裕的农民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1933 年曾是李立三同事的福建省中共领导人罗明由于对动员群众的态度太消极,受到 28 名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实际上他仅仅是说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不可能仅靠一些慷慨的许诺就能被动员起来,不管群众对共产党员多么拥护,敌人反复的“围剿”削弱了士气,这是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的第四次“围剿”时期,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攻击毛和他的支持者们所持的观点,把他们与称之为失败主义的“罗明路线”联系起来。毛没有被点名批评,但其他人,主要是邓小平、毛泽覃(毛的三弟)、谢唯俊和古柏都被点了名。邓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他的职务,被囚禁和审问。邓也失去了他的妻子金维映,他是 1931 年在上海遇到她并于 1932 年在瑞金与她结婚的,在他受批判的时候,她和他离婚了,不久后嫁给了李维汉。不管在“邓、毛、谢、古”事件之前,毛和邓的关系如何,在这之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条牢固的政治纽带。

后来邓被派往一个贫困的边远山区乐安县的中共南村委员会工作后,工稼祥又一次帮助了邓。邓在南村大约呆了十天后,王派邓到他所领导的红一军团的总政治部工作,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后来又在宣传部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军队机关报《红星》,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结束。

当中共中央机关在 1934 年 10 月 10 日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时,邓小平也离开了这里。但关于邓参加长征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当邓的女儿问他长征途中干了些什么时,据说他只简单地回答:“跟着走”,尽管他确实记得他爬山时曾经丢了马,丢了大衣,还丢了一卷干肉。(29)根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当长征开始时,邓仍处于被半批判的状态中,后来他染上伤寒,因此在长征途中他的身体没康复,直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30)

邓的命运转折点,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转折点,都是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推翻了“28 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并采用了毛的方针政策。邓当时是徒步离开瑞金的,一个较年轻的同事记得和邓一直走到遵义,但后来没有再步行。在获得毛的完全同意后,周恩来指定邓在政治局的遵义会议上进行几分钟的发言,(31)但没有记录表明他在那次会议上发过言,只是坐在一边,无疑他对大会的各项议程完全满意(32)。至于其它长征开始前支持毛的人都得到平反和提升。邓又一次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后来长征途中,当红军重新缩编时他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当红军 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时,红军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扩充加强受到严重损失的兵力。自二十年代后期,一个农村苏维埃已经在陕北这个地区建立起来了,现在得到逐步发展,后来在 1937 年 1 月把总部转移到了更著名的延安。1936 年前半年邓康复后,参加了红军向山西省进军的远征队中,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成了主任。这一职务是在他后来的十六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担任军队的许多高级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

注释

关于邓小平的家庭、出生地和去法国前的早期生活的资料，主要译自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6章，9—13章。

邓小平在法国生活记录的详细情况见诺拉·王《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刊载在《中国季刊》第92期第699页。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32页。

玛丽·S·艾鲍：《客家人的秘史：作为一种客家企业的中国革命》刊载在《中国季刊》第132期，第937页。

也许更有趣的是他尽管在法国呆了5年，但似乎不大会说法语。

细节源自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50页；在乌利·弗朗茨：《中国式的政治传奇》1987年第340页中列举了更多的孩子。

这段历史记录有点不太清楚，根据邓榕和其他人所述，邓在1918年去了重庆，进入留法预备学校，可是这个学校实际上直到1919年才创办，很可能是邓先进入一些其它学校上学。

历史记录有点不太清楚。根据邓榕和其他译文传记作者，邓乘坐盎特莱蓬号船于1920年10月20日到达法国。然而根据法国移民记录，他乘坐盎特莱蓬号于12月13日到达。事情的原委只能靠移民局作出解释。实际情况可能是邓到达日期早，但由于某些原因当时没有注册成功。法国记录可以在诺拉·王：《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刊载在《中国季刊》第92页）中得到核实，党史工作者们在《党史通讯》1983年第22期的第20—22页可以看到此文。

戴维·鲍纳维：《邓小平》香港，朗曼出版公司，1989年第7页。

《一位注重实效的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刊载在《中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44页。

(11)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37页。

(12) 诺拉·王：《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第704页。

(13) 乌利·弗朗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第47页。

(14)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99页。

(15) 戴维·鲍纳维：《邓小平》第7页。

(16)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21页。

(17) 甚至就邓榕在她书中所使用的材料来看，关于邓小平在法国渡过岁月的最可靠的资料来源是诺拉·王《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第704页。

(18) 严志新：《李大钊，邓小平与冯玉祥》，《党史通讯》第4期，1985年；冯洪达：《邓小平同志怀念冯玉祥将军》，《党史通讯》第7期1983年第26页。

(19)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93页。

(20)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83页。

(21)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第138页，报导了与胡华的会谈。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01页。

(22)关于广西起义及其结果的资料来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本杰明·杨《一位注重实效的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百色起义》见《北京周报》1979年2月9日第6期；戴安娜·拉里：《地区与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界的桂系军阀》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02—108页的《壮族农民运动和苏维埃》；袁任远：《广西右江的红色风暴》载于1978年2月9日《人民日报》和陈心得：《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载于《党史通讯》第1期1986年第25—30页。

(23)《贫困地区接受中央的援助》见《中国日报》1989年12月29日。

(24)这里有一些历史争议，本杰明·杨在《一位注重实效的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中对邓的红七方面军政委的任命可追溯到1930年9月，而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17页中说是1929年10月（大概他当时正好不在）。

(25)许竹凡：《邓小平1931年巡视安徽党务》，载于《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1993年第90页。

(26)罗杰·R·汤普森：《在寻乌发现了毛泽东的报告：邓小平写下了早期党史的篇章》载于《中共研究通讯》1989年第3期。

(27)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第139页。

(28)邓小平在会昌时的资料也许可以在下列书中发现：钟亚庆：《跟邓小平同志在会昌工作的时候》和杨国宇：《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29)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353、357页。

(30)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第139页。

(31)本杰明·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威斯特约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32)T·凯佩恩，《遵义会议和毛掌权后的进一步措施》见《中国季刊》第117页。

第三章 军旅生涯（1937—1952）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力量几乎都投入到这场战争的军事行动中或与战争相关的工作中。邓小平不仅从1938年1月开始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直到抗日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有后来解放军在五十年代早期对中国西南的军事行动中，都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邓小平步入军界，首先是毛泽东对他的信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在军队中地位越来越巩固，逐渐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威信，抗日战争结束时，作为刘伯承司令员政委的邓小平，他们所领导的军队被称为刘邓大军。

在邓小平和刘伯承密切合作的十四年中，首先是巩固了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的地位。后来又扩大了太行根据地和这支军队的规模。他们所建立的根据地最终合并成四个根据地——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根据地。这四个根据地组成了晋冀鲁豫边区（即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个边区本身最终成为1948年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雏形的华北人民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行政区。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刘邓所指挥的军队已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最强大的武装部队之一了。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征北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特别是著名的淮海战役。在1949年至1952年期间，刘邓在中国西南地区组建了共产党的政权。通过这些年的征战，提高了邓小平在军队中的地位，这在后来证明对邓小平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通过这些年的征战，使他获得了动员群众和执行政策的实际经验，这个经验对他未来的执政是很重要的。同时，这些年的征战使他获得了众多同事和部下对他的广泛支持，这些同事和部下在“文革”后的政治中成为支持他的核心力量。

八路军

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所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由三个师组成：由林彪领导的一一五师从陕西省三原地区向山西东北部挺进；由贺龙领导的一二〇师向山西西北部挺进；由刘伯承领导的一二九师向山西东南部挺进。1937年9月，按照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是这个军队仍然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它仍然保持着某种独立性，其原因就是在改编以前，共产党已成功地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广大青年纷纷踊跃参加八路军，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抗战开始时，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任弼时，邓的任务最初是分管宣传，后来他又分管征兵和动员工作。1937年9月初邓小平参加了由周恩来在山西省会太原（太原两个月后沦陷于日本人）召开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由阎锡山、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建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共产党代表。邓小平从太原和八路军总部一起转移到石太铁路线以北、太行山脉北部的五台县，邓小平以此为中心走遍晋东北，相继建立起各县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与此相适应的为抗战服务的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包括农民协会、工人联合会及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学习班。尽管可能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各种方法，但是抗日救国的口号对民族主义者肯定最具有感染力。有趣的是尽管邓小平在当时见过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但是史沫特莱的印象中似乎只记得当时八路军总部中的其他人，她只记得曾见过任弼时的助手，当时把这位助手的名字错听为“汀”。

然而，在1938年初，邓小平又一次被调动，和刘伯承到了一起——他们俩早在1931年在江西苏区就相识，这次调动，邓小平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在抗战初期，毛泽东似乎已经注意到了邓小平对一二九师的控制能力，在不久之前，毛泽东对此存有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长征途中张国焘拒绝毛泽东对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拒绝战略撤退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一度时间，他分裂了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向苏联靠拢，然而最后又在陕北根据地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人会师。一二九师的前身就是红四方面军。1937年8月，毛泽东改组了一二九师的领导班子，任命久经战场的武将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

邓小平在当时长期离开延安工作，并成为党内相当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对邓的信任程度。甚至在1942年和1943年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所发动的整风运动和使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也没有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他与邓小平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邓小平是一个部下而不是一个同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显示出他是能够被信赖的。

邓小平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政委之后只去过延安三次，最长的一次是1938年的8月到12月，其间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的扩大会议；1939年8月邓小平参加了政治局的扩大会议；1945年6月，尽管邓小平没有参加第七届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他参加了他被选入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并视察了冀鲁豫根据地。1939年8月第二次回延安时，邓小平认识了卓琳，次月和卓琳喜结良缘。

政委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而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后，为了创建红军，苏共认为许多士兵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控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委和政治部门的工作与苏共略有不同，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和宣传工作，而且还要在老百姓中也从事这种工作。确实在游击战的环境中这对中共的事业是极其重要的。在共产党政权还不太牢固，敌人随时都可能进攻的游击区，邓小平在这样的环境中曾经战斗过12年，现在八路军为了生存下来，需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帮助。实际上，军队和党是没有区别的，共产党员白天是农民，到了晚上便成了军人了。邓小平当时是游击区党的高级干部，负责军队中的政治事务，实际上，194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了太行分局，邓小平被任命为书记——太行分局的最高职务。从此他在太行的地位才被正式承认。

刘伯承像邓小平和一二九师的许多原四方面军的人一样，也是四川人。刘伯承生于1892年，是一位久经沙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军人，在1926年加入共产党之前，一只眼被打瞎了，1937年后半年，刘率领一二九师从太行山区北部出发通过平定县，穿越石太铁路来到太行山的南部地区，尽管当时一二九师有6千人，比八路军其它师的上兵多，但远远不够一个师的标准人数。太行山南部地区历来就是沟通华北与华中之间交通运输的战略要地。邓小平到任之前，刘伯承已经组织了几次突击队，成功地袭击了日军和日军飞机。然而那只不过是日军侵华的开始阶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占领了华北的大部城市，所以太行根据地很快就成为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活动的中心了，甚至在1937年11月朱德把整个八路军总部搬到了太行根据地。

在太行山区位于邯郸——长治公路以北的武乡县和辽县（今左权县，为纪念在此遇难的共产党将军左权而改此名）是太行根据地的中心区。随着日军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进入中国内地，主要是通过铁路运输的，因此这里的铁路运输线就成了日军保护的重点了。一二九师在敌后开展了斗争，建立了抗日的游击队，地方政府和与之相适应的系统的社会基础结构。1938年和1939年上半年，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很快，截止1939年底，一二九师活动的区域南面包括黄河沿岸人片区域中的四个根据地，东北面的石家庄——济南—徐州铁路线和西北面的石家庄——西安铁路线包括太行根据地；长抬以西的太岳根据地；冀南和冀鲁豫地区，这两个地区都位于京汉铁路的东面。

一二九师起初能够取得成功，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的闪电战进攻速

度之快，使其后勤保障无法跟得上。另外的原因是因为共产党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特殊关系。1936 年阎锡山加入了与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联盟共同抗日，允许抗日组织的活动，到 1937 年底山西大部分的军事和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在一二九师活动的这个区域内，也就是后来的大岳根据地，情况更是如此，该根据地不再需要一二九师主力的帮助了。在大岳根据地有山西省共产党的领导人薄一波、戎子和通过牺盟会控制了当地的阎锡山政府和山西新军的部队，直到日本人开始大扫荡，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才开始了帮助(11)。1938 年底，一二九师穿越了京汉铁路，部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 1938 年底和 1939 年初的一段时间，甚至一二九师的师部也搬出了太行山区，驻到了冀南平原。

1940 年的大部分时期，一二九师打的阵地战要比游击战多。这一年一二九师开始遇到的敌人是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党部队。尽管 1937 年后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双方的冲突是司空见惯的，因而 1940 年 3 月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是：共产党的部队应从太行根据地中与国民党接触的地带撤离到邯郸——长治路以北；共产党承认这一地区归国民党所有。邓小平似乎参加了这个协议的制定，该协议肯定完全符合邓小平争取国民党部队的计划(12)。

在与国民党地方部队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一二九师正与其它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准备参加抗日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是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的。这次战役是成功的，彭德怀的振奋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日军的铁路运输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八路军占领和接受了一些县和县城(13)。但是这次战役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日军马上把军事力量集中对准了共产党的边区。

太行根据地

一二九师和它的根据地和边区，在 1940 年由于日军的进攻开始了后撤，在太行山脉的东边，日军利用京汉铁路线作为基地开始修建据点，对共产党进行封锁。在西边，1939 年后半年，日军通过修建了一条从太谷（位于石家庄至西安的铁路线上）到长治的铁路线，成功地把太行和太岳两个根据地分割开。共产党在 1945 年取得胜利的功劳应归功于谁，现在仍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啊(14)。然而，在晋冀鲁豫共产党面对日军轮番的进攻最终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在日军强大压力下太行根据地的力量还得到了发展壮大，这些成就应归功于邓小平的政治组织才能。

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是由邓小平担任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央北方局的任务。从事这个任务包括了与北方局代表杨尚昆的紧密合作。邓小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对大行区进行了考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说邓小平曾多次遇到危险，刘伯承是怎样地为邓小平的安全而担忧，总是要求把邓在外的情况定期向他汇报。现在甚至考虑到为他作为终身的最高领导人写偶像化的传记，可见邓在根据地发展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15)。

然而根据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太行根据地是四个根据地当中最牢靠的一个，但在 1941——1943 年中也受到重创(16)。在冀南和冀鲁豫地区，地缘政治对共产党不利(17)。华北的日军一加强了它的军事力量，共产党就立刻转入地下，在许多情况下这是毫不夸张的，日军和共产党经常是共同占有同一个村子，共产党处于暗处，受一种地道系统的保护。在四十年代初由于干旱和蝗虫等自然灾害对边区的打击，无疑使情况更惨了(18)。

邓小平发展边区的策略对三种不同典型的人采取分别不同的办法，第一类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军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对这类人邓希望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在 1940 年通过当地的停战实现了这一目标(19)。第二类是传统的地主统治阶级及其追随着，对这类人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各种形式来争取他们。第三类是农民，邓希望通过经济上保持他们的稳定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赢得他们的支持(20)。同时，邓采取措施确保共产党游击队和八路军家属及烈属能得到特殊的照顾和优待。

邓小平把某一边区政府的经验引入晋冀鲁豫是很积极的，他学习了紧接太行山脉以北地区晋察冀边区的经验，在 1940 年初由于日军加强对根据地扫荡，根据地之间的合作不能进行，邓小平建议边区政府的召开一个参议会议，这个会议不由共产党主持包办，广泛吸收爱国民主人士，赢得爱国民主人士最大限度的支持，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21)。

此外，这个参议会会在邓小平看来仅仅是“临时的”会议，这不是因为它是战时的会议，也不是因为它在困难情况下要简化一些手续，而是因为要使其成为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真正的参议会。

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所提出的政策不是要创造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特别是抗战中期在日军经济和军事封锁并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些经济政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使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些政策与“文革”后的经济政策极其相似，截止 1942 年底，尽管太行行政区需要进口些火柴，但是它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满足本地人民的需要，并且还能出口一些自己制造的简单的商品。边区政府有自己的管理严密的信贷货币系统，由冀南银行发行了纸币，曾建立了自己税收体制。1943 年税收几乎下降了五分之一，如果考虑到当地老百姓当时面临着蝗灾饥荒和其它困难，这很可能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并非是国库财力的减少。

在税收制度中，与邓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相类似的一个有趣方面是：个体经营者按照他们前几年平均生产值纳税，剩余的部分全归他们自己。另一个与后来的改革相类似的是邓所推广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是通过签定一个合同把公有土地承包给个人，超出合同之外的任何剩余部分都归生产者所有(22)。总之，在后来的一些年中，邓小平巧妙地明确表达了对反对资本主义作法的全面否定。邓认为：共产党在本质上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因为不管在何种社会中，都应该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提高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 1943 年 9 月 21 日在一二九师生产会议上报告中讲的：“建立赏罚制度……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 100 到 200 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不高。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个工作做好”(23)。

邓还说：“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对富农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24)

邓小平 1943 年 7 月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文章，不仅是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略宗旨的典范强调了经济生产与取得政治及军事胜利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还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今后总的思想的发展，也是他的经济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社会的变革只能是渐进的，而且要在变革的过程中告诉人民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才会给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带来好处。社会主义需要民主和经济实力，社会主义只能靠“资本主义的生产”才能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这句话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 1989 年官方发表的权威的该报告的译文中被删去了。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对邓小平的讲话不会引起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引用毛泽东的话“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结束了他的报告。接着邓小平又说：“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

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25)

邓小平在太行区的工作经历肯定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及观念，毫无疑问，同时也在他的周围成长了一批贯彻他的这些思想并在今后更广的范围内实践他这些思想的干部。曾在太行区作邓小平的同事或部下的一些人构成了1949年后中共领导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在1949——1989年间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的87人中，有17人在1938——1945年间曾在二二九师、晋冀鲁豫边区或其辖区的机构中工作过。与之相比，有16人是来自1937——1945年的延安根据地的。

在1949年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些曾在抗战中在太行区机关工作过的人中，不仅有邓小平和刘伯承，而且还有薄一波、陈锡联、纪登奎、李德生、李雪峰、刘华清、秦基伟、宋任穷、苏振华、谢富治、许世友、徐向前、杨白冰、杨得志、赵紫阳和万里。这还不包括那些曾在太行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工作过的那些人，除了像朱德和彭德怀与这样一些名人，他们的大部时间很少参与当地的事情之外，还有杨尚昆与晋冀鲁豫的工作密切相联。

除了那些在抗战期间在太行区工作过的人在1949年之后进入政治局成了显赫的人物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太行区的人成为军队的领导人，他们是：李达（国防部副部长和解放军的副参谋长）、杨白冰（中央军委秘书长）和陈再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太行区的人在党中央和国家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包括：安子文（中组部长）；王任重和黄镇（他们分别担任过中宣部部长和文化部部长）；戎子和（财政部副部长）；段君毅和滕代远（分别担任过铁道部长）。还有杨秀峰（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1949年后任高教部部长）。此外还有一批人担任了省一级的高级官员，他们是黄欧东（辽宁）、李大章（四川）、刘建勋（广西和河南）、张国华（西藏）和赵建民（山东）。

邓在太行区共事的许多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薄一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担任过太岳根据地的领导人，后来又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在五十年代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对毛泽东经济发展的思想不太热情(26)。在六十年代初曾和邓合作将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减少到最低限度。另一个是赵紫阳，他和邓小平初次相识是在1938年，当时赵是冀鲁豫边区的一位党支部书记(27)。

据一些消息报导说：胡耀邦（邓可能是在1937年在延安认识他的，当时胡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邓的另一位得力助手。在1942——1945年间，胡在太岳根据地邓的领导下担任政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胡耀邦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工作，后来又到了军队，在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工作，后来又在邓领导下的四川工作，胡在抗战的整个期间是在延安度过的，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组织部部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经常密切地与包括邓小平

和刘伯承在内的各根据地的司令官打交道。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肯定是很密切的。1938 年胡耀邦介绍邓小平未来的妻子卓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期间和之后在西南区邓的手下供职；五十年代在邓的领导下任共青团书记(28)。

解放战争

在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在邯郸建立了边区首府。一二九师已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久被改编成中原野战军，后来又改编成第二野战军，在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刘邓大军是能够在山东和河南战役中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但是，如果国民党军队为了消灭共产党向北和向东进军的话，刘邓大军由于所处的战略位置，将肯定是咄咄被攻击的目标。蒋介石确实把军队调进陕北（试图消灭毛泽东和驻在那里的共产党部队），同时又调军队到河南和山东包围刘邓的军队，这后一个军事行动被称为“哑铃战略”（29）。刘邓早就准备向南进军了，在五、六月份通过侦察得到有利的情报之后，起初计划在8月底执行南进的计划（30），当得知毛泽东在陕北受到攻击，也许意识到需要采取某种解救行动而不是坐守待毙时，在1947年7月为出敌意外，争取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毅然决定主力提前南进（使国民党感到很吃惊），目标是到达大别山区，这里曾是革命老根据地，有游击队坚持斗争，解放军容易立足生根。只要解放军占据了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据大江，控制中原，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陕北的部队回援，这正好达到了刘邓解救陕北的战略目的。

尽管这次行动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差点儿没有成功。由于道路泥泞，充满了沼泽，因此行军极其困难，经过20天500公里的连续急行军，战胜了敌人的追堵截击，克服了重重困难，刘邓大军先敌进入了大别山区，对于全军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特别是由于这次行动只有进路没有退路，因此，这带有某种赌注色彩。在汝河渡口进行的一场防御战，由于刘邓的军队处于敌人的炮火射击之内，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这次战略行动最终获得成功，应归功于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们不仅亲自领导了这次行军，并且大部分情况下和士兵一起步行，而且不断地鼓励疲惫不堪的部队，发扬英雄主义精神，建大功，立大业（31）。

第二野战军对大别山区的占领，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影响。在此他们能够恢复和重建新的根据地，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原计划进攻其它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使得共产党后来能够利用其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南方发动一场对推翻国民党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战役，这个战役就是淮海战役，对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该战役是以徐州为中心进行的。邓小平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这次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

在华东地区的活动使邓与陈毅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实际上当邓和陈毅一起在1948年11月攻占郑州时，邓和刘伯承是第一次长期分开。1948年11月陈毅的第三野战军与邓的第二野战军开始了淮海战役，这场战役经常被军事历史学家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阵地战之一，该战役从1948年11月开始到1949年1月结束，共产党共歼灭了50万国民党军队。

随着共产党在东北战场的胜利和北京国民党部队的投降，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 1949 年接受了全国政权。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当时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领导下，于 1949 年 4 月横渡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和周围的一些省，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离开大陆退到台湾。无可置疑，邓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政委的角色使邓进入了指挥员的班子中，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从抗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四年过程中，邓所写的著作，便可知邓在军事策划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在任何需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就像 1947 年挺进大别山期间，邓参与了大量的军事行动 (32)。

肯定是 1947 年底，中原野战军的领导成员已在刘邓之间选定了邓小平作为他们的最高领导人。这并不是刘邓两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实际上他俩从 1938 年开始相处以来就很合得来，而且建立了永恒的友谊。然而，仅靠刘个人的支持，对邓的未来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邓在军界和政界的领导层中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重返大西南

1949年10月，邓小平和刘伯承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活动。庆典之后，他们率领第二野战军开始了向大西南的进军。大西南包括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还有西藏。这次与来自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的一部分联合进行的军事行动，将使共产党在大陆取得彻底的胜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在1949年底，挺进大西南取得了胜利，对邓小平个人而言，这意味着自1920年他离家以来第一次和家人团聚。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区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现在他的职位正式超过了刘伯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中，特别是到1952年底，为了有利于国家政权的重建，政治活动与行政管理都是在军队的控制下按地区划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像中国其它五个地区的军政委员会一样，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恢复经济，保持政治稳定和巩固共产党的地位，直到1952年，地区性的军政委员会负责控制该地区所有地方和军队的事务，这是一种军事的控制。

邓小平的组织才能与政治远见，在这些年中也得到了许多展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邓小平传中说道：“邓小平在这段期间帮助毛泽东发展形成了他的三线计划——为预防外部的威胁，把中国的经济设在内地的一系列建设项目(33)。从政治上对邓的信任来考虑，哈里森的这种说法是可能的，然而如果邓在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之前仍在西南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可成立的(34)。总之，邓肯定是积极地鼓励所有主要工程的建设——其中一项著名的项目就是成渝铁路的建设，并积极地支持经济的重建。

西南军政委员会面临着三项特殊的任务。由于西南是解放个征服的最后一个地区，被打败的其它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都退到这个地区，这些残余部队有的被迫投降了，有的变成了土匪。另外，西南还留下大约两百万旧人员，这些人包括从中国其它地区逃来的国民党士兵和前政府官员。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地把这些人分散开，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以此稳住他们，打消他们从事土匪活动的念头。们是，在那些土匪活动猖獗的地方要坚决用武力消灭之。

西南军政委员会面临着比其它地区更严峻的第二个任务是与当地共产党组织的软弱涣散作斗争。在1949年之前，共产党在大西南几乎没有任何经历和组织，党员也很少，发展新党员成为优先考虑的一件大事。但是发展党员的速度过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使党员的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必须立即开展一场整风，通过整风来增强党的纪律。这成为邓在五十年代主要考虑的问题(35)。

第三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少数民族问题，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比中国任何地区都多。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人的关系历来都是不好的，共

共产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很缺乏。此外，共产党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方面是封建的，是与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除了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员有一个优惠的政策之外，邓小平还在少数民族集中的那些地区免除了如土地改革这样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其它的一些社会改革如废除奴隶制完成之后才进行的。(36)

注释

刘邓统率的一二九师还包括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和三四三旅的一部分。（译者注：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三四三旅第五支队于1938年2月24日奉八路军总部之命归一二九师指挥）。这两个旅的大部分后来都编入第二野战军。这两个旅进入太行区与一二九师并肩战斗。在1940年之后，主要在晋冀豫边区的冀鲁豫地区和山东活动。后来在共产党的政治活动中，这两个旅最出名的将领是苏振华，杨得志和杨勇。

许多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记载了这些年与邓小平的联系。比如较出名的是由杨国宇和陈斐琴编的四卷书：《邓小平二十八年间》，北京中国卓越出版社、1989年；《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梁正：《邓小平同志在战动总会》。《山西党史通讯》1992年第2期第30页。

路敦荣：《邓小平同志在汾孝》。《山西党史通讯》1986年第2期第19页。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反击》伦敦，格兰兹出版公司，1938年第85页，他们在1937年10月25日相遇。

《悼伯承》。1986年10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北京。

根据本杰明·杨的《一个注重实效的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年生活，（1904—1949年）》第453页中所说：“邓比其它领导人更多的被召回延安，在夜晚毛的窑洞中往往呆很长时间……”前一句话似乎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晚上他俩长时间交谈的那么久，一定是在1938年的8月至12月期间。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北京。

薄一波和邓小平：《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

(11)薄一波《大岳根据地是怎样坚持抗战的》《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

(12)邓小平《太行区国民党问题》1942年8月23日，见《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编集补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集部编，1944年，第93页。

(13)彭德怀：《一位中国元帅的回忆》第439页。

(14)重温这些争论，见凯恩琳·哈特福德和史蒂文·M·戈德斯但著的《星星之火：中国农村的革命》的引言部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纽约，M·E·夏普出版公司，1989年第3页。

(15)例如：张香山《三项重大的明智决策》见由杨国宇和陈斐琴编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卷）》1942年，第114页。

(16)最新得到的有关资料还有：《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据地总编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7年；《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二卷：党的建设》，太行革命根据地总编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第四卷：政权建设》，太行革命根据地总编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40年；《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杨殿魁：“刘邓首长领导我们由严重困难走向新的胜利”《山西党史通讯》1989年第3期第37—39页。

(17)邓小平：《艰苦奋斗中的冀南》1939年3月25日，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的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303—322页。《时局和几个政策问题，在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时的发言》见《晋冀鲁豫史料选》1941—1942年第1卷第12页。

(18)《冀南政治和军事工作的总结报告》1943年1月，见《晋冀鲁豫根据地史料选》第451页。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84页。

(19)邓小平：《太行区国民党问题》1942年8月23日。

(20)《邓政委维护群众利益》见1986年《支部建设》第3期，第59页；曹钦温、姜廷玉：《邓小平同志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思想浅谈》见《巍巍太行》1987年第1期第4页。

(21)邓小平：《建立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1941年3月16日见《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3月21日。

(22)《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1943年1月26日，该文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1943年3月乃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15期第17页。

(23)《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第一、二部分》1943年2月20日，见《1943年太行党的文件选集》1944年，第107页。

(24)《邓小平同志2月20日在太行分局高级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2月20日，见《抗战以来文件选集》第二卷第二部分，1944年103页。

(25)《太行区的经济建设》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86页。

(2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 1991 年和 1993 年。

(27)赵伟：《赵紫阳传》香港，教育文化出版社，1989 年第 29 页。

(28)杨中美：《胡耀邦：一个中国人的传记》纽约，M·E·夏普出版公司，1988 年，尤见第 113 页。

(29)《邓政委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47 年 6 月 21 日（未经核对的报告）见《晋冀鲁豫根据地史料选》1945—1947 年第 132 页。

(30)《刘邓关于原来坚持大别山斗争中游击队的情况向军委的报告》1947 年 6 月 11 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史料选》第 62 页。

(31)杜义德，《渡河反攻前后》见杨国字和陈斐琴编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篇）》。

(32)钟进：《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总览》（1938—1965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41 年，第 224 页。

(33)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毛和邓》伦敦，哈普·科林斯出版公司，1992 年，见第 124 页以后。

(34)巴里·诺顿：《第三线：保护中国内地的工业》载于《中国季刊》第 115 期第 351 页。

(35)《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 年 6 月 6 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52 页，陈碧桥：《加强党的领导，迎接新的胜利》见杨国字和陈斐琴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卷）》1992 年第 265 页。

(36)《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 年 7 月 21 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62 页。

第四章 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52—1960）

随着中国共党政权的巩固，由各大区统治的局面趋于结束，邓小平和其他大区的高级领导人一起调回北京参与国家的政治领导。他被任命的第一个职务是政府的副总理（当时称政务院副总理）。这一职务使他和周恩来在工作中又一次密切合作。不久，由于他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先是任命他负责处理党的高层领导内因宗派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然后又让他负责处理共产党的日常工作。1954年初，他又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在1955年他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个比原来高得多的领导职位）。当1960年底停止“大跃进”时，中共中央和毛赋予他和刘少奇为将来主持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任。

这段时期内，邓的政治生涯往往从两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来描述。一种看法是认为他是亲毛派中的一名老资格的成员，毛泽东把他带人领导班子，主要是由于邓小平的很强的组织能力，在特殊情况下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另一种看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受到“红卫兵”极力拥护的观点（但不完全是由于那个原因而被怀疑），这种观点认为邓特别是在1956年“八大”期间和之后，就中国未来的设想方面与毛的冲突越来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当毛在1956年9月提出让邓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曾经表扬过邓“处理问题的公正、可靠和富有远见。”根据毛所说：他跟我一样，虽然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的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他是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厉。毛提名邓担任党内高级职务这一点表明自三十年代初以来——从江西到太行山区、到挺进大别山、再到淮海战役和渡江大战一两人良好的工作关系，由此表明毛能够依靠邓来作他亲密的助手。

毛是领袖，邓是部下，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制定政策方面邓和他的同事们和毛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的。邓一直是以准确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著称，特别在党的团结或党的纪律的准则遭到破坏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极力陈述自己的观点以图说服别人。当时邓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党内不仅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还欢迎有不同意见，这样做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中共的“八大”会议上，代表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选择展开了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讨论。大家都希望用民主协商的办法处理问题，而不是用斗争的办法。另外，邓小平和陈云也早已学会了在什么时候，该以什么方式向毛主席提意见，在什么情况下保持沉默或以缺席的方法进行回避。

领导层的冲突

作为国家政策变化的一部分，刘伯承和邓小平离开西南调回北京，这意味着地区性政府的结束。总的来说，地方主义不算是问题，设置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措施，任命六大行政区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以刘邓的情况为例）在与国民党内战结束时，他们在中共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如果他们正好是在他们的家乡任职，邓和刘的情况正好是这样，正是这种令人满意的巧合使他俩备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讲当地的语言。1952年，当中共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时，没有碰到明显的阻力。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陆军军校的校长（当时他60岁），邓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后来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被称为国务院），并临时兼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和财政部长。

然而，新政体首次发生的较大危机具有一定的地区性。邓到北京还不到一年，就发现自己处于危机的中心。这次危机的消除在邓的生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当时东北和华东地区的领导高岗和饶漱石——开始被解除领导职务（1954年早期），1955年被开除党籍。邓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仅突出了他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而且显示了他团结各个部门并对其进行领导的才能。

邓到北京的最初的任务是参加国家宪法起草的准备工作，这个宪法最终是在1954年颁布的。他的具体工作范围似乎是主持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在1954年6月，他还没有把第一次国家选举的最终报告呈递上去时，由于高岗和饶漱石事件的干扰和其它的一些事情，迫使他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从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

在邓的生涯中，这突如其来的转折——他以前没有专门从事过经济财政工作，以后也不会有——不仅是由于他和毛的关系影响，还有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及财政部那些高级官员对他的满意的影响下促成的。尽管1953年高和饶都是地方领导，他们也担任国家职务：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是中共组织部长。两人都支持中央实行集权制。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由高岗的野心引起的：高想代替领导集团中的刘少奇（中共副主席）和周恩来，特别是想代替作为毛的副手和将来接班人的刘少奇。

在离岗看来，毛对他是赏识和支持的。所以他有恃无恐地展开了攻击刘和周的活动。他鉴于和苏联的关系很好，就攻击刘和周是反苏的。他在中共与苏共关系史上搞了两面派。他攻击刘少奇职位高的理由，迎合了中共领导内最明显的错误路线。他伪理由就是：给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的是红军而不是刘少奇领导的城市地下党。他试图以此吸引先前的农村革命者和游击队参与他的阴谋集团中来。高自己曾是西安军校毕业生，邓1927年曾分配在该校任职，后来高岗在长征终点的陕北建立了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高的观点得到林彪等人的支持。但是高在邓小平和陈云面前却栽了大跟

头。据邓在 1980 年说，当时邓在高岗游说并与他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后，意识到有必要为刘少奇辩护，感到高的行为完全是搞地方主义，他终于——泰维斯提出当时拖延了可能有两月之久——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陈云已经单独地这样干了。这件事在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公开提了出来。

除了个人的动机之外，邓和陈所担心的是高岗这种无视党的规章的行为，将会对党的团结造成威胁。特别是邓小平在 1953 年后半年接连参加了会议，会上因高岗宗派活动引起的种种紧张气氛趋于公开化，邓认为他此刻必须为维护党的团结而强烈地呼吁。高和饶无疑是在搞阴谋，他们搞阴谋的基本特点，正如后来邓在 1955 年 3 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是离开党的章程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

高一饶集团的攻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 1953 年后半年是他们最猖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成功地使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使周恩来接受了人们对他在财政工作中失误的指责；使财政部长薄一波靠边站。在那年夏季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后来薄一波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从 1953 年初以来，薄一波的税收改革建议在领导内部引起了纷纷责难，因为这些建议不仅对以前的资本家和私有企业采取了温和的态度，而且还因为其影响迫使国营企业更直接地和私营企业竞争。在此次会议上，高的发言很犀利。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为薄一波进行了辩护，或者说至少是毛的救生素使薄一波免于在政治上完全垮台。但是，薄还是被迫辞去了财政部长。

财政部需要一位能得到毛信任的新部长，并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得到财政部满意的新部长。尽管邓自己没有明显地选择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他适合这些条件。

邓是合适的，他能得到毛的信任。五十年代后期，戎子和还回忆起 1953 年 12 月邓部长专门给他讲关于“毛主席金融管理的方法”。就戎子和与财政部其他高级领导人来说，任命邓是合适的，他们和薄一波一样都是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部门（戎子和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这些人虽然没有和邓在一起工作过，但在组织上有很密切的联系。另外，高层领导中正出现的冲突，邓至少没有遭到冲突的两方面的反对。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周恩来的保护，现在他能通过财政部长的地位从侧面对周进行保护，他以这种方式来对周作些轻微的回报；另一方面，准备支持被高、饶抱怨的人，他们把邓看作是领导人中一名军事代表，因为他从 1937 年到 1952 年一直在军队中任职。高、饶当时有一个看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反而比不上来自白区地下党的人受益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3年12月高、饶阴谋的破产，使党特别重视了党的团结，规定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若干具体办法，但这些并不能马上邓得成功。1954年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没有轻易地得到高和饶的完全坦白。后来，邓小平通过他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新职务，在调查高、饶问题的工作中对彻底弄清他们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才提交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最后报告。(11)

在高、饶事件中，林彪没有失宠。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了满足支持高岗的那些人所提的论调，林彪和邓小平都进入了政治局，因为他俩都被认作是1949年前军队利益的代表人物。另外，邓成了中共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然而，邓在中共的领导层内作为政界与军界之间的纽带作用并没有就此结束。当1955年9月为承认那些年军队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人民解放军首次为将军们授衔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作为这次授衔的最后仲裁者。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军衔作厂暂时性的分配。(12)

毛和邓的关系似乎又一次成为中共政治的主要关系。邓能够使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得到保证。1954年后半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北京，1958年又来一次。在1957年赫在莫斯科招待了毛率领的中共代表团，邓也是代表团成员，赫对此有一种有趣的回忆：他不喜欢毛的主要原因是毛从来不说他的党内同事的好话。赫说：“毛从来不承认他的同事与他平等。毛唯一似乎满意的一位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指着邓小平对我说：“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而且前途远大。”(13)

邓的屡次提升，使他置于中共组织画务的核心位置，组织工作就成为邓这十年的后几年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当时被任命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其他成员有刘澜涛、宋任穷、谭震林和杨尚昆。它的组成清楚地表明中共所强调的团结，因为这些都代表着党内各方面的成分：刘澜涛是陕北苏维埃时高岗的同事，尽管从1933年以来他们有过多次冲突，最显著的是1938—1941年期间在太行山区的杨尚昆经邓的周旋，使他和秘书处的大部分人保持了极好的政治关系。宋任穷曾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谭震林和邓小平一样，自从三十年代就和毛泽东开始了共事。刘澜涛是薄一波的追随者，在太行山区是邓的同事，是1953年受高岗攻击的主要受害者。

接下来两年的书记处工作，大部分是组织工作，这是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的一个职能完全不同的更具有政治色彩的秘书处。邓在“八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与邓在1954和1955年担任的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相比，该职位的权力更大）。邓受命担负起了修改党章的重任，这是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带来的许多主要变化之一。正如他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样：自从1945年上次大会以来，党的状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党已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了执政党；党员从一百多万增加到一千一

百万，以前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在解放区的农村里，现我们的党员分布到全国的每一个城镇；党的目标已经从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发展国民经济。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政治环境，邓建议进行一次全而彻底的总结，把所有经验都要适当反映到新的党章中。(14)

有趣的是，邓在当时的许多建议不仅预言了他在八十年代初将要开始实行的政治改革计划，而且也是他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山区已经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继续。一个例子就是党政职能清楚地分开，以便加强党的领导。游击战期间，中共必需参与所有的活动，这是它的优势。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央领导经常批评党过多地插手和管理政府工作的倾向，以致使政府部门只会等靠党的指示办事，加重了党的负担，造成了党的系统的混乱现象。1941年邓曾在中共北方局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概括地提出类似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曾在大行山区实行过，后来在中共北方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15)

邓不仅关心行政事务，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党的程序和准则。他曾强调：特别是在赢得大众支持和保持党的团结方面，要把1935年之后的党的传统作为行动指南。这就是党章中最显著后来又完全被人误解的变化之一的基本的来龙去脉。1945年的中共党章明确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在1956年的党章中将“毛泽东思想”删掉了，仅留下“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资料特别是各种“红卫兵”组织撰写和分发的资料，尖锐地批判了邓小平建议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从党章中删掉的行为，他们把这看作是反对毛和迎合苏联论调的主要依据。(16)那时邓刚从莫斯科(4月)回来，在那儿他参加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听了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谴责。(17)一些西方评论家如D·W·常和鲍纳维亚，曾由于相类似的原因而把邓与毛关系的破裂追溯到这个时期。(18)

以苏联为榜样跟着苏联路子走，不可能是党内变化的主要原因，因为1953年共青团的章程已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掉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措词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这个决定不是由中共领导层集体决定的说法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尽管他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批评了个人崇拜，但他强调与苏共不一样，中共总是认为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错误总是难免的，因此我们从来不愿采取苏共那样全盘否定的作法。而且，这时，实际上是在这前后的很多年中，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护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邓不无道理地担忧，当时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正在导致中国政治中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不仅对毛泽东本人的领导，而且对党组织的领导都会造成威胁。尽管他不同意毛有关中国未来的一些观点，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不威胁到党的团结，只要决策是由集体来做，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欢迎的。事实上，邓完全懂得毛在中共政治中独一无二的作用，但他仍然把党的集体领导看作是一大优势，因此，他希

望继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即使这个用语已正式从党章中撤了下来。

他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重要讲话中，以一定的篇幅阐述党在党内进行辩论的正确程序、集体领导的必要性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根据邓的观点，如果想找到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公开辩论是必要的。在辩论中，个人应畅所欲言，少数人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应当受到尊重，党内斗争不应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邓自己在1933年曾经历过的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待错误也不应听之任之过分迁就。但是，党的决定一经做出，每个党员有义务必须贯彻执行。批评和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最基本的保证。没有批评，每个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就不可能改进他们的工作作风，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没有集体领导，政治将会变成个人崇拜。党章必须公个地适用于每一个党员，不应该有“个人崇拜”。领导干部相互之间或在对待下属的问题上不应滥用职权。

除了高岗和饶漱石，邓没有点其他人的名，不过他的批评很尖锐。他说：“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行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和“至今还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19)

肯定在后来，这些讲话可能被解释为是针对毛的。在1955年进行的关于集体化的讨论导致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是这次讨论急剧地改变了中国政策的方向。后来这次讨论常常受到人们强烈的指责。(20)人们过去认为，毛主席背过中央的其他领导，通过向省一级的领导呼吁新掀起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由于当时中央做出了一些他所不喜欢的决策。尽管关于农业合作化高潮来由的解释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走极端，但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领先省一级的领导人，从而迫使中央的领导同意1956年初的发展速度和“全国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发展的速度。(21)然而，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最能表现毛特征的那些行为和邓曾在谈话中所预言过的那种情况还没有完全出现。同样，当时有一些人觉得没有按党的准则去做而感到内疚，他们也是邓批评的对象。

整风运动

关于党的整风问题，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并在后来的一年中支配了全党的政治生活。在这一点上，邓对于毛关于有必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和阐述，还有整风运动的形式等问题，很可能不仅仅是采取一种犹豫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1956年在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争论是对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挑战。中央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离开了莫斯科，是由于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将会有有一个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强烈反对。中共也担心当时匈牙利和波兰的自由化所产生的影响和对共产党制度的威胁。

邓在中共“八大”及后来的讲话中都曾说过如能具备三个条件：党内民主、党的领导和党与人民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那么东欧出现的问题就能避免，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也能得到保证。总的来说，邓对中共的成就和前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然而，对中共的错误也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抨击，严厉地批评他所说的那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党的领导意味着不仅告诉人们做什么，而且还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1949年之前曾经实行过的久经实践考验的群众路线的原则——然而自1949年以来他感到许多干部往往满足于目前的成就，而且，1945年以来党的队伍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教育的质量必然会下降。(22)

邓要通过在党内展开一场整风运动和建立中共的活动受人民大众监督的机制，来解决党的工作作风，党内民主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仍同过去一样，将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帮助同志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来向党外的监督主要通过工人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委员会）还有各民主党派来进行。(23)

毛对整风的观点与邓的截然不同，他的观点主要是在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形成的。毛认为政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经济。特别是1956年到1957年前千年期间，他似乎曾相信为了创造和共产党密切的工作关系，中国的发展要靠社会各界的分子和职业人员政治化来实现——他一生中很多时几乎都不能摆脱对这些人的怀疑。这就是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由来。不象邓一样，他认为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那次著名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即使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对待，但其他大多数矛盾需要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教育政策来解决；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扩大到整个社会，否则革命就会走向官僚化。邓1957

年4月在西安对党的干部作《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时期确谴责了“大民主”这个广义上的概念。后来，他指责说东欧的动乱也是由于“大民主”所导致的。(24)

1957年五六月间，几乎可以对共产党随意地进行任何批评，这就是“百花齐放运动”，但很快被迫停止了。因为这个仅对党的团结造成威胁，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党的统治也造成了威胁。(25)事实上，在那些批评共产党后来受到攻击的人中，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残酷的迫害。正如邓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指出的那样，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没有能很好地参与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尽管他认为当时的整风运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也觉得当时的方法是太过分了，并且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26)

大跃进

所谓“大跃进”就是一个动员广大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运动，在1957年冬季如果从它动员起来的人数来看，这次运动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后来的一年中，依靠动员的原则接二连三出台了许多政策，所采取的那些政策合起来形成一套现在称为“大跃进”的宏观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中国试图仅用十五年赶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业化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双百”的这个经验教训使得最终采用毛的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更为可能。陈云提出的发展战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该战略曾造就和激励了一批持“专家救国论”的精英人物。这也是自从1956年以来吸引了知识分子并在1957年5、6月知识分子受到了鼓励去“监督”中共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诚却受到了怀疑。

1957年秋天，中共领导层的团结似乎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样的团结持续了一年多，随后便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毛对他亲密的同事们私下宣布，他将在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政治二线而让刘少奇出任主席。这个变动他早在党的八大上就事先说过并开始着手实施，毛这样做有助于“大跃进”的产生。那一年中央领导层内非常团结，只有周恩来和陈云反对“大跃进”这个战略，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员们早在1957年9月到1959年间就被撇在一边了。

“大跃进”的战略要求以劳动力投资代替资本投资，政治代替技术和经济，热情代替专业技术和熟练劳动。“大跃进”反映出了毛依靠规模经济获取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口号中所概括的那样：“多、快、好、省”——却丝毫不考虑减少实际费用。在“大跃进”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炼钢铁，产出了大量无用的生铁；另外还有人民公社，这是一种把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庞大的农村集体，这种集体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相当惊人，汇报的产最数字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无疑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家统计局也被那些狂热的人所接管，他们认为即使统计工作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可信赖的数字报表。(27)人们为人民公社欢呼，不仅因为它是农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尝试，而且还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幼苗”——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一切成就使苏共感到很大的震惊。

然而，1958年冬，中共许多领导人开始到各省去视察，去亲眼看一看“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视察的见闻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很明显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彭先去了甘肃，然后去了他的家乡湖南，还去了江西、安徽和河北。他的视察也许是最著名的，因为正是彭的这些视察使他后来在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与毛发生了公开对抗。然而就是在这次视察中，彭发现农民们在挨饿。党的地方干部私下里在抱怨“大跃进”的过火行为。

到 1959 年 2 月和 3 月，邓与其他一些注重实际的领导人一样，主张步了不要太快，但他们并不是反对“大跃进”的战略，例如，在一次中共秘书处举行的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毛推崇备至的一件事）的讨论会上，邓认为虽然这样做有一些明显的好处，但不要走得太远大快了，否则的话对教育质量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28)在另一次讨论人民公社的会议上，邓又提出人民公社并不是行不通的，但它们在生产管理方面接二连三出现了许多问题。(29)

彭德怀没有邓那么沉得住气，多年来，他和毛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他开始进行广泛的游说活动来反对“大跃进”和毛(30)。几年之后，叶剑英（毛之后的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说邓、刘少奇、周恩来和他自己最初都同情彭德怀的处境。(31)但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没有对彭给予支持。与毛不同，彭不是一个特别老练的政治家。1959 年 7 月在庐山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中央夏季工作会议上，他对毛突然采取一种简单的对抗策略。(32)尽管在那之前他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并且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坦率而又尖锐的意见书。特别是他指责毛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左”的错误，这些话和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期毛的对手批判毛的那些话如出一辙，毛对此当然不能接受。(33)

毛用自己中央主席的职务控制了庐山会议的议程，对此作了巧妙的反击。他给彭扣上了企图篡党夺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还不给彭申辩的权利。他还告诫他的同事们要珍惜他们过去一起度过的岁月，希望他们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由于彭还是国防部长，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彭德怀走，我就打游击战去。(34)如果对“大跃进”的问题作一番心平气和的评论，那么结果可能就不同了。然而并不只是毛感到大吃一惊，似乎彭的支持者也感意外，即使他们在庐山会议前也不知道他将要给毛写信。结果毛逐渐使冲突升级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彭德怀和他的支持者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被革职，意味着暂时平息了对“大跃进”的反对。

彭和他的支持者在 8 月份正式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参加在这之前召开的历时一个月之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次会议陈云也没有参加）。邓小平这样做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原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自我批评的检查中写道，他当时由于腿有点毛病，所以没有去参加那次工作会议，并曾写过书面材料来解释这件事。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但邓确实在庐山会议前的某个时候玩台球时弄断了腿，然而确切什么时候弄断的还不清楚。(35)麦克法考尔认为他正好是在庐山会议开始时断的腿，这样才迫使他退出了会议。(36)由此可见，认为他的缺席没有政治动机似乎是合理的，但人们对他的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很多说法。邓这段时期照的像片所显示的情况与他的腿伤是一致的。他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不知道庐山会议将会面临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可以相信他是利用中央委员

会夏季休息的机会去治疗他的腿。在 1958 年 12 月直到 1961 年 4 月的照片中他通常是拄着一根手杖然而在那之前或之后他从来都不拄手杖。如果邓的腿确实受了伤的话，那么邓在 1960 年底时对莫斯科的访问除了讨论中苏关系外也是治疗腿的一个好机会。这时中共高层领导正轮流访问苏联，邓 1956 年、1957 年都去过，但直到后来才被委任于处理和苏共关系的重任。整个五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去苏联看病已经成了惯例。

没有邓当时对庐山工作会议上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记录，但起码他对彭的行为可能不满意。显然庐山会议后中共的准则对毛不再适用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许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大跃进”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地开展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 1960 年结束了，毛在政治上也退居到了二线，但很可能邓在五十年代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

注释

高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龚育之教授答问录》，载自 1993 年 12 月 24 日《经济日报》第 1 版第 7 版。

纪登奎后来将他自己和邓对毛忠诚的行为做了比较。据纪登奎说，邓小平说话总是直言不讳，而且对毛也总是如此。纪登奎：《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载自《中国的大悲剧人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 页。

中共八大会议上的讨论，见 1956 年《新华月刊》第 20、21 期。

F·C·泰维斯：《毛泽东统治下的政治生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高岗和党的地方主义》纽约，M·E·夏普出版公司，1990 年。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1953 年 2 月 11 日，载自 1953 年 3 月 3 日的《人民日报》。

《全国基层选举胜利完成》，载自 1954 年 6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

巴里·诺顿：《邓小平：经济学家》载于《中国季刊》1993 年 9 月第 35 期第 491 页。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79 页。

F·C·泰维斯：《毛泽东统治下的政治生活》第 109 页。

薄一波：《1953 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载自 1991 年《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实践的回顾》第 231 页。

(11)《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 年 3 月 21 日，载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12)无据可考。

(13)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共二卷），企鹅出版公司，1977年第1卷第301页。

(14)《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见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00页。

(15)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页。关于历史联系的评论在戎子和：《重读“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后的几点回忆》中可以找到。见杨国宇、陈斐琴、王传洪编的《邓小平二十八年间》1989年版第20页。

(16)参见蔡和森：《邓小平》香港，宇宙出版公司，1978年第44页。

(17)廖义录《邓小平和苏共二十大》载于杨国宇、陈斐琴编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1992年版第三卷第106页。

(18)鲍纳维亚：《邓小平》第76页；D·W·党：《中国领导层连续危机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伦敦，美洲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26页。

(19)《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9页。

(20)F·C·泰维斯和沃伦·萨恩：《毛、邓子恢和农业合作化政治》，载于《中国法律与政府》1993年第26卷第3、4章。

(21)雷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6页。

(22)《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0页。

(23)《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0页。

(24)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0页。

(25)雷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18页。

(26)参见《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9页；和《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自英文版《邓小平》第二卷，第279页。

(27)参见贾起三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时的讲话，载自1959年《新华半月刊》第13期第37页。

(28)北京大学《教学评论》编辑部编的《高等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年4月20日。

(29)《吴冷西的坦白书》载自1968年7月9日《青岛日报》。

(30)F·C·泰维斯：《彭德怀和毛泽东》载于澳大利亚《中国事务论坛》，1986年第16期。

(31)范硕和丁家奇：《叶剑英》载自胡华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期，第89页，引自《叶剑英传略》。

(3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3)见工会研究院：《彭德怀案件》香港，1968年第7页。

(34)雷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217页。

(35)采访李锐，1993年3月24日。

(36)在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229页和第407页的第209脚注中，也说邓的腿是在打乒乓球时断的。

第五章 重建与毛泽东（1960—1966）

从“大跃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段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可能是最模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国当局对各种消息都采取了严密的限制措施，特别是报刊杂志等新闻出版物严禁带高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由于被封锁而闭关自守，自从建国以来和西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低潮，1960年年中，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也撤走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年的历史背景又极易导致“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荒唐事件的发生，当时红卫兵和那些支持毛主席的人几乎给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而且，这段时间的许多原始资料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出版。这些出版物大都是那些“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组织编印的。这就是由早先的意见不一进而造成了毛和他的那些遭到攻击的同事们之间的斗争。红卫兵组织编印这些资料，主要是为增强他们自己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些资料并不可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资料来源。

邓当然和毛的意见不同，当毛更关心修正主义的问题时，他们的意见分歧逐步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邓在过去也经常和毛有不同意见，但邓从没有认为这样的分歧在他们的关系中会有所发展。事实上，毛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有冲突也有合作。这一点，庐山会议前，许多领导人包括彭德怀在内都对此深信不疑。如前所述，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就没有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种关系能持续这么久，而且在毛去世后其影响仍不减当年。毛是领袖，邓是忠诚的部下，他们都曾相信彼此能继续共事，象他们在外事方面所做出的成就那样。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是毛由于邓没有向他汇报，受到漠视和回避而批评邓。那么邓将通过改正自己的态度而作出反应。事实上，邓就是这样做的。1966年10月，邓在自我批评中承认了以前毛对他的指责，不仅对其原因承担了全部责任，而且表示他当时就已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一份讲清了事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声明。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毛与邓的关系极为融洽，中共中央政治局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公开把邓说成是他的副手。这种对中共领导层的傲慢态度不是毛的习惯作风。而且他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副手刘少奇。实际上在当时官方的排名中，邓名列第四。毛除了“放风”外，还以这种方式来考查当时的形势和人。

这种关系从1962年才开始改变，但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明显。

当“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时，毛和邓的意见分歧可能比以往更明显，但他们依然保留各自不同的意见，个人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如邓在“文

化大革命”中后来没有被官方媒介点名批判，只是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位于刘少奇这个第一号人物之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也准备把邓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区别开来，甚至在1966年底邓退出领导班子后，他仍坚持保留邓的党籍。

另一方面，这是邓不依赖毛泽东而自己在政治上独立发展的时期。中共领导班子内部关系的变化，使邓和那些与他一道发起1978年改革的人们来往得更密切。事实证明许多政策，特别是六十年代早期为克服“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的那些政策，都是后来改革的核心基础。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是批判“刘、邓”，但当时与邓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好象不是刘少奇而是彭真，邓和刘少奇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同周恩来也是这样，他总是尊周为兄长（用他自己1980年的话来说），而不是认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彭真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中宣部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主要受害者。整个六十年代早期，他们携手制定出许多领域的改革方针。

重建

1960 年对于中国确实是个令人震惊的年头。中央领导人不仅陷入“大跃进”失败的困境中,而且被中苏关系的破裂所困扰。农业产量下降到只有 1958 年 3/4 的水平,全国普遍遭受旱灾和饥荒。1959 年到 1961 年期间,中国人口数实际下降了一千三百五十多万人,邓在八十年代回顾这一段时期称为“最困难的时期”。

“大跃进”在经济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农业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严重缺乏,以农业为原材料的工业处于下降状态。据各地汇报的数字,轻工业的产值:1960 年比上年下降 10%,1961 年比上年下降 22%,1962 年比上年下降 8%;重工业遭受的冲击更大,1961 年比上年下降 41%,1962 年比上年下降 22%。即使当时的报纸,特别是地方报纸也带有它的痕迹:标题中提到中共领导人时都直呼他们的名字而不是称姓,为的是使大家在危难中感到一种凝聚力,此外,新闻纸的质量下降得太厉害;以致报纸往往不能看:薄薄的吸墨水都被墨水浸透了。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央领导面临的任務就是恢复经济。1960 年下半年召开的紧急会议终于给“大跃进”划了个句号。会议决定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尽快恢复生产。经济要重新调整,用渐进主义代替跑步主义。农业被看作是经济的关键。经过重新调整的人民公社,在组织上成为合理的、易管理的单位。只是有些地方的经济状况似乎特别严重,以致集体经济完全解体,重新恢复了单一的耕作。

尽管领导班子基本是因结的,但在下一步该干什么的问题上还是意见不一致。对过去的错误,究竟是错在哪一步、原因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也不一致。1961 年中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这些事,毛最初的态度认为是他的责任,“大跃进”尽管有错误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党应该把整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尽管其他人还不倾向于与毛对抗,但也坚决认为象“大跃进”这样的历史悲剧今后决不应重演,应尽快把经济恢复到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

邓起初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务实的舆论,制定一些符合实际的新的政策。他的这一设想得到毛的赞同,确实取得了成功。1961 年 3 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在这以前邓和彭真曾在北京以北的一些公社进行过调查,所以有了准备,特别是邓提出人民公社成立得太快,没有作认真的调查和充分的准备,毛接受了他们的调查和结论,不过他仍认为他们的调查仅是中共需要学习的经验的一部分。(11)

由于毛的批准,要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建立了几个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由中共一位主要领导人主管并负责起草有关政策文件。比如毛负责公社,薄一波负责工业,李先念负责财政,周扬和陆定一负责文化,彭真负责教育,整个过程由邓小平通过书记处来具体协

调，书记处还另外建立了三个协调委员会，分别负责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工作。这分别由陈云、彭真和邓本人主持。(12)

六十年代初的这些大事，在“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中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时出台的政策文件，似乎完全推翻了“大跃进”时的政策：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而不是政治；现代技术是一种新的推动力，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从外国引进；以资本为主的投资，逐步地取代了动员群众；公社要建得小一点，基层单位仍然恢复到生产队——相当于1955年下半年所建立的小合作社（大部分地区）；重新强调教育质量；重新重视农业技术。当时提出的这些想法成为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实行改革的理论基础。(13)此外，薄一波、李先念、周扬、陆定一、彭真、陈云和邓在后来改革中如他们在经济恢复初期一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邓和彭真似乎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相结合的“智囊机构”来帮助他们调查和研究，后来在八十年代，这样的机构正式建立起来，而且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因这个机构常在北京西郊的一幢楼内开会，所以那幢楼得名为“畅观楼”，它通过纵观“大跃进”时期的所有主要文献和一系列更详细的调查，为两位中共领导准备好了关于一系列问题的报告，他们的结论是支持以计划而不是以动员为基础的政策。(14)

在整个五十年代，也可以说在更早的一些时候，发动群众和“群众路线”对邓来说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也许他关注的是“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能认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就是“群众路线”。特别在1961—1962年期间，他多次对“群众路线”的实质进行了解释，提出动员群众的方法不止一种。在经济工作中，群众运动可能是既不妥当又有碍生产。正如他在中共八大会议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执行好群众路线还需要讲究方式方法。事实上。如果要使党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才不会导致对运动的厌倦。

邓在1962年1月至2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次召开的有7000人参加的会议，得出了对“大跃进”的评价，决定了将来的行动计划。邓再一次强调了党的纪律、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中央工作会议没能解决造成“大跃进”问题的原因及将来发展的战略。倒是对自我批评的必要性说了不少——比如毛明显地坚持说他在去年年底作了一次正式的自我批评，邓也提交了一份中央书记处的自我批评。尽管这些领导人的观点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极端，但他们坚持的观点确实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是一次经济性的大灾难，决不应该再发生，将来的政策应以经济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因素（天气、苏联援助的撤走）和没有使群众充分地政治化都是很重要的，将来的成功要取决于党内整风运动和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这些就是接下来的“四清”中的首要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社会主义教育与阶级斗争

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在未来的政策上形成一致意见，不久之后发现经济危机比原来最悲观的预料还要糟，这就使事态更加恶化。政府面临比原来想象的更大的预算赤字和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此，邓提出生产是首要的，并强调“只要我们能很快恢复生产，不管怎样做都没有关系”。(15)他在1962年7月对共青团的一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6)邓对团员的讲话不是偶然的，当时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他从40年代以来就是邓的部下，后来在80年代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7)

邓的讲话和动员群众的政治理论直接发生了对抗，而后者正是他从1943年2月在太行山区对党的干部的讲话一直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上的讲话中一直所持的观点。(18)他把动员群众的理论批评为极易导致过分热情和过左的行为。他引用来自工业和农业的例子，但省去了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最犀利的批评。他认为这两者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都来得太快，结果生产不能持续进行。他讨论了各种解决办法，包括对所有集体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但邓在当时似乎没有提倡像在安徽省试验那样把整个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作法，那次试验就是70年代后期所引入的，当时他赞同的是小型的合作社。尽管当时把所有这些建议和主张用作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这些主张都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毛对中共领导班子面临的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与邓不同，他提高调子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在中共1962年召开的夏季工作会议上宣布的，并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接受——他发起了针对农村干部和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强调过去的革命性来把今后的发展重新调整到毛所指引的方向上去。毛以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会动员广大农民起来监督他们的党的地方干部，就像他所想象的1957年“双百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会纠正城市地区共产党的错误一样。他号召对过去不公正的做法和阶级斗争进行研究然后成立贫下中农联合会。然而这一运动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阻力不仅来自党内干部而且还来自农民。

1963年夏天，邓和彭真忙于从事另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批判。(19)中国西南部在50年代早期是邓的管辖区，当时他仍旧和那里保持频繁的联系，这次他们到那里是为了调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还要对新的发展进行试验，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在西南部的农民联合会组织得不好，他们建议运动要由城市派到农村来贯彻运动的工作队来领导，运动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党、政机关干部而不是农村中的最基层干部。结果运动的焦点从乡村移到了党、政机关所在的城镇，有效地把整风转变成了党内问题，而农民联合会则更没事可干了。“文化大革命”

中这当然又被说成是故意违背毛的本意而搞的一次行动。

1963 年到 1964 年期间，运动呈多方向发展。比如刘少奇把经济腐化而不是把政治上的修正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人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并没有反对毛的意思。同时，象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成和内容时一样，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党内开始出现了更激进的意见。

1965 年早些时候，毛泽东试图重新得到主动权来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现在的目标是修正主义的各种表现，这时，毛第一次提出了中共已经有出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可能性。但这段时期在他的心目中还没有认为某个特定馅人有这个嫌疑，事实上，这个高层领导班子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意图，那么。似乎他指的更可能是那些偶然而不是故意地成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地方干部，在两年的时间里，修正主义代表着不祥的含义。到 80 年代，邓小平仍然承认毛当时确实是担心修正主义。(20)

1962 年后，毛的关心不只限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0 年代期间，当地方党内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时，越来越多地强调在各种领域中政治化的必要性，其中包括文化和教育领域，文化和教育领域对毛泽东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他对在文化教育领域中这种政治化变革的重要性，几乎达到了着迷的程度，由此他才用“文化”这个字眼来命名“文化大革命”。以毛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文化和教育运动都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谁控制了这些领域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

党内最高层领导人中毛寻找那些愿意帮助他使中国重新政治化的人，其中之一就有国防部长林彪。他首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发起了一项政治教育运动。然后毛于 1963 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项“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政治入门读本毛的著作——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邓的观点和邓以前的态度是一致的，他的反对是双重的，首先，正如他经常极力强调的那样，应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毛的个人财产；第二，他反对的是那些教条主义者，并非毛的一切话都是适应于一切的指南，更不等于毛泽东思想。正像他在 1980 年指出的那样，即使是毛本人也曾违反过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21)

毛寻求帮助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江青。她曾是一个演员，毛委任她整顿文化艺术界，从 1963 年开始直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功地使中国文艺变了个样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使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革命化”和“现代化”了。正如毛所下的定义，文化是反映阶级斗争、为动员群众而服务的：英雄的工、农、兵要同万恶的地主、资本家和旧社会作斗争。特别是由她主要负责发起的八个革命芭蕾舞剧和革命京剧逐步主宰了 1966 年——1976 年中国的表演艺术。随着她对中国文化的整顿，她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凭着自己的权力成为中共领导班子中的一员。(22)

但邓对她明显地不服气，并公开地这样说过，如果事先他们之间还没有产生对立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并变成死敌。“文化大革命”前夕，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被迫去看这些新的现代革命京剧和芭蕾舞剧的演出。甚至在当时就有传说邓曾设法逃避，但最终没能逃得脱。他倒是去了，但在演出期间却睡着了，借此表明他的观点。(23)

中苏分裂

毛和邓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仍然能够继续密切合作的一个领域是在中苏关系的处理上——事实上他们似乎在这个领域一直合作得非常好或至少可以说彼此十分满意。毛泽东似乎特别赞赏邓和苏共的谈判。(24)而邓也极力强调毛泽东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而且非常成功，特别是在80年代早期当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作用被重新评价的时候。(25)

发起“大跃进”的决定所针对的，以及在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基本背景就是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在50年代中期和之后，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寻求无疑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固有的民族主义，但这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尽管细节很不清楚，但邓小平似乎在中苏关系破裂的政治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事实上，早在从50年代初开始，在对苏联关系的处理上邓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作用似乎由于他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而又一次得到发挥，这可能与他曾在莫斯科受过政治组织的训练有关。但在那几年中许多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均坚持说毛只是赞赏他处理与苏联关系的那种方式。(26)当然他的坚定不移和对苏联有点敌对态度似乎是邓在进入80年代后期的政治特征，不过这可能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态度。(27)在1956年到1963年期间，他曾经多次出访莫斯科，甚至有时当他不是中国代表团的正式团长时也要就谈判的结果向中央作汇报，就像在1958年那样。(28)60年代当苏共和中共的论战公开化时，邓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写作组的正式首脑——反修正主义写作组——正是这个组起草了中共就当时问题的辩论稿。(29)

中苏联盟总是有点不自然，往往是中美关系而促成的，而不是中共发自内心的愿望。从2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一直很艰涩：40年代初的整风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民族化。两党夺取政权的道路的截然不同，从而导致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在此冲突的影响下，广阔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相互期望、发展与合作很快转变为积怨。开始双方的期望可能都不尽合理，中国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程度令人咋舌。50年代的大部岁月几乎完全依靠苏联的帮助。由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60年代初这些援助突然撤走，从而使“大跃进”以后灾难性的经济状况愈发糟糕。苏联所付出的代价一度是很高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时期以及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时，苏联几乎承受不起这些负担，而中国则还希望苏联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将其核技术传给中国，如果发生地区冲突时还要提供军事援助。

中国共产党不愿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满足苏共的军事基地和合作的要求，即使这么做可能会危及中共自身的安全也在所不惜。如1958年中方曾要求苏联援助发展一支海军，当苏联建议共有这支海军的条件时，毛湘邓的反应特别强烈。(30)

1954年9月，赫鲁晓夫来北京进行50年代中期中共与苏共领导人之间的许多谈判中的第一轮谈判。中方由周恩来负责，邓是五个谈判成员之一。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包括苏联的最后撤军、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给予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事实证明，这是达成有效而持久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

1956年2月，朱德率领的包括邓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作为苏共的里程碑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尽管毛后来对这件事的反应也是持相同的意见——抨击个人崇拜，但当时这件事对中共代表团来说还不是那么令人吃惊的，最糟糕的则是赫鲁晓夫接受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和平共处而影响了中国希望能够从苏联得到的援助数量。很明显，在代表团中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苏联将会提供给中国较多的援助，包括所要求的核技术。(31)当1957年邓陪同毛泽东参加苏联革命胜利第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时，这样的协议似乎已经达成，尽管这个诺言从未实现过。

然而，1958年中苏联盟开始遇到麻烦，后来再也没有恢复关系。中共在核能问题上的坚持与赫鲁晓夫的试图缓和，并推行他的全球政治战略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大跃进”的发起意味着对苏联自称在共产主义大道上遥遥领先的一次重大思想挑战。赫鲁晓夫和毛的个人关系日趋恶化，中国也加入到了反对莫斯科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中。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中共代表在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各种会议上攻击苏共，两党开始出版各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评论文章，1960年6月各国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真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此后，苏联援助完全从中国撤走了。以刘少奇为领导包括邓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调解世界共产主义内部不和的两次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和邓进行了一系列交流，这是胡志明亲自把他们俩撮合到一起的。如果不是胡志明从中进行调解的话，将不会以上致同意的公报作为结束。这样一来，妥协简直就是对于团结和再见面的一种含糊的许诺。

一直在避免的公开不和终于在1963年发生了。从1960年起，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北越共产党，一直想努力把中共和苏共带到谈判桌前。1963年7月，邓带领一个包括彭真在内的小型代表团去了莫斯科。这次中苏关系来得到任何改善，小型代表团被当作战胜修正主义而欢呼，于是中共领导人涌向机场来迎接邓从莫斯科归国。(32)从那以后，这个争端通过中苏之间一系列对抗性的公开信而公开化了，如前所述，邓是中国方面起草这些公开信的那组人中的负责人。

文化大革命

不清楚毛是什么时候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对中共领导班子进行这样大规模攻击的。1980—1981年期间中共正式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时，邓有一次说毛实际上从来没有打算对老干部进行这样残酷的打击。(33)有一种很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认为毛一旦起用了一些关键人物，并赋予他们权力，于是就产生了新旧矛盾的冲突，从而推动了矛盾斗争的发展。在邓看来毛所起用的那些关键人物包括林彪、“四人帮”、康生及那些和他们有关的人物，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并包括在1966年底之后他自己的命运。

人们根据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职前后的一贯表现，认为邓现在把他看成是始终忠于毛的支持者，也似乎是合乎清理的，总的来说无论邓可能对个人崇拜有什么保留意见，就他的政治观点来看，这些保留意见似乎都不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整个60年代，他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比如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34)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但在那些就像1964年6月19日对共青团的讲话——“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促进中国青年革命化”——他都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35)

在1966年间，当邓接受批判时，他做了自我批评，邓坚信和毛的关系，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其它活动。罗瑞卿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底毛坚持说应该解除他的职务，尽管邓不相信对罗的指控，但还是接受了毛的决定，并参加了那次对罗进行处分的会议。同样他不仅在1966年5月参加了毛主席的解除彭真职务的会议，而且和刘少奇一起继续领导新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即使在他本人作了自我批评之后的8月和10月，也继续参加了红卫兵接见。

显而易见，评估“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阴谋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很难的。至少尽管搞阴谋的细节是很难找到的，但是由毛泽东培养起来的中共政治生活中的新生力量，似乎很快开始利用集权政治体制的各个不同部门，部署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设法贯彻他们自己的各项政策，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在来自决策机构外红卫兵的各种压力之下，政治生活变得杂乱无章。然而1965年的某一个时候，毛本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央的部分领导，特别是罗瑞卿在1965年底被免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还有刘少奇也需要被免去职务，这也似乎是可能的。(36)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中很早的公开受害者，他在60年代明显地被毛考虑为可能的接班人，在1965年分配给彭真的任务是把整风和政治化运动扩展到教育界，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当这个小组在1966年2月汇报工作的时候遭到了反对，导致了彭真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局扩大会议上被免职。和他一起被免职的还有几位领导人，包括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

尽管毛当时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的部署进行的。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由刘少奇和邓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小组。邓再一次尽力减少损失，主要通过保证彭真的北京市市长职务的接替：任命的是李雪峰。李是邓以前的一个部下，然而，形势基本上还是无法控制的，主要是因为新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也包括像康生、江青和张春桥之类的人，他们此时正极力提倡实行动员群众的政治路线。

到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邓发现自己和刘少奇一起在党的会议上反复受到批判，而当他参加群众会议时，也时常不正式地受到红卫兵组织的批判。当被批斗时，他的反应像往常一样，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明自己的意图是好的。(37)在一次“文化大革命”小组会议上，据报导说他被陈伯达列为“错误路线的先锋”，尽管人们说毛曾经又给过邓和刘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38)然而到了10月，邓的处境更恶劣。他被迫交出一份正式的自我批评——详细叙述他一度是怎样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39)

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邓也明显地认为他的工作不过是暂时停止而已，他继续参加批斗会和红卫兵接见会，在12月初他还参加了林彪召集的讨论工业和交通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0)关于在1967年中及1967年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资料很少。1967年2月，其他未遭批判尤其是那些老的领导人，都明显地呼吁停止党内领导集团的内部斗争。然而，此举不仅未能奏效，反而导致批判“二月逆流”以及更多的高级领导人被免职。从邓对“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来看，他不仅把毛泽东的行为与林彪、江青、康生及其支持者们的行为区别开来，而且还特别指出：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件，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正义斗争。(41)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和所有被清除的共产党领导人一起被污蔑为“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管他没有被官方直接点名，而仅仅是间接地批判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墙上的大字报和红卫兵的出版物都详细地分析了她的罪状。根据这样的一些记录，可以知道，他当时不断地通过他在1933年所做的事来表明他是无辜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邓的批判虽未经官方正式传达过，但却详细论述了邓对修正主义政策的拥护和他的个人行为。毛的主要不满之一是邓在“大跃进”后以各种方式来使毛退下来。这时，他也许忘了退居二线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刘和邓的建议。另外，据毛所说：在开会时，邓常常尽可能坐到远一些的地方，这样可以不必听主席在说什么——尽管邓的右耳极度失聪。

洪云利：《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0—1969年）》纽约，M·E·夏普出版公司，1990年。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报导的对邓这样的批评在下列资料中可以找到：北京红卫兵1967年1月19日《战役》第3期，译自《批判邓小平的观点和实践的文献》，出自《中国共产主义分类文献选集》，国际关系学院、国立城池大学，中华民国1台北，1978年第249页。

《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自我批评》载于《中国法律与政府》第3卷第4章第287页。

中国的史料都对此进行了确认，包括1993年6月2日与李锐的谈话。

F·c·泰维斯：《毛与他的助手们》载于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8年第19/20期。

短语“Number One”和“Number Two”是典型的中国式英语，此处由于已成习惯用法，所以保留了其原状。更准确的英语应是‘first’ and ‘second’。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页；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毛和邓》第324页。

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50年1月16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3页；《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7年8月18日，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党风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页。

问题的性质可参见刘绶年和吴群赣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概况（1949—1984年）》载于《北京周报》1986年第260页。

(11)参见首都商校红卫兵的革命联络站《东方红》1967年2月18日、第20页。

(12)肯尼恩·G·里波撒尔：《大跃进与延安领导层内部的分裂》载于雷德里克·麦克法考尔和约翰·金·费尔班克编的《中国历史》第14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部分：红色中国的诞生（1949—196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22页。

(13)历史联系见D·J·塞林格：《重新组合后的经济改革：右倾思想从哪里来？》载于《亚洲评论》第21卷第9期第947页。

(14)参加《畅观楼事件》载于《东方红》1967年4月20日。

(15)1962年2月21日关于农村“个人责任制”的讲话，是由清华大学1967年3月8日出版的《井冈山》报导的。

(16)《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93页。在汉语的原文中，猫实际上是黄的和黑的，但邓的“黑猫和白猫”已经形成当代传奇，似乎仍用这个习惯用语更合适一些。邓的1962

年的两篇讲话中的这个用语的起源，参见钱听涛《邓小平关于“黄猫黑猫”比喻的出处及针对性》出自《中共党史通讯》第12期，1990年、第6页。

(17)杨中美：《胡耀邦》第115页。

(18)《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943年2月20日，见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69页。

(19)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20)《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问》出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328页。

(21)《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出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3页和第285页。

(22)罗克逊·威特克：《江青同志》伦敦·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77年。

(23)邓对江青的反感，从他在毛后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可以看出，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在下列书中均有记录：迪克·威尔逊：《毛——人民的皇帝》伦敦，哈特切恩森，1979年第379页。

(24)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第154页。

(25)《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页。

(26)比如对李先念和胡华的报导，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第345页。

(27)参见1962年2月6日邓在中共七千人会议上的讲话未经认可的译文出自迈克尔·斯科恩赫斯：《编辑记录：比较邓小平在七千人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两种译本》第5页；《问题与研究》1978年7月第103页。

(28)《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1958年5月23日，载于《新华半月刊》第23期，1958年，第11页。

(29)M·斯科恩赫斯：《文化大革命的官方和非官方史》载于《亚洲研究专刊》第48卷，第3章，第564页。

(30)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第154—159页。

(31)廖义录《邓小平和苏共二十大》第106页。

(32)《北京周报》1963年7月27日。

(33)《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6页。

(34)迈克尔·斯科恩赫斯：《编辑记录：比较邓小平在七千人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两种译本》第6页。

(35)1964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当时出版的东西很少，资料几乎无法搞到。这可能反映了对出版的政治控制，或者仅反映了邓参与其他活动，降低他在政策问题上的公开形象。

(36)泰维斯：《毛与他的助手们》第 33 页。

(37)参见《在北京的红卫兵会议上的自我检查》1966 年 8 月 2 日，载于《邓小平言论集》第 72 页。

(38)郝梦北和段浩然（音）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六千年》（二卷）北京、解放出版社，1984 年，第二卷第 587 页。

(39)关于邓在 1966 年 10 月 23 日的自我批评，有许多类似的译文，比较容易找到的译本见《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自我批评》载于《中国法律与政府》第 3 卷第 4 期第 278 页。

(40)翟泰丰、鲁平、张维庆《邓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事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212 页。

(41)《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88 页：《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26 页。

第六章 现代化与斗争（1969—1978）

1966年12月底到1969年10月期间，邓小平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人们几乎一无所知。似乎他被批斗了将近一年。他和卓琳、刘少奇和王光美（刘的妻子）都是1967年7月“斗争会”的主要批判对象。然而，邓在1969年的十年却是极其多事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两次被打倒，然后两次又都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及党的最高领导层。与五十年代能够依靠党内领导的一种团结精神不同，七十年代是极左思潮极度泛滥的时期，中共领导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而分裂得越来越厉害：对毛动员群众方法的功与过的评价；毛的接班人问题等。在这种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邓不仅得益于过去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而且还得到了过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同事和部下的帮助。

江西的岁月

在 1967 年和 1968 年期间，“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共产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甚至人民解放军从 1967 年开始直接干涉内政也没能立即制止政治混乱。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的团结不比共产党好多少，尽管在林彪的指挥下（支持毛），目的是“恢复秩序”，但最终往往还是卷入地方的派性活动。

到 1969 年初的时候，也就是中共四月份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前夕，终于恢复了秩序，但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到了 1969 年，内政被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们牢牢地控制着。当然，共产党和解放军之间的关系由于 1949 年前共产主义路线占上风而一直很密切。这样，在 1949 年到“文化大革命”之间以及“文化大革命”后一直到大约 1985 年期间，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是建立共和国的那一些革命家——除了他们的中国共产党的经历之外，还都有一定的军队背景。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服役的解放军军官们逐步控制共产党的程度却有所升级。1969 年选出的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差不多有半数（大约 46%）同时在解放军中任职。如果说与有关发动政变的上台的军政府不完全相同，那么这这也是一个被军事人员过多参与的政府。

行政秩序的恢复以及中苏关系由于中国北部边境而恶化，终于使中央在 1969 年后期决定把所有被清除的关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分散到全国各地，据说这一决定是由林彪具体下的命令。尽管红卫兵出版社印发了这个决定，但毛泽东还是把邓的案子和刘少奇及其他“文化大革命”前的革命领导人的案子区别开来，传说是毛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当然，周恩来在 1969 年 10 月邓被送出北京时好像也曾特地为他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邓被送往江西省的新建县，他在那儿度过了三年零三个月，他被软禁于以前的一所步兵学校，每天在附近的一家拖拉机修理厂工作一段时间。他的妻子卓琳和继母夏伯根也跟着他去了。在这三个人中，当时已 65 岁的邓无疑还算是最强壮的。在邓的生活中这部分神话般的插曲在 80 年代回想起来简直就是邓打扫、劈柴和打糕的一幅画面。

邓和他的家人的生活当时无疑是极其艰难的，特别是 1971 年底以前。然而他们在新建度过的这般时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邓的“看管者”在北京制定的标准范围内为邓安排了比较舒适的生活来适应地方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周恩来施加的影响，或者是地方人民对邓的山衷的尊敬，当然和邓在新建县工作的那个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邓的部下这个事实也不无关系。

当邓和他的直系亲属到达新建时，那儿已经受到严密的监视并且有命令要限制他们活动。可是很快却在邓和他的妻子居住的地方到工作的工厂之间

铺了一条二公里长的特殊小路，这样他们就不必走公共马路了；这条路被当地人异想天开地称为“邓小平路”，暗指当时的越南战争和“胡志明路”。邓被允许养小鸡，他和卓琳开垦了一块蔬菜园。邓甚至跟当地的一位妇女学着酿葡萄酒和白酒。

后来，甚至允许邓的孩子们和其他家人也搬过来往。对于邓的大儿子邓朴方来说，这相当重要。他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他的父亲是“走资派”而被开除党籍，而且被红卫兵从楼上扔了下来，据其他说法是被推下了一段楼梯。结果他瘫痪了，只能坐在轮椅上。在一个福利中心住了一段时间后，1972年被允许和他的妹妹邓榕一起上北京接受专门的治疗，然而，补救已经为时太晚了。当邓于1973年准备回北京的时候，他全家十口人在江西得以团聚。

1971年9月，林彪企图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在蒙古上空死于飞机失事。消息于11月5日传到新建，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邓和卓琳自1966年底以来第一次被邀请听政治报告，似乎刹那间邓的看守的态度一下子变得比以前好多了，主要是因为从地方到省委的领导们开始来看望邓小平了。

1972年初，毛泽东参加了刚刚去世的陈毅的追悼会。陈是解放战争中邓的亲密战友，也是前任军队领导和外交部长。他们在淮海战役还有其他战役中都曾并肩作战，毛先对陈夫人称赞了陈毅一番，然后就谈到邓的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是能够和平解决的。周恩来当时也在场，于是他促使人们把这个消息传出来，据说当时曾把这件事作为使邓尽快恢复职务的一部分疏通活动而广泛宣传。

1972年8月，邓通过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请求恢复工作，1973年3月初，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把邓从江西召回来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后邓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露面是在一次官方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宴会上，一开始他几乎没有引起西方新闻界的注意，这与他在“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在非正式公开场合露面时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3月底他返回北京后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空余时间，便决定去观看地方队与来访的外国队之间的足球比赛。当他被群众认出来时，大家热烈欢呼起来，持续了好长时间，直至他起身向人们表示感谢，鼓掌欢迎才停了下来。

“四个现代化”

人们对 1973 年邓的官复原职及平反有好几种解释。“文化大革命”前这一代的中共领导班子中有很多领导人在 1967—1968 年期间被清除，要在短时间内充足数量的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干部来取代他们是很困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促进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邓被平反的同时，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和受批判的领导人也得到了平反，并被积极起用，其中包括另外两个和邓一样也被认可是从 1949 年以前就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人：陈云和谭震林。林彪的死和继而把他的死党清除出共产党和解放军，这些也许使毛觉得新领导班子于不平衡，他希望江青比较激进的努力和周恩来比较稳健的影响能够折衷一下。

周恩来当时也许觉得，邓将会是领导班子内反对教条和激进主义的一个同盟者，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有这些解释可能都有几分根据。另外，领导班子内部普遍对邓都有好感，这种看法似乎也有道理。尽管邓和他的伙伴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清除，但对 1966—1968 年领导人变化的一种历史嘲弄，却是大批的邓以前的战友和部下——来自太行山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被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特别是那些有军事编制的岗位，如同七十年代初许多甚至地方上的岗位都是军事编制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第四野战军的林彪攻击彭德怀和贺龙有关的野战军集团而造成的变革（贺龙也是林彪的死敌之一）。就因为第二野战军军官大大多于第四野战军，所以前者经常得以委任去填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空白。到 1971 年林彪集团被清除出领导层之后，这个不协调的比例仍在进一步扩大。

当然，这种忠诚的纽带并不是一种对政治和派别活动专用的或特别准确的预测器。邓小平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早期太行山区的部下，包括李雪峰、谢富治和纪登奎，还有许多后来支持他的改革规划的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都以程度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分子而闻名。然而，到 1973 年初时政治局只剩下 16 名活跃的委员，其中就有 6 名是邓在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区的战友或部下：——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苏振华、纪登奎和李德生。第七位陈永贵，是来自大寨的农民领导人，当时也在政治局，但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和邓有什么特别的个人或组织上的交往。

邓被任命为副总理、这使他和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激进分子发生了直接冲突。江青和她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由于和毛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崛起而得到合法的领导职位。于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他们 1976 年 10 月被捕，这期间他们一直在猛烈地发起各种运动来保护他们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如用革命委员会代替人民政府；鼓励“开门办学？（在工作中学习）而不鼓励技术

训练；积极肯定工、农、兵的社会、教育和经济作用，邓在中共历史上一直是支持群众的，强调不要脱离群众，但是他反对在动员群众中的过火行动。

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也就是邓小平复职后不久，“四人帮”无疑对邓和周恩来再次合作的前景深感忧虑，因此打着批判已故林彪的幌子来含沙射影地攻击他们二人。当邓在 1973 年底又一次被任命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任职时（他曾在 8 月与其他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受害者一起被选入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四人帮”的攻击更加剧了，而且一直持续了三年。在后来的几年中，毛在中共十大之后身体越来越虚弱，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尽管邓已经年纪很大了，但仍被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邓在 1974 年率领一个代表团赴联合国就毛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发表了讲话。

1974 年底，由于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邓和“四人帮”的关系越来越糟。周的病情十分严重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里。邓代替周负责共产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中共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这些职位上他能够在周的指导下多做些工作来制定他认为是必要的新的政策。尽管他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还能有几个“文化大革命”前的同事积极地帮助他——著名的有胡耀邦。邓绝妙的一着是使一些干部官复原职（如胡乔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官员），组成新的联合体来工作。在这些人的合作下，如同六十年代初一样，中央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邓和周的新政策是从周恩来 1975 年 1 月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启发的，被人们称为“四个现代化”。这个报告是邓主持起草的。在报告中周谈到了他于 1964 年在毛的支持下曾提到的一个大体想法，那就是在本世纪末使中国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全面实现现代化。邓在 1975 年组织了一系列会议来讨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方法，起草了一系列文献，其中有三个文件涉及到经济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问题。这三个文件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后来被“四人帮”批判为“三株毒草”。

邓本人就军队、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发表了讲话。他的意见的实质就是几乎完全否定毛的动员群众的政治路线和“文化大革命”。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调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对工人和农民提供物质刺激从而鼓励他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不是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政治热情。邓还论证了中国应该放弃自我封闭的经济政策，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建议共和国应该出日原材料，如煤和石油，还有批量生产的化学产品（主要是煤的副产品）以便进口高级、高精密性、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加速我们工业的技术改造，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提出的军队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这对邓开展工作来说，可谓逆水行舟，困难极大。而实现邓所表明的愿望则困难更大：经济生产中的质量和渐进应代替数量和速

度。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

邓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决不限于经济发展这方面。他再次重申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因为他认为这些方面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威胁和破坏。他以抨击林彪为名实际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对毛主席语录力量的依赖性。他的论点主要是说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化为几条语录，他不同意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解释。这纯粹是对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从而导致共产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11)以他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思想必须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提到毛过去对“实事求是”必要性的评论，后来1978年才提出。

和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样，邓根据党在四十年代初所制定的原则提倡整党。事实上，他多次特别提到党从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传统和作风。据邓所说，共产党最近已经忽略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实行自我批评”。结果是共产党变成了具有派性的政党，缺乏合适的党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

很明显，这些评论并不打算讨论党内反邓派的观点，然而，在1975年，他进一步要求对那些像他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清除的人的案子进行重新审查，这对那些当时由于这些事件才爬上现在领导职位的人来说构成了直接威胁，也最终为他在1975年1月再次受到批判和后来1976年再次被免职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至少是一个借口。(12)

整个1975年，中央领导内部的激进分子都试图牵制邓。三四月份，姚文元和张春桥对邓的政策理论发起攻击，声称如果实行这些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邓建议应该有一套刺激机制来促进生产，竟被说成是逐渐削弱社会主义并最终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开端。(13)尽管没有点名，但邓和周均被划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

这一年的后期，邓成为更明确的讽喻批判对象，这个讽喻当时成了头版新闻。缺乏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政治，特别是在毛支配中国政治的时代，意味着当时的政治辩论往往借以对历史或古典文学的重新解释而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焦点是在著名的《水浒传》和官的主人公之一宋江身上。宋江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个反叛者但最终还是为皇帝服务的。1975年后朗开始的辩论就是关于是否应该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百待向统治阶级投降的宋江，报纸上用宋江来影射邓小平，说他向资本主义投降而应受抨击。

1975年的大部分时候，邓似乎能力他的行为而取得毛的赞同。可是，当邓加紧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也就越来越引起毛的关注，尤其是当邓提出那些当时受批判的人的案子应该重新审查时，或至少当这件事引起毛的特别注意时，在11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邓兼任的职务除外事方面均被解除——外事方面他曾负责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磋商，

并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过法国。紧接着又发起了一次以反对“右倾翻案风”为高度明确目标的政治运动：简言之就是针对邓小平以及他的要求。想让共产党修改它近来的历史及现行政策。

长期保护邓小平的周恩来于 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邓的特殊问题也就很快到了严重关头。邓明智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极其危险，至少不久的将来会如此。他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发言不像以前那样联系当前的情况，而是几乎机械呆板地一味追述周的革命功绩，关于 1949 年后的一段时期他只特别提到了周公认的两个方向：外事工作和对毛主席的支持。(14)

在某个阶段，毛曾明显地赞成对邓不仅解除职务而且点名批评。(15)邓作为毛和周接班人的位置被华国锋正式占去。华曾是一名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方升到同家领导人的职位上。1976 年 1 月，当周恩来逝世时，他被任命当代总理负责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想让邓靠边站的这着棋走得乱了套，阻力不久变得十分明朗。然而，对邓偏激的攻击进行时，邓推行政策与纪念周恩来的活动都在同时继续。

3 月 28 日，上海的“文汇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周恩来和邓分别批为党内妄图复辟的走资派和党内被打倒的至今仍不悔改的走资派。江苏的省会南京对《文汇报》上的这篇文章的反应极其强烈，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来反对亵渎对周恩来的纪念、邓和四个现代化。(16)几天之后，南京事件的新闻传到北京，于是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事。1976 年 4 月 4 日是清明节，也是扫墓的节日，是中国人传统上对死者表示敬意的节日，这就为组织游行纪念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进而扩大为支持邓小平、反对不得人心的“四人帮”。4 月 4 日，人们举着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带着表明对周和江青政治观点的诗词簇拥到地处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4 月 4 日傍晚，地方安全部队清除了这些花圈和诗词。4 月 5 日，群众对此反应极具敌对性，迅速聚集起来的人群怒不可遏，矛头直指那些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及国家的镇压部队。广场东南边的公安局被人放了火。傍晚时分已有好几处地方不堪入目，后来动用了武力才驱散了人群。北京市市长吴德在公安部部长（也是代总理）华国锋及附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警卫队队长汪东兴的帮助下，调来了公安部队来处理这项事端，他们都是政治局要员。

1976 年 4 月 6 日、7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把这次示威游行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应对此负责；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17)但邓被新闻媒介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党内走资派”等术语攻击达数日。1975 年准备的三篇重要报告也被继续斥为“三株毒草”。同时，其他与邓长期密切交往的老干部也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被迫离职，其中著名的有两位他以前的桥牌老搭档胡耀邦和万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

尽管官方媒介可能仍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样对待邓，但他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像从前那样受罪。有些人马上为他提供了保护，认为毛操纵的局势有可能再次不可收拾，其中之一有叶剑英。叶是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资历较深的委员，还是国防部部长。1973年邓复职后不久，他就对邓明确表示他支持变革、反对“四人帮”。叶能通过他的和邓的一些个人关系来提供保护。叶是广东人，和他家乡省市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也是如此。(18)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时是邓的部下。

当时中国的政界明显地极不稳定。大家似乎都知道毛快不行了，“四人帮”肯定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加紧巩固他们的职位，但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也没有。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继任的问题——在人和政策两方面——终于必须解决了。“四人帮”尽管野心很大，但他们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却疏忽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赞助和党内支持。其结果是他们唯一的支持基础几乎就剩下与毛泽东的关系了。在毛逝世后的一个月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分别碰了头，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逮捕了“四人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主席。(19)

尽管邓当时已正式退出领导班子，但他的地位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从毛泽东逝世那一刻起，邓就被看作是被流放的领导人；从逮捕“四人帮”时起，邓就成了待任命的领导人。他政治势力的一个主要来源精确他说也可能就是“四人帮”曾试图要求承认的——华国锋不久也要试图要求承认的——那种合法性，他们都是通过与毛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他们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的地位来要求的。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为密切，领导班子中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支持他的那些人——在时间上超过了任何支持“四人帮”的人，甚至超过支持华国锋的那些人。(20)那些曾经是毛的追随者而要求平反的人寄希望于他，拥护他当领袖；其他人则把邓看作是继毛之后的“顺其自然”的领袖。因为邓和毛的长期关系，邓的绝对忠诚均是在他们所参加过的革命中有目共睹的。同时，邓有几十年的组织和政治关系，这使他能够并且做到了把群众动员起来给予他政治上的支持，一如他“文化大革命”前在中义中央书记处时及1973年复职担任副总理时的工作一样。另外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周恩来以前的支持者和保护对象，而已包括他本人在太行山区和第二野战军中而建立的一些重要关系。

事实上也是当时大部分问题的根源所在，使中国的政治不能轻易地摆脱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自从华国锋1975年底由于邓被解除职务而成为中共第一副主席以来，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邓的复职必须要和华国锋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另一个问题是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决定对于“文化大革命”

应持多大的否定态度。同时领导层中的许多成员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以某种方式混进来的。即使他们愿意站出来反对“四人帮”，但也并不一定愿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即使否定大部分也不愿意。

当华国锋在 1976 年 10 月 10 日被确定为党中央的主席之后，邓马上写信给华，恳求允许他重新回去工作。(21)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以及 1972 年在毛面前曾为邓极力疏通身为副总理的王震都强烈恳求邓回来工作。华国锋以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来拖延，因为会议的结果无疑是这些压力将导致邓复职的决议。而对这次政治行为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华想巩固他自己的极为脆弱的政治地位。另一个较为宽厚的解释就是在党当时处于发展中的困难时期。华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最大限度的团结。(22)

一种试图通过官方媒介建立对华的个人崇拜运动展开了。毛于 4 月 30 日把华作为他的接班人而进行了官方任命。根据报道当时毛曾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新闻界对这些情况作了广泛的宣传。1977 年 1 月，基于和毛的这层关系，华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用以加强他的合法地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了“两报一刊”社论，登载在 2 月 7 日的报纸上。社论吹捧了现在称之为“两个凡是”的立场的许多优点，这些人虽然不是“四人帮”时的同伙，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提拔上来的。

然而，潮流的趋势很快转向反对华，其主要原因是毛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另外，华需要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来使粉碎“四人帮”合法化从而达到确定他自己地位的目的。而且，邓可能对毛的政策决定和指示比当时政治局的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多。于是邓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而发起了运动，虽然针对性是间接的。根据共产党公认的历史，邓开始详细讨论他的同志们的观点，发现他们非常支持他本人不相信“两个凡是”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法这一理论。(23)

3 月，中央工作会议热烈恳求邓复职，同意他恢复 1975 年底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但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由华国锋来决定。4 月，邓和华还有叶剑英交换了意见，交谈中邓又一次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不要使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不要教条地对待它、而要把它作为一套更具灵活性的思想体系的重要性。(24)这样就商定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会议确定邓需返回的政界和确定华的中共主席的地位。但对华来说这却是一场空欢喜。

邓的复职从 1977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始，在那次会议上，他立即针对毛泽东思想基本认识论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总的来说，他不理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而是对“四人帮”和林彪进行痛斥，并且用毛为在延安的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来做为他的论据。(25)

很快，在 8 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场争议。华国锋在会议上的讲话通过断言“文化大革命”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次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大革命”来为这次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划上了句名。此外，通过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他强调了毛把矛头对准“走资派”的正确性。对比之下，邓却强调继续发扬党的传统和工作方式的必要性，邓的断言与华恰恰相反。(26)事实上，到今年年底，随着军队现代化机制的引进，邓已经在开始实施至少从 1975 年以来就在蕴酿的计划事。

1978 年 2 月下旬到 3 月初，当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进行。随着毛的去世，在领导班子内部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一如当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所出现的那样。然而，这次是那些在 1967—1968 年间被解除职务的人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时候，他们当然要支持邓，主张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着毫不奇怪。(27)

邓在 1978 年的地位非常稳定，他能出访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制定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各种安排（1974—1975 年他曾负责谈判）；出台知识分子和教育的新政策。这实际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对着干的。同时，他继续建立他的改革联合体，这时胡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重新改写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28)文章从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毛在延安的口号“实事求是”中得到启发，实质上它论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提供的观点和基本原理，而不是主席语录的文字本身，“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9)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的高级和有影响人物的必要支持，其中包括罗瑞卿（就在他 8 月份去世的前不久）和李先念等人。(30)

1977 年，曾要让邓承认他所犯过的错误。到 1978 年底，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支持“两个凡是”的人所犯的错误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它之前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高潮来临。这两次会议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共持续了 11 月和 12 月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会议，越南边境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中美宣布两国将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是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事件引发的“民主运动”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展起来。

此次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当然也可以说它标志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改革时代的开始。会议决定把经济现代化提到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来；通过政治上、行政上和法律上的改革来支持经济的现代化；为许多还没有得到平反的“文化大革命”前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翻案，包括邓以前的亲密战友陶铸和彭德怀，还有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恢复党的民主；分散农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

初步评价后，还要进行比较彻底的评价。会议批准广中共北京市委在 11 月中旬所作出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事件。”(31)

尽管三中全会的结果当时并没有马上显示出来，但实际上华国锋还是在保持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地位的这场战斗中输给了邓，不论后者正式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前者均是满盘皆输。邓曾在六十年代初支持的和七十年代中期再次支持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方针政策现在能够得到贯彻实施了，曾经一起合作共绘蓝图的那班子人马现在又一起控制着共产党和经济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邓一直不厌其烦提倡的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政策，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对于邓来说三中全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把他的远见付诸实践的真正挑战还远未到来。

注释

刘萍萍、刘园园、刘婷婷《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父亲刘少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1 页。

沃尔夫冈·巴克：《传记辞典与中共领导层的分析（1922—1988 年）》穆切恩，K·G·索亚出版公司，1990 年，参见 429 页。

林青山《风云十年与邓小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 208 页。

这段时期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他的女儿邓榕（毛毛）曾写过《在江苏的日子里》载于《人民日报》1984.8.22 第三版。这个记载也出现在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第一卷第 91 页。第二个来源是邱直卓《邓小平在 1969—1972》，载于《华人世界》第一期，1988。第三个来源是林青山《风云十年与邓小平》。

高文谦《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艰苦而辉煌的最后岁月》，载于《人民日报》1986.1.5。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 143 页。

大卫·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传略，1949—1978 年》载于《英国政治学杂志》第 10 卷第 1 章第 39 页，1980 年 1 月。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87 页。

w·怀特森：《中共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载于《中国季刊》第 37 期第 1 页；w·帕里斯：《中国军事政治中的派系》载于《中国季刊》第 56 期第 667 页。

此处“激进分子”指的是政治联系而不得是思想意识的态度。参见：纪登奎《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第 3 页；《中国法律与政府》第 5 卷第 3—4 期，第 31 页；起诉书载于《中国历史上的大审判》北京，新

世界出版社，1981年。

(11)《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9页。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317页。

(13)所谓“资产阶级特权”的原则最著名的论述，也就是他们正在批判的，可以在姚文元《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找到，北京，外语出版社，1975。原载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张春桥《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北京，外语出版社，1975年，原载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14)《在周总理追悼会上的悼词》1976年1月15日，载于《邓小平言论集》第102页。

(15)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413页。

(16)盖尼·路易和凯姆·路依：《在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学所起的作用》载于《中国季刊》第86期，第332页。

(17)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54页。

(18)范硕和丁家奇《叶剑英》，载于《中央党史人物传》第40章第107页；也参见范硕《叶剑英在1976》，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叶也是客家人，1976年所发生的事件也是关于邓的客家人背景传闻的一个来源。

(19)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54页。

(20)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在毛统治下和毛之后的标准规则》载于《中国的领导层、合法性和冲突》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

(21)《给汪东兴同志转华国锋同志的信》，见《邓小平言论集》第108页。

(22)F·C·泰维斯：《领袖的合法性》载于《中国的领导层、合法性和冲突》第82页。

(23)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70页。

(24)《给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的信》载于《邓小平言论集》第109页。

(25)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8页。

(26)两个讲话都可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北京，外语出版社，1977。华的详细评论在第32页，邓的讲话在第189页。

(27)大卫·古德曼：《1976年9月之后领导层中的人事变动》载于吉根·多密斯编的《毛之后的中国政治》卡迪夫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28)扬中美：《胡耀邦》第130页。

(29)《人民日报》1978年5月12日。

(30)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82页。

(31)1978 年 11 月 15 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

第七章 改革的基础（1979—198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往往把 1978 年 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中国继 1911 年和 1949 年革命之后二十世纪历史上的第三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此解释的力度相当明显：到九十年代中期，三中全会掀起的改革浪潮已经引起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化。自 1978 年以来经济一直在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高于 9% 的速度增长，到 1993 年经济总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而且，较经济增长总数更惊人的则是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从政府直接参与管理变为宏观经济调控。到 1991 年经济国有部门的工业生产总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多一点，与 1978 年的近 80% 相比下降了许多。据报道，到 1994 年，国有部门内部大约有 30% 的职工与单位签有合同而不是象从前那样端铁饭碗。社会主义给构中一个更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在 1994 年初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提出来的禁止财政部借用银行资金来偿还国债。

三中全会无疑很重要。然而它仅仅是 1978 年底和 1979 年初制定改革议程的一系列主要会议之一——尽管这次会议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这些会议为近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 1984 年底。尽管这期间曾遇到过阻力，但它却是中共全体领导特别是邓小平的一个相当伟大的成就。这不仅是邓小平占支配地位的一段时期——他在 1985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从政府的日常工作中退居到了二线——而且是他参与政策制定以来最有作为的一段时期。此外，它还是共和国政治空前稳定的时期。

经济改革方案从巩固与重新调整的直接政策出台开始，一直极其成功地贯彻到 1984 年，不过在这段时间改革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到 1983 年，已经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达到了 1981—1985 的五年计划的目标，看起来似乎到 2000 年人均收入翻两番的长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由于改革及农村经济财富的增长，乡镇企业很快发展起来，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政治方面，中共领导班子也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团结与稳定。党内虽然有争论，尽管这可能不符合邓对这些过程的理想描绘，但也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需要通过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武断和暴力来解决。尽管“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派性一时还难以完全消除，但它已不再是政治上重要的决定因素了。人们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工作，重新建立法律制度，并开始彻底改革政府体制。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国有一种倾向，认为邓小平象征着自 1978 年以来的整个改革时代或至少象征着改革的成就。许多关于改革过程与邓小平的生活和工作的书籍纷纷出版。邓被人们认为是改革时代的设计师，这无可非议，但与改革的设计师还不太一样。要想区别这两者可能时间上还不太合适，因为证据不足或难以找到，然而，在这部邓的传记中却需要进行这种尝试。

邓领导着一个集体的领导班子，他在改革方案许多方面的贡献就是为他人实施创造条件而不是本人直接负责：这种领导方式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幕后指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明显地没有忽视经济改革——他能够也曾主张自己应该对领导许多重要的经济首创和行为负责——但还是把具体步骤的决定权留给了其他人，特别是从前那些在六十年代初曾一道起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议的人——陈云、彭真、薄一波和李先念——还有新一代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和万里。

就邓本人来说，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前一段时期，他似乎把精力放在两个他具有一定经验和专长的政策领域上：政府改革和外交事务。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最终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和邓长期试图建立党内民主与更开放的——尽管还是有限的——政府体制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建立开放的政治体制这一目标由于它固有的模棱两可性而证明是特别难以捉摸的。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和党的领导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整个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常性的主题，甚至在 1989 年 5 月试图和解告于失败之前依然如此。

在外交上，邓取得的成就更大：他逐渐为中国制订出一项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同时也包含了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开放政策不仅使经济迅速增长而且使中国和东亚、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形成了一体化——虽然方式方法可能出人意料，最终影响尚未卜定。十年来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不断缓和，最终达到了两党之间关系的恢复和戈尔巴乔夫 1989 年 5 月，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来到中国北京访问。1984 年经过和英国艰难的谈判后，在香港 1997 年回归中国的程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发动改革

尽管人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之前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激烈辩论的会议，但三中全会的最后公报在中共政治改革的方向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重建和改革工作还是不能顺利地进行：有许多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面临方向的扭转，这些问题在 1979 年上半年的一系列高级会议上仍引起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成为热门话题，直到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才告结束。

从 1 月份开始经过不同的阶段一直持续到 8 月初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始终在讨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由胡耀邦主持——胡耀邦在三中全会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基本上肯定了他在 1978 年代表邓推出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讨论。早期阶段出席会议的主要是那些在中央工作的人，而后期阶段各省的干部、宣传行政人员和理论家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的评议过程中，为更广泛的民主运动设定了界限。

1976—1978 年间，经济搞得过热，其方式方法整个八十年代是家喻户晓的。1992 年，邓小平回顾这段往事，不仅指出经济迅速增长长期过后接着就有必要紧缩（过一段紧日子），党的领导应该清楚这种不断重复的模式，而且还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和所采取的解决办法都颇具争议。在这种情况下，一段迅速增长长期就和过多的基本建设、把外资的使用放到非生产部门、严重的经济失调、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等幽灵均有关系。

1979 年的头几个月，陈云一直在积极动员大家支持他的想法：把市场竞争与按比例的发展引入经济中来。陈云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者，当时这个计划被毛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大跃进”的战略。3 月份，随着六十年代的经济规划者们几乎全部重返工作岗位，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短期经济战略的修正案，这个方案在摆出各项选择方案后提倡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要有一项重新调整的政策——实质上是一项极度的财政保守和调整的政策。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也讲了话，并表示要对陈云全力支持。(11)

然而，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所有改革的尝试都要停止，即使在这种初期阶段，为经济改革所设置的总方向也是清楚可见的。陈云和邓小平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关键的原则，那就是过分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根本不能在现代化的经济中以灵活的方式管理生产过程。他们建议应该给予生产单位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不仅要从共产党的干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曾经意味着政治工作往往作为主要活动代替生产——而且也要从政府的干涉中解脱出来。除了国民工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外，地方和中央政府均不再予以干涉，尽管以前管理这些企业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次改革的根本一面不完全是以前曾提倡的政府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还有共产党在企业 and 工厂中的作用第一次受到完全放弃领导前景的挑战。(12)

支持邓小平在经济管理方面试行各种分散经营的人是他的两个长期同事——万里和赵紫阳，他们俩四十年代在太行山区时都是邓的部下，从那以后的不同时期以来一直在工作上和他密切合作。万里从“文化大革命”前就是邓的桥牌搭档，在“文化大革命”中和1976年都因为是邓的支持者之一而被撤职。七十年代后期他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那儿他监督了农业分散耕作和“责任制”的采用：六十年代初在那里试验性地搞过类似的首创，邓也曾在1962年的一篇讲话中讨论了这些影响。(13)这一经验当时准备作为典范推广到全国。实质上“责任制”的意思是每家农民种自己的地，在契约的基础上负责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国家保证购买。农户生产的剩余部分由其自由支配。尽管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情况与1943年抗战时期的情况不同，但这些原则——双重责任和自由支配剩余——仍然是邓对解决当时太行山区的问题所提倡的那些原则。(14)

七十年代后期赵紫阳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那里他不仅实行了与安徽相类似的农村改革，而且还负责在工业企业中采用与农村责任制相对应的城市责任制——经常称其为“四川试验”——这种政策下的企业获得了相当多的经营自主权。有趣的是，这种经常改革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四川早在1955年和1956年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15)尽管邓于五十年代初期在四川任过职，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与城市改革规划的原则或实践有长期的个人联系。(16)

新经济秩序的一个后续特征就是经济特区，这无疑应归功于邓小平。经济特区是在1979年4月召开的讨论经济改革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和财政环境，可以有利于外商，并能吸引外资和技术。邓提出这些区域应该建在华南的广东省和福建省，这倒不是因为它们分别和香港、台湾邻近（尽管这一点在八十年代明显地越来越重要），而是因为这些省份在历史上就当作中国通往世界各地的门户。(17)后来在九十年代，当邓在其种程度上声称经济特区的建立总的来说是他的功劳时，他也提出没有在上海建立经济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18)

现在特区要求的权利很多，尤其是深圳。然而，人们很容易忘记特区的存在存一段时间以来曾在领导内部引起政治上的敏感。事实上，建立特区的原因之一（尽管不一定是邓的观点），就是希望伴随外国技术进口而来的潜在有害影响能被限制在其产生影响的经济特区之内。当时中央领导不可能想到发展经济特区会有助于1979年及以后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的合并：首先，和越南的磨擦越来越严重，在议事日程上重于和香港，台湾的关系：第二，总之这个时期，中央领导似乎更注重与台湾的关系，而对与香港的关系则不大感兴趣。(19)

尽管改革随着后来进一步的发展逐步远离集中的计划经济，但邓在1979年。事实上整个八十年代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过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比以前更为广泛。虽然邓在经济学上没有陈

云在行，但他总是把政府部门看成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在政治上，他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他以为对共产党的主要作用根本不能也不应该表示疑问。(20)对于邓来说，民主是使共产党政府更有能力的依据，而不是使共产党政府有可能通过投票箱而消失的理由。(21)

邓对党的领导极为坚定，而一些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这成了三中全会之后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 1978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人们无疑已意识到闭关自守的政治就要结束，而民主运动已经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活跃起来。如上所述，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背景是邓小平坚持要为 1976 年天安门事件的政治定论平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事实上也基本是舆论宣传所促成的这个决定）表示致意，近乎激进地声明它是深得人心的行动。

“这次规模空前的运动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不属于‘四人帮’，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决定历史的进程。4 月份天安门广场事件是谁组织的？是人民。是谁指挥的？是人民”。(22)这篇社论起了导火索的作用，引发了进一步要求更多民主的示威游行，而不管“民主”这一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在北京和许多城市都建立起了街头集会场所，来讨论民主，事实上总的来说也就是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所出现的民主运动是受邓本人的鼓励。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3)

那些参加民主运动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看作是忠诚的在野分子，认为他们是赞成提倡民主的，因为“民主”的确是三中全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也有一两个示威者和贴大字报的人矛头直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甚至邓小平本人。

邓给新的“社会主义民主”下定义时的反应极为迅速，在 1979 年 3 月底就理论工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邓提出了用来判断良好政治表现行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4)任何违背这四项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 历史遗留问题 ”

除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以外，中共领导在三中全会之后还要面临如邓所说的“ 历史遗留问题 ”，“ 这些问题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 ”。(25)中共必须决定怎样处理在押的“ 四人帮 ”，正如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应怎样重新评价“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这些问题必然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们的未来命运有关。尽管他们至少对逮捕“ 四人帮 ”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却是作为“ 文化大革命 ”的直接产物而进入领导班子，从而在政治上获益的。

对中共历史的重新评价虽然在三中全会上通过，但贯彻起来却不大顺利。比如关于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地位的问题，在细节上有待讨论，但在平反问题上很快就得到通过。刘的遗孀“ 文化大革命 ”以来在 1979 年 2 月的春节联欢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然而，重新评价也牵趾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还会和“ 四人帮 ”的最终处理有关。邓强调为了支持现代化必须健全民主与法制。

对“ 四人帮 ”、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审判由于讨论更广泛的问题而延迟了。邓总是希望共产党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地区别开来，后者是 1949 年以前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也希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在 1958 年之后的行为区别开来。如果不加以区别，“ 文化大革命 ”的责任全部推给“ 四人帮 ”，再把毛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也推卸掉，而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又是在“ 文化大革命 ”即将结束时方才上台，那么他们就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毛也应该对“ 文化大革命 ”负一定的责任，而且认为毛在 1958 年后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本身，那么毛后来的一切行为都值得怀疑，华国锋也跑不了。

按照邓的说法，“ 文化大革命 ”最终还是全盘否定了。八十年代由胡乔木牵头的一个小组在邓和胡耀邦的指导下起草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多次传阅讨论，在 1981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最后通过。(26)此时，华国锋及其他与之有牵连的中央领导人——著名的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认命，有的自动下了台，有的被降了职。

理所当然，始终坚持否定“ 文化大革命 ”的“ 文化大革命 ”受害者们，都应该彻底官复原职。这个程序在 1979 年仍在继续，当时不少“ 文化大革命 ”受害者形成了一股复职潮流，其中有邓以前的同事们——包括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和其他几个恢复中央委员的人。同时，彭真被重新任命，赵紫阳则是首次得以任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1980 年 2 月，为刘少奇进行了身后平反，支持华国锋“ 两个凡是 ”的四个政治局委员被撤销职务。然而，这并不是清除，只是降职，和邓重新强调的党内民主是一致的：既不威胁其生命，也不威胁其生活。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取代了华的国家总理职务；

八十年代初，开始对“四人帮”和那些仍然在世的林彪同党进行审判，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27)此时，华已经主动辞去了中共主席的职务，邓当时已经 76 岁了，以年龄大为理由拒绝出任主席一职，随之胡耀邦成为主席，不过邓的确是同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28)

邓的意思很清楚，想创造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尽管他大概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新的而是看作为中共早期政治作风的一种再现。1980 年 1 月，他建议在宪法中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29)为了听取更广泛的意见，邓决定树立一种新的领导作风。比如，1980 年他到四川视察，当他在风景名胜点停留时助手曾提出关闭峨眉山，邓拒绝了；他还拒绝了为他个人进行川剧表演的提议，他说，他完全能象普通老百姓那样去看演出。(30)根据同样的精神，在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取消了中共主席这个专门为毛泽东设置的职位，代之以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治改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的政治改革计划和解决新领导班子直接面临的政治问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决议”虽然批评了华国锋在毛死后的两年中犯了“左”的错误，也断然否定了毛泽东本人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文化大革命”，但“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传统的重新解释，更能证实邓的远见卓识。(31)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对那些传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党内民主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整理，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恢复这些传统。

尽管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解释在 1981 年 6 月方被共产党正式认可，但邓在此之前坚持不懈地论证这件事，已颇有一段时间，尤其他于 1980 年 8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对他的政治改革态度最彻底的一次阐述。(32)事实上，在那之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无论什么时候要特别强调政治改革这个主题，总是从对这次讲话的分析出发而展开讨论。(33)他强调有必要使政府工作系统化，领导班子恢复活力，重新建立党内民主，并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这些都成为邓在整个八十年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实际上也和四十年代初有着强烈的共鸣。

在邓看来，政府工作体系化对于鼓励经济现代化及保持党和人民之间良好关系都有必要。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有效地分开，个人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建立行政秩序。这些要求的产生基于他对三种倾向的批判，这三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特别严重，但也是共产党长期面临的问题。一种倾向是党逐步代替政府，邓第一次谈到这个倾向是于 1940 年初在太行山区时，虽然是在根本不同的战时条件下。(34)根据邓的观点，中共应该是引导而不是统治：如果党代替了政府，那么两者都不能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政府等待共产党的干涉，而后者却负担过重。第二种倾向是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集中于中共的手里，而且集中在想垄断党、军队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几个特殊的个人手里，从而使政府个人化，也导致效能差。第三种与其有关的倾向就是官僚政治中的那种倾向：往往没有责任制和行政制度。(35)

邓要求中共领导班子恢复活力，无论是 1980 年还是以后都很强硬，值得注意的是，1980 年以来的大部分时候邓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准备接受他曾给予别人的同样的建议。1980 年给他中共主席这个职位时，他没有接受；1985 年从行政管理的第一线退了下来；1989 年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89 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他在 1980 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共太多的领导要么是年纪太大、身体太差，要么是太没有经验以致于无法完成共和国所面临的经济现代化的新任务。他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除、而又刚刚恢复职务的那一代革命者们建议，尽可能早地退休，让位给年轻的一代。出于这个目的，也为了让这些老干部继续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邓在 1982 年提出暂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有效的二线机构。它在

1989 年逐渐酿成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在这一阶段，邓也关心更长远的继任前景。他希望将来会更有条理地进行新老交替，为此他建议中共应该有培养计划，从中选出未来有希望的领导人，并取消干部终身制。

这些建议均与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和建立党内民主的远见相关联。(36) “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化的武断政治被以集体领导、讨论、争议为基础的体制所取代。根据邓的观点，共产党应该接受不可避免发生的错误并努力减轻其造成的后果。邓回顾起来认为，三中全会后的这段时间领导班子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强调正确的政策只有通过尝试和错误包括某种冒险才能产生，因为“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保证他们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37)

以邓的观点来看，纪律的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为此三中全会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 1982 年的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选举出了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党员个人和党内政治表现的规定，在 1980 年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进行了详细论述。(38)最重要的一点是邓坚持认为党内事务应在党内解决，他不同意毛在五十年代搞“大民主”的意图。

邓的政治改革计划的最后一项是鼓励党领导下的民主。邓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项计划都很重要。他强调需要调动社会上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尤其是邓着意在经济现代化的事业中，重新重用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臭老九”。在 1979 年明确宣布“四项基本原则”时，却对民主进行了一些限制。从而使再开放的社会也不能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邓的政治改革计划是他对中国的未来高瞻远瞩的一部分。在 198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把这形容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的尝试。除了政治和经济改革，邓的远见还放在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上。邓具有一定限制的“ 开放政策 ”，目的就是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从而有助于经济现代化的实现。

“ 开放政策 ” 的一个明确标志就是经济特区。开始在广东省（深圳、珠海和汕头），后来在福建省（厦门），然后在海南岛（1988 年）都建立了经济特区。1984 年初，有人对经济特区的出现表示怀疑，主要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 精神污染 ” 的进门渠道。然而，邓的干预具有决定意义。

邓一方面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并力争执行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邓在八十年代会见外宾时，特别是会见来自共产主义东欧的外宾时，几乎每一次都要对他们说，并且措辞往往一样——据说基辛格把邓称为“ 脾气不好的小个子 ” (39)——谁也没有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自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观点使邓在七十年代末进一步密切了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与苏共也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曾想对中国发号施令。似乎更有可能的是，邓牢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个人曾卷了进去，也吸取了过分依赖同盟国的教训，因而邓总是把七十年代后期的中美密切关系看成是暂时性的。(40) 然而，在 1979 年那次他对美国著名的出访之后——当时除了其他活动，他还有一次野外宴会上，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在电视上露了面——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以确保避免过分依赖苏美这两个超级大国。整个八十年代，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复斟酌他对中共——苏共恢复关系所提出的条件，条件主要是要互相承认平等和独立。这点也并不完全是针对苏联提议的答复。也许是出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他似乎对欢迎戈尔巴乔夫 1989 年 5 月的来访感到很骄傲。(41)

邓的民族主义也更明显到家了。在边境战争之后，1979 年初在对越作战的决策上邓起了多大作用是鲜为人知的，不过好象他参加了那次最终决策的会议。(42)

邓参与了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 一国两制 ” 的政策也主要归功于他。在这个标题下，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虽然明显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但可以继续存在，甚至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之后仍可继续存在。关于香港的这项协议当然本身就足以算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目标，不过当时邓所追求的更大的目标是台湾。

直到 1984 年底，“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这个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主要是因为改革几乎没有触及到城市经济。随着 1984 年 10 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这次会议决定把改革的重点转到城

市经济和更复杂的经济方面来。(43)甚至在改革时代更早些的时候，经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势就首先由陈云而不是邓小平提了出来。陈云把关于进一步调整经济的关键性报告提交给全体会议，这份报告实质上也就表明了一种经济管理将由直接参与变为实行宏观经济控制的经济未来。陈云在鼓励更显著更深远的经济改革，同时，他对其产生的政治和社会结果，更为小心谨慎，并强调有必要控制潜在的现代化中出现的过火行为。(44)

邓对现代化带来的广泛的结果很关注，再次强调了陈云在 1984 年 10 月发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号召。他的更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以高度明确的社会秩序概念为基础的。在他后来会见斯蒂芬·科罗舍茨（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时，他对自己就专家治国式的民主的看法作了一次爽快的总结发言：“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优越于自由民主）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45)邓早就把西方或资产阶级的势力影响形容为“精神污染”，他强调反对“精神污染”是处于他那个地位的必然结果，1982 年他曾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支持共产党经济现代化的运动。正如他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时所指出的：“青年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46)八十年代曾有 4 次——1981、1983、1986、1989——邓带头发起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6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甚至点名抨击一名中国作家，因为据报道后者在日本时曾参观了一个日本的战争神社并去过红灯区，(47)这两个地方恰好都被认为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担心的“精神污染”的实例。

注释

海外类似的观点参见：如唐秋：《中国在重建中的马列主义政党、群众与公民》载于斯图尔特·R·舒尔姆编的《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香港，中文大学，1987 年第 257 页。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央银行进一步脱离政府》法新社，英文专稿，1994 年 3 月 1 日，引证 1994 年 2 月 28 日英文《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

最著名的有二十卷的《邓小平的生平、思想研究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当 1983 年《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新闻界的大部分单位对邓小平和改革的关系的类似论述更值得注意，各种干部、行政人员和理论家——包括高级领导人杨尚昆和李德生，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了大量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参见：杨尚昆《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统一的典范》，载于 1983 年 7 月 12 日《解放军报》；李德生《邓小平同志

在我党第三次历史性转变中的决策作用和卓越贡献》，载于1983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刘国光《邓小平同志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斗争中的重大贡献》，载于1983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L.W.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415页。

巴里·诺顿：《邓小平：经济学家》第491页。

大卫·古德曼和杰拉尔德·塞格编的《中国的分裂：地方主义与国际化》伦敦，鲁特莱基出版公司，1994年。

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卷，第48页。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陈云《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1979年3月2日，载于《陈云文选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6页。

(11)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99页。

(12)迟福林和黄海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第55页中，把这次首创归功于邓个人，然而，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确证。

(13)《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载于《邓小平文选》英文版第一卷第212页。

(14)《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在大行分局高于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1月26日，载于《战斗》第15期，1943年3月15日，第17页。

(15)细节参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新华半月刊》第20期，1956年，第52页。

(16)大卫·沙姆鲍尔：《一位总理的成长历程：赵紫阳作省级领导时的经历》科罗拉多，威斯特约出版社，1984年·尤见第六章《在四川的经验，国际的蓝图，1976—1979年》第75页及之后。

(17)《南方日报》，1984年6月11日。

(18)《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三部分，第377页。

(19)参见：邓小平《台湾回归祖国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页。

(20)大卫·沙姆鲍尔，《邓小平：政治家》载于《中国季刊》第135期第482页。

(21)史晓春《健全国家政治制度问题初议》，载于《民主与法制》第10期，1981年，第6页。

(22)《天安门事件真相》，载于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转载于《北京周报》，第48期，1978，第17页。

(23)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5——156页。

(2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8年3月30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6页。

(25)参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1页；《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9页。

(2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7页。

(27)审判的记载和它的结果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大审判》。

(28)《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1980年12月5日，载于《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6页；《胡耀邦同志在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81年6月29日，载于《问题和研究》，1981年12月，第75页；大概同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是为了减轻他以前的军事同事们对于目前的政治方向仍可能抱有的担心。据胡耀邦所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同事们都一致认为，不管邓在中央的正式职务是什么，邓都是总设计师。

(29)《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1—242页，“大字报”是正式的翻译，在英文中通常称为墙报。

(30)杰罗姆·西尔伯杰德和龚济水：《矛盾：艺术生活、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画家李华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

(31)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81年6月27日。

(32)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

(33)参见大卫·古德曼：《中国：向革命后时代的过渡》北京，外语出版社，1981年。文中讨论了1978年上半年关于政治改革的争论情况。

(34)《党与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4月15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页。

(35)大卫·古德曼：《毛之后的中国政治秩序：社会主义民主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载于《政治研究》第33卷第2期，1985年6月2日，第218页。

(36)见《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挥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页。

(37)《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二部分，第394页（缺乏争论）和第372页（关于错误）。

(38)《北京周报》，1980年4月7日，第11页。

(39)L.w.派伊：《邓小平与中国政治文化》第417页。

(40)《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二卷，第649页。

(41)《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42)《明报》（香港），1979年3月3日。

(43)《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载于新华社 1984 年 10 月 20 日的报道。

(44)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1984 年 10 月 20 日，载于《陈云文选》（1956—1985）第 297 页。

(45)《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 年 6 月 12 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0 页；《改革的步子要快点》载于《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第 192 页。

(46)《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 4 月 30 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9 页；《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英文版），第 184 页。

(47)1986 年 1 月 29 日新华社的每日报道。

第八章 换代交接（1985 及 1985 年之后）

邓本人和其他的领导人的隐退，并以此使党的领导恢复活力，在 1985 年和 1985 年后一直是邓所最关心的问题。1980 年邓拒绝担任党主席的职务，已经表明他认为自己太老了，不适合再担任任何新的职务了。总的看来他关心的是确保领导层中换代交接的进行。邓本人在 1985 年 9 月使自己摆脱了日常的行政事务，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退出了政治局，在 1989 年 11 月辞掉了他的最后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高级职务。尽管身为全高无上的领导人，似乎不存在着退休问题，也就是说他在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决策方面仍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不管怎样，他的隐退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日常的政治活动，这确是毋庸置疑的。

实施邓所期望的换代交接，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邓在 1992 年纵观全局回顾整个改革进程时，对缓慢的换代交接步伐感到有点不满，他说：“只要我们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敌对势力知道要改变中国是办不到的。但谁能保证一旦老一辈革命家不在了，将会怎样呢？”

邓所提及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普遍而又典型的。在他看来，整个领导层仍然是相当老化的。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起用更年轻的更有才能的干部仍然是当务之急，然而邓却对八十年代的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邓认为他俩都不能胜任新一代党的领袖的接班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俩不能够旗帜鲜明地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挑战进行斗争。

1985 年的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85 年 9 月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从总体来看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在此之后，由于面临着若干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改革的进程开始丧失它原有的势头。建立在邓长期所倡导的党的民主基础之上的政治稳定是八十年代初的特色之一。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活动在八十年代末消失了，然而在领导层内政治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尖锐了，特别是在 1988 年和 1988 年之后。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全面地应用于城市的经济改革中，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尽管三中全会后的共产党领导层对若干重大问题达成了绝对一致的共识，但在制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大政方针时，这种共识显得特别脆弱。关于中国需要外国技术，需要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中，需要根据经济规律而非政治标准制定计划，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和下放权力，对这些虽然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对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方式和速度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所产生的闲难，从长远观点来看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一系列直接的问题引起了小的经济危机，1984 年 10 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公布了经济改革原则的决定，特别是对城市的企业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由于企业利用了他们所获得的自主权，在 1984 年末导致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那几年，邓没有参加经济发展细节的制定，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靠陈云和从 1980 年 10 月以来担任总理的赵紫阳。然而，在 1986 年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和赵紫阳的分歧变得更大更加明显。

邓本人已经全力以赴对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改革，以便使其恢复活力。邓对八十年代中期解放军的改革计划的决定在政治上是难以进行的。解放军在七十年代中和末，特别是在叶剑英的领导下，一直是邓的改革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尽管解放军不想完全放弃它在政治上的作用，但很想使其武器装备现代化并成为一支专业化的技术军队。邓小平作出解放军必须改革的决定很可能是在 1979 年对越战争之后，那次军事行动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确切地说，邓是在 1980 年 3 月 和 1984 年 11 月提出军队改革的。

邓小平决定领导改组解放军的另一个可能是他意识到了他比别人更有可能和资格实施对军队的改革计划他曾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队将领并长期和军队保持着联系，在七十年代，他两次官复原职，都是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在 1917 年时，有一次他接待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叶对他说：“你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元帅，实际上你是我们这些元帅的带头人。” 1980 年邓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了，但是在那以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此外，为了确保军队的有力支持，邓小平利用后来的这个职务提拔了许多他原来的部

下，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来自太行区的老部下，杨得志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取代了邓担任了总参谋长。

那时军队改革的目标是设法使解放军的经费得到控制，提高军队的效率，使军队干部年轻化，建设一支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军队。他提出了解放军裁军 100 万；大部分的军队干部退休；把 11 个军区减少为 7 个军区；解放军的各部队改编成合成兵种的军队，不应再是四十年代那种以陆军为主的战斗序列。

邓小平主要是依靠他原先的那些老部下——特别是在太行区曾和他共事的人，一二九师的人及后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们，最终克服了来自解放军内各级领导的抵触意见。这次改编后，截至 1985 年底解放军中的 17 个最高级将领中有 10 个曾经是邓以前的老部下。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国家的机构也是党的机构，其成员完全是同一套班子，而且完全受邓小平以前的同事所控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班子，除邓之外的 8 个委员中有 5 个在抗日战争中就开始和邓共事了。

1982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之后，邓小平使领导年轻化的改革进展相对顺利，然而仍有众多的老干部包括一些军队干部抵制退休，所以展开了讨论。自 1984 年 10 月以来，就计划将领导干部年轻化和经济改革问题列为 1985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尽管有一些意见分歧，但这次代表大会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表明了党的团结。

在经济上所做的修补的折衷方案，其本质就是不稳定的。这次会议在制定 1986 年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虽然所有的发言都一致表示赞成，但他们对他们所赞成的那些要点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陈云对实施计划经济下的市场经济发出了严重警告；陈云还特别强调应确保粮食的高产；他还对一些党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表示关注。邓对后一点容易接受，而对前一点侍有保留意见，并确信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的优势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

这次会议对领导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尽管有很大阻力，但也得到通过。(11)其中包括象叶剑英这样一些军队的高级将领也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被那些更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和具有较强专业技术职称的领导所代替。最突出的例子是当时新增补的三位政治局成员：李鹏、乔石和胡启立，他们在当年的年龄都是 60 岁左右，李鹏在原苏联受到教育，是工程学院毕业生，在电力工业方面有丰富的理论经验。乔石长期在钢铁工业部门工作，后来成为政府的国际关系方面的令家。胡启立也是学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对共青团工作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并参加了教育体制的改革。然而仅仅在道理上说服了那些资深的老干部，就像在六十年代初一样，共产党的领导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从政治局日常工作中退居二线的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员资格的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干部；另一部分是担负起党和国家日常领导工作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人。

胡耀邦和赵紫阳

1985年之后，共产党的领导层围绕改革中的两种不同观点开始向两极分化了。一种观点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政治上相对开放的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另一种是较少政治自由的、共产党和政府继续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绝对控制的、由市场政策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前者更加自由的观点强调的是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同时并举；后者较保守的观点强调的是缓慢渐进的经济改革，极不情愿进行政治改革。辩论的焦点是：引进价格体系改革的时间和性质问题，还有党政分离的问题。

改革的开明观点似乎是由赵紫阳和胡耀邦提出的，至少也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在八十年代中到1986年底以前，他们似乎掌握着主动权，讨论并起草了引进价格改革的计划。1986年4月深化政治改革，特别是党政分离的试点工作在进行，在这时候，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关系仿佛出现了裂痕。

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经常提到他退休的可能性，可能他的真正打算是在八十年代分阶段地退休。的确他至少在1980年8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供大家讨论。(12)1986年8月初他告诉一位日本客人说，大家不让他退休。(13)在9月初，一家更自由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督促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该文说基于两点原因邓应退休：一是有助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二是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14)这篇文章和一些提倡政治改革的文章引导人们提出了更加广泛的民主要求，使邓小平极为关注。在9月下旬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看不出邓小平有退休的可能性。(15)

1986年底爆发了学生的示威游行，要求得到更大的民主，这次学潮提供了要求胡耀邦提前在1987年1月下台的借口。邓小平提出，胡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非个人原因离职的，并提出保留胡一定的领导职务，胡虽然不是党的十三大政治局常委了，但他仍然是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一直到他1989年4月去世。

随着胡耀邦的离职，赵紫阳立即被任命为党的代理总书记，万里成为代总理，这是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第三次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然而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时，在邓的影响下，党内的政治气氛似乎又倾向于改革的观点，这部分原因是由于邓的干涉：因几个月来邓目睹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改革产生的消极影响，决定重新发起政治改革运动。十三大召开前的5月份，作为党的学习文件，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这预示着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将以此为指导思想。在十三大上，赵紫阳在报告中陈述了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发展生产力是党的首要任务，而没有直接提及那些有关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社会主义概念化的东西。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人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选择，一些党代表们对那些反对政治改革的人投了否决票。邓小平正式退出了政治局，陈云和

彭真也退出了政治局。另外十三大的新领导班子似乎正式地把邓小平认作至高无上的领导。

1987 年底和 1988 年初，赵紫阳准备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因引进的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制度的并存，使经济陷入了困境，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两种结构中价格体系的差异。为了确定价格体系，赵紫阳寻求引进完整的市场机制，然而赵紫阳的反对者们指出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有危险的，它不仅削弱了党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会在广大群众中产生消极影响。

虽然在 1988 年上半年进行了价格改革的试验，但是在同年 7 月底，共产党的决策者们无限期推迟了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当时党的领导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中国陷入了通货膨胀的危机，价格飞涨，商品积压。向银行挤提存款。此后更加自由的改革被较保守的经济政策所取代，大量地削减了信贷和基建投资。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

首先是由于通货膨胀和随之带来的经济紧缩；接着是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民主激情受到挫伤，这两件事导致了爆炸性局势的产生。此外，共产党领导层内分歧意见的存在，所有这些在 1989 年都给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危机开始产生于 4 月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5 月底危机发展到最高潮。邓在回忆中说：这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16)从传统上讲，天安门是中国两种文化——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和人民大众文化的汇集点。寻求正义和要求申冤的中国人经常来到位于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向皇帝请愿。1919 年 5 月 4 日，民族主义者在这里举行了游行，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产生了作用。

1949 年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一起登上城楼的还有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从南方军事行动中专程赶来的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天安门前的广场加宽了，在广场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数百万红卫兵。1976 年，周恩来去世时，为了纪念周恩来和反对“四人帮”，举行游行的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这次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成为迫使邓小平 1976 年 4 月下台的借口。1989 年 4 月，大学生们为了纪念 4 月 15 日去世的胡耀邦（他是大学生心目中在 1986 年底所进行的民主运动的英雄），(17)又一次云集天安门广场进行了示威游行。后来，4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对这些游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说这些游行是妄图使全国陷入混乱的一个阴谋。

显然，邓认为这次游行是罪恶阴谋的表现——敌对势力正在幕后控制着学生。

4 月 27 日，作为对《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反响，在天安门广场导致了反政府游行。

在戈尔巴乔夫 5 月 11 日到达北京的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外界看来北京所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太大注意，人们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安门广场。5 月 20 日，开始实施戒严。

邓小平在戒严后所发生的事情中的作用，直到现在也不太清楚。戒严的实施遇到了极大困难。奉命进京的部队要么被围困，要么被说服到别的地方去，要么互相处于僵持局面。在有些地方局面乱成一团。因此做出了调入大量的荷枪实弹的军队进城决定。

6 月 9 日，邓小平在评论他所说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时，对所发生的一切显得异常的平静。邓小平说，这场风暴之所以肯定要发生，主要就是因为缺乏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措施和“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

的。但是以前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没有把它们作为基本的观念教育人民，教育大学生，教育各级干部和所有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接着表扬了解放军在平息暴乱中对共和国的忠诚和所做出的巨大牺牲。邓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18)这是当时所有的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中反复重复的一段话。在电视中看到邓小平亲自慰问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戒严部队。

后来有迹象表明，对邓具体参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能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在1989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谈到了天安门事件，虽然他又一次强调了中国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邓小平又说：“平息暴乱中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这是我们的方针。”接着他又特别批评了赵紫阳，他说：“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19)几个月后，据报导邓小平又进一步批评了赵紫阳，并且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给学生平反。据说邓小平在会见西德前总理斯密特的谈话中说：“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学生——问题的根源在党的领导层中。”(20)

退休与历史

1989年6月初的事件，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问题。政治上，需要恢复被破坏了的党的传统；经济上，必须继续实行紧缩政策。国际上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不仅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受到孤立，而更重要的是将会失掉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外国获得的资金与技术。因此需要制定一个调整政策，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这一政策。(21)

经济和政治的调整，显然是由共产党所掌握和决定的。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把1989年6月的事件向中国其它省份进行解释，然后即以通常一贯的做法进行更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经济上的调整，主要是缓慢经济发展的速度，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经济政策，使中国较少地依赖外援。特别是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通过了《优化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决议》。(22)

尽管国际舞台上的政策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制定的。但在1989年6月之后，中国通过改变经济模式的调整，大大加速了经济的发展。1989年前半年中国一直期望从发达的西方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进行贸易和得到投资，但是，中国不得已放弃了这种愿望。部分原因是由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变化；另外是由于北京中央政府的鼓励。所以从1989年后半年起，中国与近邻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一直增长，在某些方面，香港和台湾是最明显的——这两个地区在很短时间形成了高度的经济一体化。在1990年以后，为中国的经济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23)

毫无疑问，由于需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邓在1989年后半年成了官方传播媒体更为重要的人物，频繁地报导邓会见访问中国的客人。其中有11月份对北京进行非官方访问的北朝鲜的金日成，据悉这次来访主要就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24)在三个月内出版了邓小平的三本书——《邓小平文选》(1938—1965)和两本论文学和艺术的文集。9月份，发行了一个描写邓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广西作为政治组织者的一部电影——《百色起义》。(25)

11月份举行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正式同意了邓小平的退休，至少可说批准了邓辞去最后一个正式职务。1989年11月8日，中央委员会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邓对出席五中全会的人发表了离职讲演。(26)据说他对自己的退休私下进行了庆祝。11月13日，他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待最后一批官方的客人——日本工商业代表团时说：我借此机会正式告别我的政治生涯。(27)这仅是一种伟大的姿态，因为就在那个月底邓接见了非官方身份访问中国的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又一次成为各报纸的头条新闻。(28)

不管怎样，作为至高无上领导人的邓小平，从那时到后来是不可能退休的。迄今为止，人们还不清楚在八十年代共产党在重大决策的过程中，中央

的其他领导人是否认为需要有最后的仲裁人，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邓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在一些重大事情的决策过程中或多或少是最终的仲裁人。从 1987 年邓退出政治局后，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参加政治局会议了，但似乎是所有重要的政策性的文件和报告都要理所当然地送到他那里获得批准或征求意见。(29)解放军调人北京甚至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事任命显然仍需要经过邓的亲自批准。(30)此外，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某些特别棘手的事情必须达成妥协时，另外一些领导人就会求助于邓小平出面解决。

邓小平这种非正式的超越了政治的、作为一个退了休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更有效地发挥他在 1985 年全国党代会之后，退居二线以来所形成的激进的作用。在 1992 年，似乎邓对进一步加速改革的步伐在起更决定性的作用。显然 1991 年底邓认为 1989 年保守思想的调整持续的时间太长了。由于共产党的十四大定于 1992 年后半年召开，因此很有必要采取立即的行动，尽管很明显当时 88 岁高龄的邓小平身体欠佳，体力较弱，有时说话也不清楚，但是邓开始了他对南方某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区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巡视，这些地区主要是上海、武汉、珠海、深圳。(31)

这次南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保了制定进一步的经济政策和继续加快改革的计划，成为 12 月召开的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旋律。有趣的是，当时邓所巡视的南方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稳定，因此，邓对当地的领导在过去几年中往往是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并且是在一种政府和共产党不能直接控制的经济模式中所做的一切加以肯定和支持。(32)显然邓小平南巡的报导，对中国的其他省份可能产生了更大的作用。(33)

除了参加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外，历史工作是退休后的邓小平所关心的主要的一件事。并且有文件表明，他也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尤其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34)虽然没有他个人对历史观点的记录，然而他的政治观点却是很现实的。以邓小平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为了对历史的拨乱反正，又可以为现在和将来提供经验教训。邓鼓励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编写和出版中共党史。邓小平要么是题词或为书名题字；要么是鼓励更广泛地征集党史、人物传记、党史文集、专题报告和回忆录。例如，1987 年 5 月 14 日邓小平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据地画册》两本书题写书名，又在 1991 年 6 月为三本重要的书题了字：《陈毅传》、《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和再版的四卷《毛泽东选集》。(35)

就像已经表明的那样，邓对历史的关心决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和末期就已经成为他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邓小平对历史的关心，在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讲话和著作中同样也能找到。(36)有趣的是 1989 年 11 月 8 日正式退休后，邓小平与写他和刘伯承所创建的第二野战军史的历史学家们共同参加了一个庆祝会。

注释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0 页。

这些观点反映在邓七十年代的讲话中。见《军队要整顿》，1975 年 1 月 25 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1 页。《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 年 7 月 14 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9 页。《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1978 年 5 月 13 日，《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 149 页。

《搞人民战争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1978 年 7 月 17 日，《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 263 页。《现代战争要取得制空权》，1939 年 1 月 18 日，《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 263 页。《海军建设要讲真正的战斗》1979 年 7 月 29 日，《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 264 页。

《精减军队，提高战斗力》，1980 年 3 月 12 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69 页。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 年 11 月 1 日。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第 89 页。

范硕：《叶剑英在一九七六年》第 315 页。

尤吉和兰·威尔逊：《中国党与军队中的政治领导：赵紫阳的垮台》见 195 期工作报告，《战略与防御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89 年，详见第三表，该表列出了高级将领与他们的简历。

这 5 个人是：徐向前、杨尚昆、张爱萍、洪学智、杨得志。其他三人是叶剑英、聂荣臻、余秋里。

在 1985 年 9 月 30 日和 10 月 7 日的《北京周报》中可以找到全国党代会的有关文件。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 年 9 月 23 日，见《陈云文选》第 303 页。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 年 9 月 23 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1 页；另见《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英文版），第 126 页。

(11) 大卫·古德曼：《1985 年 9 月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领导的变动》，载于《中国季刊》1986 年 3 月第 105 期第 123 页。

(12) 《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问》，载自《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04—312 页。

(13) 洛厄尔·迪特莫特：《1988 年的中国：继续处于困境中的社会主义改革》，见《亚洲概览》第 29 卷第 1 期第 20 页。

(14) 钱超英：《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与魏荫同志探讨》见《深圳青年报》，1986 年 9 月 21 日。这篇文章是对魏荫的文章《邓小平，请你不要退休！》的回答。载自《羊城晚报》1986 年 9 月 15 日。

(15)《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1页。

(16)杰纳森，迪·斯潘西：《天安门》伦敦，1982年。

(17)在许多关于北京的游行报导中，托尼·塞奇和杰罗米·巴姆的报道是最好的。见托尼·塞奇：《北京人民运动的兴衰》和杰罗米·巴姆：《北京的日日夜夜》，均载于吉纳森·昂格编的《中国公开的民主抗议》悉尼，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1991年。

(18)《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载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2—308页；Beijing Review Vol. 32, no. 28, 10 July 1989, p.14。

(19)《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载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4页。

(20)罗塞尔·斯克尔顿：《邓把天安门事件归咎于领导》，载《澳大利亚人》1990年5月24日第1页。

(2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22)摘自《北京周报》1990年2月12日第19页。

(23)亚洲研究中心：《中国南方的过渡时期》堪培拉，澳大利亚政府出版社，1992年。

(24)《朝鲜领导人对这里的非官方访问》见《中国日报》1989年11月13日第1页。

(25)黄濂江：《历史体裁电影的成功》见《中国日报》1989年9月15日第5页。

(26)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3页。

(27)《邓以官方的身份会见最后一位来宾》见《中国日报》1989年11月14日第1页。

(28)张平：《江和邓与尼雷尔的会谈》见《中国日报》第1页。

(29)参见林树春《起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斗争的内幕》，见《争鸣》1992年4月1日。

(30)迈克尔·迪·斯温：《中国军队与政治的继承者》加利福尼亚·兰德出版公司。1993年第123页。

(3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32)大卫·古德曼：《地方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冲突与谈判》见大卫·古德曼和杰拉德·西格尔著的《中国的分裂》第17页。

(33)邓的南巡很快变成了神话集和重要文献，参见冷溶和高迄（音）编的《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远尚和韩竹（音）；《邓小平南巡后的中国》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南

方日报社编的《邓小平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

(34)温乐群：《邓小平与中共党史研究》，载自《中共党史研究》第 4 期，1992 年第 63 页；成占一：《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进一步开创我省党史工作的新局面》载自《山西党史通讯》第 4 期，1992 年，第 1 页。

(35)翟泰丰、鲁平和张维庆编的《邓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辞典》第 1456 页。

(36)参见邓小平关于太行根据地的讲话，见《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英文版载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06 页；或邓小平关于太行根据地的讲话，见《全面细致地做好工作》1961 年英文版载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63 页。

第九章 对邓小平同志的初步评估

无疑，在未来一段时期，邓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会使人们联想起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改革。邓主要关心的事情按照先后重要的顺序排列是党的领导、党的纪律和经济建设。甚至在 1976 年后邓所以改变过去由毛泽东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的那种糟糕的冒进体制，实际上也是从维护共产党的利益出发。他把这种改革作为医治中国病态和恢复中共民主传统的灵丹妙药。

对邓小平的评估可能是很困难的。主要是因为他所扮演主角的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离现在相距太近了。此外，中国的宣传媒体对邓的报导仍然还是那种中共集体领导的强有力的政治化身。这是沿用八十年代的那种报导方式。在改革时代，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是：邓一方面在努力消除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崇拜和强调集体领导；但是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邓的个人权威才产生了上述这些变化。所以 1983 年邓的文选(该文选包括邓 1975—1982 年的重要讲话)的出版被拿来作为 1983 年整风运动的指导性的学习材料，在这本书中，充分体现出邓是中共的监护人。在另外的一些书中和整个八十年代的新闻报导中，邓还被描述为热爱家庭生活的人和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这些不同的形象为本章对邓的初步评估提供了有益的框架。

热爱家庭生活的人

显然，邓小平非常喜欢把他描绘成为一个热爱家庭生活的人。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刊载了大量的邓和他的孩子和孙子（女）在一起的照片，批评家也评论说，这样的描绘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大权在握的政治家们，热衷于抱着小孩或和家人人们在一起照像，据认为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公众形象变得和蔼可亲，使人们看上去他们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缩短了与群众的距离。这甚至对邓小平来说也不例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邓肯定会为了树立一种形象而竭尽全力的。

邓象许多中国人一样，对他的家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这样认为完全合乎情理。不像许多革命家那样——例如毛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邓成功地把他的那种深厚的家庭观念保持下来了。在 1949 年，离家 29 年之后，当他重返重庆时，他去看望了他姐姐、继母和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简短的休息之外，他一直都在设法照料他继母，在 1967 年中和之后，流放江西的日子里，他尽了最大努力把全家人再一次团聚到一起，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邓不管什么时候到各省去视察，不管离北京有多远，他的身边总是要带上一个孙子（女）。有关邓个性方面的可信赖的资料很少，在他女儿写的传记中，邓被描述为一个说话简洁、心底善良的人，是一个喜欢饮食的人和足球爱好者，邓榕在这本传记中和其他书中，把邓小平描绘成一个不愿表露自己的人：“性格内向”和“沉默寡言……他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

毛也说了邓的一些优点：“邓是一个难得的人材。邓有思想，他不盲目地提问题。他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处理难题时很负责。”然而，毛还说邓有点固执，好与人顶撞。毛得出的结论是：“邓的思想是圆的但他的行动是方的。”这些品质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个人品质，正是这些品质，包含了邓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的艰难经历。

似乎是邓的外表不会使人感到害怕。这与其说是他的身高在起作用——邓只有五英尺多高——还不如说是他的脸起的作用。邓从三四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照的像片显示出一个可爱而又坦率的表情。邓确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从在大西南打仗的那些日子开始，邓就成了积极的高水准的桥牌手——胡耀邦和万里是他交手的老牌友。但是，很明显他从不为金钱打牌，因为他宁愿在输了的时候钻桌子。另外在邓的性格中还有刚正不阿的一面。这一点在六十年代初还有在 1973 年到 1978 年之间的党内政治斗争中，他所表现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见证。用毛的话来说，邓是“棉里藏针”。总之，不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一样，他与同事们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工作上是融洽的。例外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令人特别反感的激进分子。陈伯达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抱怨说“和邓小平在一起讨论问题比把梯子靠在天上还难。”反过来，邓小平似乎也从从不掩盖他对江青或林彪的憎恶。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邓把遵循党内民主准则的意愿扩大到他本来应该憎恶的那些人身上。华国锋取代了他，在 1976 年成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 1978 年后当邓重新掌权时，他愿意向华伸出友谊的手。1933 年邓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监禁，可能还受到了拷打。甚至当时邓的妻子金维映和他离了婚，嫁给了李维汉。然而在后来邓不仅能和李维汉在一起和睦地工作，而且李和金的儿子还受到了邓的保护，成了政治局委员。

同时，邓也不会忘记他的老朋友和同事，甚至那些老朋友也是一样。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在当时的中央反对毛泽东的过程中受到迫害，他和邓一起在 1933 年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在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时，他被留下来，不久被捕，1934 年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像毛的大多数家庭成员一样，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公众才知道了毛泽覃，1986 年邓去了江西，建立了毛泽覃烈士纪念碑，并亲自为纪念碑题写碑名。

军事家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中共确立了邓小平军事家的地位，确认邓为军事家并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也不是因为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担任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在1938—1952年期间长期的军事生涯。在那时，邓一开始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委，后来，在抗日战争之后和解放战争中，又担任了晋冀鲁豫军区政委，后来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电视剧、图书和电影中，特别描述了第二野战军1947年南下大别山区和1948—1949年的淮海战役的历史。

可能由于邓和中共领导层重新改组人民解放军和使其领导干部年轻化的举措，使邓在八十年代中期作为军事家，得到了大家的公认。邓在领导层中要比别人能更好地解决军队的问题。如有必要的话，他还是解决中共和人民解放军之间可能出现裂痕的最佳人选，邓不像在1929年去广西和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期间他所接触过的许多同事那样，他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例如，和他曾在广西一起工作过的张云逸、刘伯承；还有在淮海战役中指挥第三野战军的陈毅，他们都是职业军人而不是党的干部。然而，邓通过他的组织才干和政治谋略，最终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承认。

特别是1989年后半年公布了邓为军事家，这样做也许还有出于当时政治原因的因素。中共的这个决定表明了党与军队本质上是统一的，党和军队的这种统一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一直存在着。

邓小平作为军事家，对他任何的军事背景或技能的描述，乍一看来似乎有点奇特。在太行区和刘伯承共事之前，他的军事经验是很有限的，并且也不太成功。在广西作为政治组织者，他最初没有参与军事事务，1929年和1930年百色和龙州的起义一开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起义遇到来自国民党的进攻和法国人的抵抗时，邓和他的部队便撤走了。红七军最终被迫撤到了广西，在撤退途中红七军的指挥官们被打散了，人员损失极其惨重。在长征途中，邓的角色似乎完全是一个政工干部。

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军事的原因，邓小平在1938年初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政委。一二九师是在长征途中和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一个人所指挥的部队的基础上组建的。毛选择了邓是颇为得意的，首先是因为毛信任邓——由于邓在江西苏区的表现——其次，毛了解邓年轻能干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然而，在抗日战争中，邓的政治和组织才能变成了军事技巧，他在解放军中很快赢得了优秀指挥员和领导人的名声。1937年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时（当时邓还没有去一二九师），只有6000人；但到了1940年，一二九师的人数已发展到了20万人。邓在军队中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

后来变成了第二野战军。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军队依靠社会改革、民族主义或两者都有的口号，充分地发动起了农民。这些口号，无疑组成了邓的战略的一部分。邓所招募的新兵，大部分都不是那些有土地的农民，而是那些没有土地的苦力和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战争难民（来自城市或农村的劳工）。有坚强性格、有正义感和作风坚决果断的邓小平，对这些人表现出了同志般的关怀，并为他们贫困潦倒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四十年代，刘、邓领导的军队——开始是一二九师然后是第二野战军——在中共内获得了一个与其他共产党的部队完全不同的名声。刘、邓的军队主要由于他俩之间的良好关系，因此一直是一支最团结的军队。这种上下一致的团结，正是刘、邓军队的力量所在。

邓在创建他和刘领导的军队的过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使他在军队中获得了与刘同等的地位。在 1947 年，他们俩一起率领部队步行南下到大别山区，人们普遍认为这本来是一次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军事行动，他们没有保住他们的阵地，因为他们一直向前走，并且他们的前进几乎完全是靠突袭进行的。然而他们却为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原战场。邓小平在内战中，参与淮海战役的领导工作，这基本上是真实的。党中央授予淮海战役前线委员会行动的自主权，所有的命令，必须通过邓的批准才能生效，邓是毛所任命的前线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邓在 1938 年后，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角色，对他 1949 年后的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处于党的军职干部和文职干部之间的邓小平，很快成了军事指挥员中的政工干部中的军事指挥员。高岗事件使他实实在在地扮演了这种角色。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仍然是他继续扮演的一个角色。

当然，大部分党的文职干部在 1949 年前的那些年代中一直属于军队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邓对军队工作的参与当时和后来一直都超越了这一标准。他在解放军中建立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当他在政治上陷入麻烦时，他在军队中的良好群众基础不止一次地给他提供了帮助。他在军队中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军队生活，并且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与新结识的军队领导干部相处的很好。同时，也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对原来一二九师、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部下，给他们在解放军中获得了重要职位。这一点，在五十年代中期军衔的分配工作中他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很重要的。此外，邓与他在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老部下继续维持的关系，决不仅限于军队事务，这种关系逐渐在军队以外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西恩·派伊在讨论邓的政治风格过程中，着重探讨了邓政治行为中的传统因素。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邓由于长期受军队生活的熏陶，那么军队的文化很可能对邓后来的执政的方式带来了影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邓服从上级、领导下级。当他成为“最高领导人”时，他也期望所有的

人都这样做，不管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

政治家

邓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别是与也的前几任领导相比，证明他还是成功的，即使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点夸大。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邓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领导人都做的贡献大。他出访过美国、日本、法国、东亚及东南亚。通过各种方式——文化的和个人的，还有政治的和经济的，都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巧妙地利用国际传播媒体，进一步宣传了中国的这一目的。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邓小平在 1976 年之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保护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价值的缩影。当然确切地说，这是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像毛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相当令人费解；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稳定的。邓对待党的价值、结构和使命与毛有明显的不同，至少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是如此的，这一点也许能够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看到。

八十年代中，邓对中共在中国社会作用的解释似乎完全与四十年代之后的解释是一致的，他比毛更强调了组织结构和政治的重要性，还有经济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毛的观点中，把动员群众看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而邓认为，中国的未来更应该依靠专家，他经常批判由政治动员所产生的那种“左倾冒进行为”。邓的看法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现代化，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动员她的人民和开发物质资源。有趣的是，邓的观点认为青年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在 1992 年他表达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赞赏，并认为他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相比一点也不差。

邓认为党对权力垄断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向中共发动进攻，而且还要动摇中共的权力，当邓一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的之后，便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正如邓小平在 1988 年 7 月共青团的一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党的领导。只要你们坚定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不管你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你们将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可能是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经常讲的一句话。

邓小平认为中共对全社会的领导责无旁贷。为了发挥这种领导作用，中共必须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组织。党与政府之间职能的混淆就如同党对自己的组织纪律不严明一样，同样也会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邓认为，中共的力量是在于她的团结和与人民大众良好的关系，而这两者都是依赖党的教育和坚持党的准则。在任何一个决定做出之前，党内应该有讨论和争论，但是，一旦决定做出了，那么为了确保对全社会实施党的领导，每一个党员应该在党的集体领导下达成高度的一致。

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党内的教育——这是指的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个人的思想，是从 1949 年之前开始的党的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有助于确保党内思想的一致和目的的统一。然而，邓又明确地、一贯地提出。为了确保党对社会的领导，体现出物质上的优越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共领导下的那些地区保护和发展了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在 1949 年之后又成了现代化的经济，正像邓在 1987 年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谈话时所说的，也许是在五十年代期间经常讲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1)

由于邓强调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发展教育事业而进行机构改革，邓有时被国外描述为中国唯一的经济现代化的制定者，尽管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正像上文引用的邓在 1987 年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邓所寻求的是社会主义。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中共起主导的作用。邓在 1992 年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时，他把社会主义描述为“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在邓的总体思想中，经济现代化是一件主要关心的事情，但党的领导原则是更加重要的。与毛泽东观点和工作风格的明显差异产生了毛和邓的关系问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问题对邓的政治生涯来说，明显地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前，邓有三十多年一直作为毛的助手，毛也深信邓对他个人的忠诚。“文化大革命”后，甚至在毛还在世时，即使他俩的关系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他俩早期的那种关系对于党中央其他许多的领导人来说仍然是革命成功的一个明显标志。邓到了九十年代仍然还保持着对毛的忠诚。正像邓在 1980 年告诉奥埃娜·法拉奇那样：“……我们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3)正像他在 1989 年 5 月所表示的那样，他仍然为在党内曾是一个“毛派”成员感到自豪。(14)

毛和邓的政治关系可追溯到 1933 年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当时邓实质上是在党内冲突中替毛受了过。从那以后，毛对邓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别人无法察觉到的信任。在 1938 年邓被派往太行区。在 1942 年—1943 年延安进行的旨在消除苏共影响和确立毛的领导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邓是所有在外的中央领导人唯一没有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的人。邓在毛的支持下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一直到 1966 年底，尽管邓和毛之间在政策问题上有许多分歧，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任何的派系斗争。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官方的宣传机构也没有对邓小平公开点名批判。

邓不仅与毛泽东的而且还有周恩来的，实际上是所有的他与党内的同事们所建立的关系，很明显是他的政治评传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关系之外，这本评传还突出了抗日战争期间邓在太行区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所起的重要作用。邓对政治变革的认识在太行区时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和邓在太行区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后来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力群体。

邓在太行区经验的许多原动力，来自以延安为中心的“模范”边区，不是来自华北其他边区的，特别是来自晋察冀边区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对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区临时和战时的状况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邓在 1949 年后制定的所有具体的政策起源于太行区。然而，太行区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问题不同于在延安遇到的那些问题，因此有时就需要某些不同的解决办法、太行区地大物博，而且又更直接地受战争的影响，但是在经济上却得到了较大发展。为回答抗日战争时期的形势把邓小平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少数派的权力、对党政分离及对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最广泛的民众支持的关心做了具体的阐述。

肯定，太行区对邓和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他对发展一二九师所做的贡献产生的影响也已经得到了研究，在他与军队领导人的关系方面，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驻在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可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至少使得他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期间领导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结下了密切的关系。

除了军队事务外，邓的那些来自以太行区的老同事老部下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和全党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些人在共产党领导层内为邓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无与伦比的。

改革家

最后一个形象把邓小平描述为在发起中国的改革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领导人。把他描述为改革家的形象完全是正确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是邓小平领导了对各项政策和作法的抵制。还可以肯定 1976 年他再次被清理出中共领导层时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确保了他后来成了最受欢迎的领导经济现代化运动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在 1978 年和其后执行的各项政策，是由集体领导所制定的，这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总体思想首先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作为设法恢复“大跃进”的灾难之后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提出了这些思想。在七十年代末和“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又重新恢复了早在二十年前曾参与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那些人们的工作。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人集体的胜利，而且也是邓本人的胜利。

从历史的角度对改革时代各项政策和实践的起因进行研究，会对邓作为一个改革者的角色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在三中全会上所发起的改革的实质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初就已经确立了的中国的传统。邓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在他 1956 年在八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看到，这些讲话主要是对党在四十年代的经验进行解释和总结。邓强调依靠坚持党的民主、依靠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政治制度，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的。

八十年代，邓所致力改革大部分是在外交领域。考虑到中国自我封闭了数年之后，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姿态，这似乎标志着中国将要与过去进行更彻底的决裂。

邓实质上的目的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的他们认为是中共传统的那些东西，正如邓在 1980 年 1 月（在对党员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和恢复他所认为的那些更为通常的作法来恢复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邓对毛泽东思想（1981 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就是他长期以来拥护的三个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他反复回顾了四十年代，并以四十年代党的成功经验，联系当前的现实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从邓对 1956 年八大历史功绩的再次肯定，和强调八大路线的正确来判断，他在中共的传统中寻求改革的正统性。八十年代期间，八大被说成是一次模范的代表大会，并且重新出版了精装和平装的八大文献，邓和其他领导人认为八大坚持了党的传统，特别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当然，八大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在八十年代所解释的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矛盾，完全是一致的。但是，有点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当时正是邓正式向八大提出了修改党的章程，这次党的章程的修改，删掉了涉及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邓以这样的方式寻找传统，突出暴露了他在社会与政治改革中的主要矛盾。邓的传统主义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找中共的黄金时代——可能是 1956 年，也可能是四十年——以此来证明现代中共政治的正确。然而，那种黄金时代未必长期存在过，或许仅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存在过，如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由这样的历史或传统形成观念，面对如此剧变和不同的环境时，其本质就决定了它是不会有太大的灵活性。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由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与政治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的是适应而不是邓的那种原则性的反应。鉴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邓要么将作为最成功的经济现代化的制定者，要么将作为不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注释

在此需要做一个解释。汉语中，“同志”这个称呼往往用于人名的全称或只用于名。比如：“邓小平同志”或“小平同志”这里故意使用了“邓同志”是为了产生一种含义相同的英语的对应效果。

邓榕：《我的父亲在江西的日子里》，第 18 页。

这个报道来自唐朱戈（南斯拉夫新闻社）1977 年 7 月 23 日。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第 328 页。

引自爱德加·罗斯：《毛的道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 年第 262 页。

《江西：毛泽覃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新华社（汉语），1986 年 4 月 27 日；英文见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国际广播摘要》1986 年 5 月 2 日。

参见：云平、王超柱和刘行（音）：《决定性的淮海战役》载自《解放军文艺》第 5 期，1988 年，第 78 页。

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412 页。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四部分，第 378—379 页。

参见人民大学三忠于揪刘邓战斗队（第一分队），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北京，1967 年 4 月。

(11) 《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 年 4 月 26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3 页；《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英文版），第 178 页。

(12)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二部分，第 373 页。

(13)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 年 8 月 21 日、23 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29 页。

(14)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01 页。

译后记

1991年8月，在天津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教授讲了他的论文《中国革命的太行道路：邓小平、毛泽东与变化的政治》的要点，随后我认真地阅读了论文全文，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在论文中论述了由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创建的太行根据地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时期的经验对邓小平以后的思想发展非常重要。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许多思想来自太行经验。他举例说：“八十年代改革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责任制和党政分开都起源于太行。”（见《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档案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639页）我的研究课题是太行根据地历史。此时，我主编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历史丛书》已经出版了8本，我正在写《刘伯承与邓小平》一书（该书已在1994年7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会上我们进一步就邓小平和太行根据地研究交换了意见。此后，我们继续进行学术交流，通过书信探讨问题。1993年夏，我和魏宏运教授应邀赴澳大利亚参加由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主办的中国学研讨会，有机会与古德曼教授在一起进一步讨论研究太行根据地。在澳大利亚，古德曼送我一本1990年出版的由他著的《邓小平传》英文本。该书以较大篇幅介绍了邓小平在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中和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读后，我很有兴趣。我建议他在书中再补充、充实一些材料，加写一篇中文版前言，可出中译本。今年3月，古德曼教授修改完该书后，立即将书稿原稿给我寄来，书名为《邓小平与中国革命·政治评传》，并表示同意由我负责翻译出版中文本。征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同意，在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我组织翻译该书，由李学谦和姜丽蓉负责翻译，并得到张瑞华等的支持和帮助。今年5月和7月，古德曼教授两次来太原同译者一起讨论了中文译稿，并委托我最后对全书进行校改。在翻译出版该书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田酉如

1994年12月

